

炎黄春秋

YANHUANG CHUNQIU

周恩来「文革」中批极左

粉碎「四人帮」全景写真（下）

定陶战役中的刘伯承

历史上的忧患意识

扼杀戊戌变法的慈禧为何也搞新政

2 第 11 期

炎黄春秋杂志社出版

读者数量多 媒体影响大 信息传播广 广告效果好

《参考消息》是新华通讯社主办、参考消息报社编辑出版的4开8版日报，其历史长达69年。它每天及时选载世界各国和地区的通讯社、几百种报刊及因特网上的最新消息和评论的精华，全面报道世界各国以及香港、澳门特区、台湾等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体育、文化及对华反应等各方面的最新情况。

它具有时效快、信息广、内容精、形式活的特点，融参考性、知识性、启发性、趣味性于一体，是广大读者认识外部世界的窗口，吸取外部世界有益成果的渠道，推动两个文明建设的阵地。所以，《参考消息》始终是一份独一无二的报纸。

正因为《参考消息》独具特色，几十年来它已扎根于中国社会之中，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长期以来发行量一直居全国日报之首。2000年发行量高达300万份，读者逾千万人！

《参考消息》覆盖全国，读者遍及各行各业。除在北京印刷外，在全国27各省市设有38个分印点，卫星传版，发报及时，广告、信息传播快捷。

《参考消息》广告由北京环宇广告公司总代理。该公司是参考消息报社所属的专业广告公司，全面代理《参考消息》报广告业务，并代理新华社编辑出版的报纸杂志的广告版面。公司还与中央各大报纸及电台、电视台有业务往来，并在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主要城市设有广告代理机构。

广告价目表

版位 (次)	规格 高×宽(厘米)	收费标准 人民币(元)
1版报眼	5.5×8.5	33000
半通栏	7×11	19400
通栏	7×22	38800
1/4版	17×11	65000
小半版	14×22	120000
半版	17×22	130000
整版	34×22	280000
外版中缝	34×4.3	19900
内版中缝	34×4.3	16600
内版1/2中缝	17×4.3	8300
内版1/4中缝	8.4×4.3	4200
1版报花	2×3.5	3000
8版报花	2×3.5	2500
内版报花	2×3.5	1800

通讯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大街甲97号 参考消息报社广告部 邮编：100051
 正版广告电话：010-63071136 63076045 63076046
 中缝/报花广告电话：010-63072779 63074263 63076003
 传真：010-63074484 63071104 63074263
 E-mail: hyadv@mail.263.net 或 hyadv@263.net



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日报

炎黄春秋

春 秋 笔

- 2 周恩来在“文革”中是怎样批极左的 王永钦
8 粉碎“四人帮”全景写真(下) 纪希晨

陨 星 篇

- 23 刘志丹的悲壮人生 傅国涌
27 为党为公的张浩 王光远

英 杰 谱

- 30 定陶战役中的刘伯承 丁 曼
36 辛亥忠烈吴禄贞 李孝平

古 镜 台

- 40 扼杀戊戌变法的慈禧为何也搞新政 王戎笙
49 康熙粉碎“台独” 艺 兵

人 海 浪

- 46 中国载人航天飞船总设计师王永志 马京生
50 一代学人丁文江 尹 骐
26 冯玉祥节约用水 刘 豹

沉 思 录

- 55 新兴工业国(地区)转型期腐败的启示 俞新天

群 言 堂

- 59 历史上的忧患意识 张岂之
35 中国反贪史的启迪 白 钢

文 荟 苑

- 63 敦煌学研究在中国 孟宪实
71 “包公戏”的出现与流传 张全明

古 今 谈

- 75 论资排辈的由来 吴 思

顾 问:

费孝通 程思远 胡 绳
陈 沂 杜润生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光远 王俊义 王景山
冯 征 冯其庸 曲润海
李 庄 李 普 李 锐
李学勤 吴 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 锲 张岂之
张国琦 欧远方 凌 云
曾彦修 廖盖隆 穆 青
戴 逸 魏久明

社长(法定代表人):杜导正

副 社 长:

方 实 宋文茂(常务)
徐 孔 程理嘉

执行主编:

刘家驹 舒元璋 吴 思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理事长:陈 渊

理事单位:

深圳市亚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秘 书 长:徐 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11—2581/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址:北京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1号

邮编:100007

电话:64072452 84020890

美术设计\激光照排:

北京瑞和轩盛经济信息咨询中心

紫东图文设计工作室

印刷:丰润县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

总公司(北京 399 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

龙源网上书店

网址:www.dragonsource.com

gb.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出版日期:每月4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 0079 号

定价:4.80 元

周恩来在“文革”中是怎样批极左的

□ 王永钦

批判“政治上的”极左思潮，着手解决“文革”中遭受错误打击的一批老干部问题

林彪、陈伯达垮台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只剩下毛泽东、周恩来、康生三个人了。周恩来仍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

在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对自己在“文革”中的一些“左”的做法也似有悔悟之意。他在一次谈话中宣布，根本不存在“二月逆流”。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说，我们的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这年年底，毛泽东对关押在秦城监狱的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来信作了批示：应一律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中共中央下达了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在揭批林彪一伙的反革命罪行的同时，“文革”中一直想方设法保护干部的周恩来，便有了较多机会和可能，批判极左思潮，着手解决“文革”中遭受错误打击的一批老干部问题。不久，李富春受中央委托，连续主持在京老同志座谈会，揭发林彪历史上的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为老同志在“文革”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和错误打击作了平反。9月底，周

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提议成立由叶剑英负责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10月初，报经毛泽东同意后，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通知。同时，军委三总部机关也分别由李德生、张才千、余秋里主持工作。10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接见新成立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毛泽东在接见时说：文化大革命中整几位老师，是林彪、陈伯达他们搞的。又说：要好好整顿我们的军队，军委“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

周恩来十分关心仍被监管的许多老干部的情况。11月12日，他在公安部检查监狱情况的报告上，一连写下十几条批语。报告中反映监管人员中存在宁“左”勿右的思想、常以威吓和惩罚代替教育的内容旁，周恩来批道：“不合毛主席的思想和政策！”在反映炊事人员认为“给‘犯人’做饭不光荣、工作好了是立场不稳”旁批道：“错误认识。”在反映有的医务人员觉得“反正是‘犯人’、病治不好死了也没啥”，旁批：“极其有害的思想！”他要求提高在押人员的伙食标准，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和医疗条件，以防止发生意外事故。此时关在监狱里的伍修权后来回忆说：

“‘九一三’事件以来，我们的待遇和处境都有了明显的改善。我们营养不良、体质下降的问题，看来引起了注意。1972年初，卫戍区指定了两名战士专门给我们这批特别‘犯人’做饭，伙食标准也提高到每天六角钱。虽然比原来只多

了一角五分，可是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无异是一个福音。同前几年的粗劣伙食相比，饭菜开始好一点了。医疗条件也同时有了改善，专门派来医生给我们看病，也肯开药给我们，晚上睡不着觉，还给一点安眠药吃。这不仅诊治了我们身体上的病，更给了我们精神上很大的安慰。”

周恩来对各地被打倒的干部，同样十分关心。作为第一步，就是采取一切措施，先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为他们治病，检查身体，改善住宿条件等。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得到周恩来关照的有江

华、王恩茂、谭启龙、冯白驹、贺诚、廖汉生、林枫、朱穆之、张化东、刘建章等，还有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和文艺界的人士。

最让周恩来牵挂的是那些被林彪一伙迫害致死的老干部。他想方设法，查明有关情况，准备为死者恢复名誉或解决其他遗留问题。解决贺龙同志问题便是其中一例。据贺龙元帅的夫人薛明回忆：自从贺龙1969年6月被迫害致死，她本人也被押往贵州一个山沟里监管劳动。1971年10月，周恩来派人到处寻找她的下落，终于在贵阳磊庄空军某部干校找到她。来人对她说：“周总理要你把贺龙同志遭受林彪一伙迫害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写出来，报告中央。”薛明回到北京后，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写明了有关情况。1974年底，中共中央发出了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推倒了林彪一伙强加在贺龙同志身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1975年6月9日，在贺龙逝世6周年之际，中央举行了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周恩来也抱病去参加了。当薛



明的女儿说“周伯伯你也要保重身体”时，周恩来抬起头，缓缓地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

在“文革”中，周恩来对陈毅的保护是人所共知的。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一样，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打击，历经磨难。1967年2月，陈毅和谭震林、聂荣臻等几位老同志“大闹怀仁堂”，在会上激烈抨击“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错误做法，向中央文革的几位主要成员提出质问。在1968年中共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陈毅和其他几位老同志被指责为搞“二月逆流”

的成员再次受到批判，并被剥夺继续工作的权利。林彪垮台不久，陈毅于1972年1月初不幸因患癌症去世。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在同周恩来、叶剑英谈话时表示：现已证明根本不存在“二月逆流”，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叶剑英立刻赶到医院向已病危的陈毅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几小时后，陈毅便与世长辞了。1月8日晚，周恩来赶到医院，向陈毅的遗体深深鞠躬，又轻轻掀起覆盖的白布单的一角，抚摸陈毅的手背，向他作最后告别。1月10日下午，陈毅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按事前中央政治局批准的方案，追悼会由中央军委出面组织，只请内宾，不请外宾。但追悼会开始前一刻，毛泽东决定出席。工作人员马上把这个情况告诉周恩来。周恩来立即作出决断：提高陈毅追悼会的规格，通知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和全国人大、政协的负责人参加追悼会；并邀请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出席。追悼仪式前，毛泽东接见陈毅夫

人张茜及其子女，对他们说：陈毅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

毛泽东穿着睡衣急忙赶到八宝山，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周恩来在会上致悼词，这种最高规格的追悼仪式，暗示着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批判的老干部是应该平反的。无疑，这对“文革”中遭受错误打击的老干部来说，是一种很大的慰藉和鼓舞。半年后，周恩来还感慨地说：“毛主席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使我们这些老干部、使我们忠于主席的人，都很感动。”

周恩来并没有停留在感动上，他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在各种场合扩大其影响，抓紧解决干部问题。1月下旬，他在一次会上提到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历史功绩，说：这是毛主席对我们讲的。林彪一伙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混淆嘛！又说：听说有的地方还在讲“二月逆流”，现在叶副主席已经主持军委工作，为什么不批驳？不久，周恩来得知因“杨、余、傅事件”受到株连的杨成武大女儿杨毅在河南关押处突然身亡，他立刻采取措施，派出两支小分队分赴河南开封和滑县，悄悄地将杨成武全家人实行保护性转移。

为了推动全国的落实干部政策工作，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周恩来审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社论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除了极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分子外，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以教育为主的方针。”这以后，全国各地报刊相继发表论述落实党的干部政策问题的文章，有力地推动了干部工作的进展。

纠正农业和工业中的极左思潮，批判林彪一伙散布的空头政治，全面落实党的各项经济政策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农村问题，

始终是一个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性问题。在周恩来心中，一直把农业和农村问题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

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根据周恩来多次讲话的精神，国务院先后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全国棉花、油料、糖料生产会议和全国林业会议，决定适当放宽农村经济政策，在保证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允许农民个人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允许生产队拥有因地制宜种植的灵活性。此外，国家还通过调高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降低支农产品的出厂价和销售价以及实行粮食征购一定五年不变等政策，鼓励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

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一些“左”的做法和口号，总是加以纠正。他指出：在农村中，平调劳动力不给报酬，社员负担很重。所以，农业政策要讨论。他在许多场合说过：学习大寨的经验有三条，一是实事求是，二是自力更生，三是先公后私。1971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重申分配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经验，要全面发展，不能把党的政策所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这样，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农村中存在的“一平二调”、“割资本主义尾巴”等“左”的做法。

“文革”期间，工业生产遭到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由于“停产闹革命”，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工业产品的产量和质量严重下降，工伤事故却大幅度增加。

周恩来首先做的是抓企业管理，要求恢复和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强调全面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批判长期以来林彪一伙散布的空头政治，要理直气壮地抓生产、学业务、钻技术。1971年底到第二年2月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是联系经济工作实际、揭批林彪一伙对经济工作干扰破坏的一次重要会议。会前，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乱得很，要整顿。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提出“整顿”的主张。会后，国务院有关部门起草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明确

规定企业应该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考勤、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设备管理和维修、安全生产、经济核算等七项制度，提出必须抓好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成本、利润等七项指标。这个文件贯彻了周恩来提出的整顿企业的方针，强调恢复和发展生产、反对经济工作中的无政府主义的精神，成为工矿企业落实党的各项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

其次，周恩来十分注意提高产品的质量，他多次对飞机和汽车生产质量问题作出批示，一再告诫对产品质量需要“提高警惕”，“放在议事日程来解决”。1972年春天，周恩来连续抓了出口罐头、衬衣、照相机等日用工业品和广交会展品的质量问题。对国内企业屡次出现不合格产品，他感到极为不安。他认为“产品质量不稳定，就是规章制度执行不好，要遵守好的规章制度，好的工艺流程”。

周恩来认为，现在主要是领导机关不敢讲话，不敢管，致使无政府主义泛滥。所以，他特别强调各单位的主要领导人要亲自抓产品质量，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批判极左思潮，把生产搞上去。

排除科教领域的极左干扰，强调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提出中学毕业生可以直接上大学

1972年下半年，周恩来领导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他敢于碰硬，从“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教育界、科技界入手，排除极左思潮的干扰，争取尽快恢复正常工作。

1972年6月，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第二次回国探亲。7月2日凌晨，周恩来会见杨振宁。一见面，周恩来就开门见山地说，杨先生说我们基础科学理论太贫乏了，而且也不同国外交流，恐怕这话有道理，你是看到我们的毛病了。他还说，你有好的意见我们应该听取，不要还是自高自大，听不进你提的意见，或者

听了当耳边风更危险。7月14日，周恩来叮嘱北京大学负责人周培源：“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还请他提倡一下理论。

7月20日，周培源致信周恩来，说在北大传达周总理的讲话后，广大教师心情激动，深切感谢党中央的关怀。信里也反映了许多教师仍然存在顾虑，主要是觉得搞“科研工作反复性很大，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来一次运动首先受到冲击的是基础理论研究”，“怕挨‘理论脱离实际’的批评。”7月23日，周恩来就周培源来信事批告国务院科教组和中国科学院负责人，要求他们以这封信“作依据”，将这个问题“在科教组和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

9月5日，周恩来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统科学顾问萨拉姆时，再次谈到加强科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他说：在理论方面我们做得很差。一句话，许多经验，没有理论，忽视理论，这是我最不满意的。9月11日，他写信给张文裕、朱光亚，强调：“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握理论研究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应该成为科学院要抓的主要项目之一。”

在教育上，周恩来勇敢地向“文革”中提出的“左”的教育制度进行挑战。1972年10月，他向美籍学者李政道表示：“对学习社会科学理论或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可以边学习，边劳动。”李政道后来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同周恩来长谈。看得出，周恩来当时对基础科学（包括基础理论和基础实验）非常重视，并且十分注意国内外这方面的动态和进展，对我所提的有关建议也很关心。”

人们都知道，“文革”中批判所谓“17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推行了一套“左”倾的教育政策。1971年发布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规定大学招生的对象是具有2至3年以

上实践经验的优秀的工农兵，年龄在20岁左右，身体健康，一般是未婚的，应有相当于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工人、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入学，可以根据情况放宽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这种招生办法，不仅严重堵塞了一大批优秀青年的升学之路，而且为“走后门”上大学敞开了方便之门。学员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

周恩来在这个被视为“文革”重要成果的“规定”刚刚公布一年之际，就提出“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的论点，这不能说不就是对“左”倾教育制度的一次勇敢的挑战。

10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周培源根据周恩来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写的文章：《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文章提出：“工和理、应用和理论都必须受到重视，不能偏废”；“要批判‘理论无用’的错误思想”，“充分认识到科学实验和自然科学理论的重大意义”；“在学校中，基础课的教学工作一定要做好，综合大学理科要对基本理论的研究给予足够的重视”。

周恩来指出“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要批透极左思潮”。

1972年8月1日、2日，周恩来连续两天在人民大会堂向回国述职的大使和外事、宣传单位负责人作长篇报告，系统阐述对国际形势、内外政策、批林整风、政治与业务关系等问题的看法。这个报告，全篇渗透着“要批透极左思潮”的精神，用以指导对内、对外的各项工作。他强调指出：“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鼻子下面也有嘛，外交部也有，驻外使领馆也有。”“实际上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极左思潮“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工作，还要犯错误。”“如果在驻外使领馆现在还有人搞极左，就把他们调回来学习，不要妨碍我们的对外工作。”

9月底，周恩来主持起草“两报一刊”国庆

社论稿，其中写到应该继续“批判极左思潮”。但是，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却两次勾去社论稿中“批判极左思潮”的字样。10月初，《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的一篇报道中，再次出现“肃清极左思潮影响”的提法，江青一伙立即追查“稿子是怎么来的”。

10月14日，根据周恩来有关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人民日报》发表了一整版反“左”的文章：一篇是《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一篇是《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尖锐地批驳“文化大革命”以来盛行的“打倒一切”、“砸烂一切”和“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等谬论。它提醒人们注意：尽管林彪一伙“已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但是他们煽起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还会‘采取稍微新一点的形式，披上前所未见的外衣，或作前所未见的装扮，重新表现出来’”。

文章发表后，江青一伙人立即紧张起来。他们马上追查组织这批文章的“背景”。姚文元看了后提出：“当前要警惕的是右倾思潮抬头”，“不能说什么都是无政府主义，不要批到群众头上，不要混淆两类矛盾”。江青指责说：这些文章“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经张春桥、姚文元授意，《文汇报》以及它的内参《文汇情况》连续登载批驳文章或相关报道。江青一伙的追随者在《人民日报》社内也大搞“反右倾思潮”。

11月28日，中联部、外交部在写给周恩来的请示报告中提出：鉴于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在外事部门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批判和肃清，准备召开一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彻底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30日，周恩来批示同意这个报告。但是这件事遭到江青一伙的竭力反对。鉴于党内高层对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主题存在着尖锐的意见分歧，12月3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这件事进行讨论。根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外交部在修改时删去了原来报告中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词句。但是，修改后的报告仍强调：会议“主要学习毛主席最近一两年来关于对外工作

的批示”、“总理今年8月1日、2日接见驻外使节的谈话(纪要)”。12月4日,周恩来批示同意外交部修改后的报告。

不久,召开的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尽管避开使用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提法,但依然是按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反对强加于人和大国主义的指示精神,清理和批判了近些年在归侨、侨眷、口岸、接待、宣传工作中的种种错误认识和极端做法,并提出今后继续清除极左影响的各项规定。

72年秋冬至73年间以含蓄的方式继续反“左”

1972年下半年至1973年间,周恩来以更加含蓄的方式,继续反“左”,并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经济政策,解放一批老干部,使他们参加领导工作,发挥应有的作用。特别是促成了邓小平的复出,对挽救党和国家,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致信负责干部工作的纪登奎、汪东兴,指出:当年“大闹怀仁堂”一事,“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谭震林“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谭震林曾被诬为“二月逆流”的代表人物而受到压制和打击。周恩来称他为“好同志”,并安排他从外地回北京治病。在同一封信上,周恩来还提出,“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表示了他对邓的不同寻常的关注。

1973年2月,邓小平根据中央通知,全家登上回京的火车,离开劳动三年多的江西南昌郊外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周恩来正式通知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汪东兴安排好邓回京后的住所。

2月下旬至3月初,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邓小平的问题。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至此,曾被“文革”中定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邓小平得以复出,恢复

了领导工作。3月,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关于落实干部政策和干部处理问题。会后,根据周恩来的意图,由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等会同有关部门提出一个“先易后难”的方案,经政治局讨论并报毛泽东批准。这是在解决干部问题上的重大突破,可以避免因为少数争议较大的“疑难”案件而把许多“查无实据”、仍迟迟得不到“解放”的干部一起拖住,实际上是一次有步骤地“解放”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迫害的老干部的开始。

在经济工作方面,周恩来也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步骤,清除林彪一伙对经济的破坏性后果。2月26日,周恩来召集国务院业务组会议,听取国家计委关于本年度计划和《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起草情况的汇报。在汇报会上,周恩来历数几年来无政府主义在企业中的种种表现,尖锐地批评它给国民经济带来的严重后果。他指出:“1969年以后,在经济管理上瞎指挥盛行。南昌把飞机厂最好的工人下放了。景德镇陶瓷窑也给炸了。林彪一伙一直破坏到‘九一三’,影响到1973年,恶果逐步暴露出来了。”“一定要批透,把破坏性后果消除掉。”他同时还强调,要把“整顿的方针”写清楚,要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克服平均主义倾向,实行必要的奖励制度。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国家计委重新修改后的《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以纠正生产管理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作为指导思想,明确地提出加强统一计划和整顿企业管理的十条规定,重申政治挂帅要挂到业务上。规定特别强调:要反对各行其是,要严格各项规章制度,加强劳动纪律,遵守党纪国法,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等等。这个规定,在计划会议上讨论时,除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控制下的上海代表反对外,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代表都赞成这个《规定》。

但是,以后接踵而来的“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运动,却使周恩来陷入了更加困难的境地。

(责任编辑 仲文)

粉碎“四人帮”全景写真(下)

□ 纪希晨

这是一步险棋

“我搬到玉泉山以后，得到消息说，‘四人帮’的爪牙，在上海把红纸都抢买光了，准备迎接他们的大喜之日了。”

1982年11月24日上午9时，四届人大委员长叶剑英同志在西山的住宅里，激情地对笔者谈到关于粉碎“四人帮”的问题。他那雪白的长眉下，两只善于观察风云的眼睛，蕴藏着深邃博大的思想和烈火似的力量。

“那时候，李先念同志到我这里来了。我问他：‘你是奉命来的吧！’”

李先念大声地说：“我是奉命来的呀！”

1976年9月24日，李先念到了叶帅住地。李先念边说边走近叶帅。他紧紧握着叶帅的手，在旁边的沙发上坐下来。叶剑英打开收音机，在音乐响声的掩护下，两个人开始了谈心（华国锋同志告笔者说，在华国锋9月21日登门访问李先念的当天晚上，李先念即受华国锋的委托，到西山访问叶剑英）。

李先念谈了对形势的看法。他说：“现在情况越来越紧张，得赶快想办法，事情太紧急了，你得下决心啊！”

叶剑英面容骤然焕发亮光，眼前仿佛出现

了彩虹。他兴奋地抓住老战友的手，连声地问：

“华下了决心吗？”

“我看他是下了决心的！”

“那好哇！”

叶帅为了防止窃听，又把收音机声放大了些。

李先念贴近到叶帅的耳朵上，大声地说：“江青把华闹腾得无法工作，是逼上梁山啊！”

叶帅微笑地连连点头，陷入深沉的思考。接着他问了几位政治局委员的态度，特别问了陈锡联和吴德的态度。李先念一个个简要作了介绍。至于华国锋，他过去不曾一起工作过，对华国锋了解不深。毛泽东病逝后，他为做好对华国锋的团结工作，曾亲自动手第一次登门看望华国锋。俩人在交谈中，叶帅以试探的口吻，批评了王洪文破坏野战军、地方武装、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企图建立民兵指挥部，搞“第二武装”的错误做法。华国锋赞同叶帅的意见，但是对于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国锋没有表态。因之，当华国锋委托李先念来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叶剑英才提出关于华国锋的决心的问题。

9月21日，华国锋来到李先念的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国锋告李先念说，我同他们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华国锋请李先念代表他去找叶剑英，请叶剑英考虑以什么方式，

在什么时间解决为好。李先念详尽地传达了他和华国锋的谈话。李先念说：

“毛主席逝世了，在‘四人帮’看来，现在是他们千载难逢夺权的时机。华国锋说，主席生前曾多次讲过，要解决‘四人帮’问题。”

叶剑英聚精会神地听着，神色严肃地说：

“我们跟‘四人帮’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是一步险棋，要当机立断！”

“是呀，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李先念说：“小平同志被他们打下去了，如果我们再被他们打下去，他们就要夺取最高领导权了！”

两人倾心交换了对形势的看法，他俩一致认为，事关重大，“兵不预谋，不可以致胜”，必须有严密周全的部署不可。

“华有什么想法？”叶剑英问道。

李先念说：“华要我来听听你的意见。他说，毛主席对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早有交待，但是用什么方法解决？在什么时机解决？他请你拿主意啊！”

李先念向叶帅详细讲了华国锋对他的谈话，研究了形势，分析了力量对比。考虑到“四人帮”控制着上海，以及他们多次妄图插手军队的情况，叶剑英认为，为避免人民的损失，“兵谋为主”，采取“智取”方法，比较妥当一些。叶剑英说：

“事已至此，那就不能再拖了，要迅速采取行动，以快打慢，最好一两天就行动。”

李先念完全同意叶帅的意见，他说：

“好主意，你们几个再分别交换一下意见。”



叶帅和作者

“西山不可久留”

送走李先念以后，叶剑英来到幽静的庭院。转了两圈，又信步沿着石梯，登上院后的山岭，穿过满山交错的枫林，走进一座被他意味深长地称作“放鹤亭”的凉亭。望着山前居住多年的庭院，他怀着无限深情，情不自禁地吟诵起宋代大诗人苏轼的《放鹤亭记》。

“鹤归来兮，东山之阴。其下有人兮，黄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余以汝饱，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久留。”

“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久留。”

同行的秘书小张知道首长有背诵诗的习惯，但为什么这阵子总是反复吟诵这两句呢？

“西山为什么不可以久留？”

1982年11月24日上午，笔者访问叶帅时问道。

叶帅说：“那时候，王洪文搬到了西山，他住在离我不远的25号楼房里。这是专门来对付我的，他来监视我的行动来了！”

说到这里，叶帅的脸孔气得涨红了，眼睛湿

润了,稍停了一会儿,接着说:

“危险的时刻到了,王洪文很注意我啊!”

叶帅决心摆脱“四人帮”的监视。为便于同其他同志共商国家大事,当天他离开西山,转移到玉泉山九号楼了。

王洪文发现叶剑英搬家,气极败坏地质问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

“叶剑英怎么搬走了?你为什么要让他搬进玉泉山?”

汪东兴理直气壮地回答:

“那是周总理批给他的房子,他为什么不能搬呀?!”

“快打慢,快打慢”

叶剑英听了李先念的话,9月25日乘车进城。他特地来到东交民巷15号华国锋的住地。这里原是西哈努克住的地方,唐山地震后,他从史家胡同搬到这里。这一次他俩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叶帅说:

“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关系到国家兴亡的斗争,如果‘四人帮’上台,我们民族就会陷入灾难,国家建设就要倒退二十年。你是党中央的第一副主席,主席逝世了,你应该站出来,把舵掌起来!”

叶剑英还建议华国锋:“你要多到老同志那里去,找他们谈谈。”

华国锋听了这话,心中又喜又惊。喜的是,当此千钧一发之际,有叶帅这样的革命老前辈,旗帜鲜明地站在斗争‘四人帮’的第一线,给予他以最大的支持,成为党中央的坚强后盾和支柱。所惊者,像叶帅这样德高望重的老帅,为国家大计,不怕风险,竟再次前来探望他,使他深感到惭愧。想到这里,华国锋神情激动地说:

“叶帅,我经验少,资历浅,老同志能看得起我吗?”

“你去,我先帮你打招呼。只要你和‘四人帮’斗,老同志不会不欢迎你的。”叶帅热情鼓励华国锋,“老同志支持你,军队支持你,全国人民支持你,你只管干!”

华国锋得到叶剑英的鼓励和支持,深深感到党和人民的力量,坚定了除掉“四人帮”的决心。他神色严肃地说:

“只要有老师的支持,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支持,有广大人民的支持,有军队的支持,我一定干!”

华国锋搀扶着叶剑英,送老师上车。叶帅回到玉泉山的当天,对前来探望他的栗裕、宋时轮同志高兴地说:

“华的态度很坚决。你们要抓紧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取利乘时,间不容息!”

叶剑英为加快粉碎“四人帮”的步伐,第二天,又来到东交民巷15号华国锋的家里。他们共同分析了党同“四人帮”斗争的形势、性质和特点,一致认为,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伙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党中央同“四人帮”的斗争,是捍卫党的团结统一,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大原则斗争。这个斗争,已超出党内思想斗争的范围,不宜采取党内思想斗争的一般方式,必需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采取特殊的手段。但是为了避免动乱,又要做到合法解决。叶剑英说:

“对付他们,只能采取断然措施,先把这四个人抓起来,隔离审查,然后再开政治局会议或中央全会。特殊矛盾,只有用特殊的办法。”

华国锋听了叶帅的分析,十分高兴:“叶帅,我们的想法完全一样。他们几个犯有严重罪行,可以隔离审查!”

“乱子可能出一点,但出不了大乱子。”叶剑英进一步分析形势,“乱子可能出在‘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只要方法妥当,也可以避免。至于北京,一切优势都在党中央方面。”

说到这里,叶剑英尽管早已胸有成竹,但他仍然再次征求华国锋的意见:“你认为有把握吗?”

“有把握!”华国锋坚定地回答。

叶剑英提醒华国锋说:“郊区南口有个坦克团。听说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去过这个团。如果城内有行动,坦克开进城里,该怎么对付啊!”

华国锋对叶剑英的周密考虑,十分敬佩。他说:

“需要再了解一下。”

华国锋随即通过陈锡联、吴德对南口坦克部队的情况作了调查。证明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虽然曾来过个部队，但坦克部队一直是由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直接掌管的。“四人帮”虽曾想插手，但一开头就碰了壁，他们根本调动不了这支坦克部队。而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必需有中央警卫部队八三四一部队参加不可。

叶剑英向华国锋建议说：“你得再和汪东兴同志谈一下！”

汪东兴作为八三四一部队政委、中央警卫局局长，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同江青之间多次发生矛盾。江青曾辱骂过汪东兴、张耀祠同志和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是“反革命”、“特务集团”！

毛主席知道这件事后，批评江青说：“你说这些人是‘反革命’、‘特务集团’，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那就是我！”江青到处伸手，要往八三四一部队派人，也遭到汪东兴拒绝。江青向他索毛主席的文件，汪东兴也坚决顶住不给。

毛泽东生前曾对汪东兴说过：“江青是个纸老虎，一戳就穿。江青欺软怕硬，你们跟她斗，原则不能让。怕什么，还有我在嘛！”

华国锋向汪东兴谈了他同叶剑英的决策。在此之前，中办副主任李鑫在人民大会堂给毛主席守灵期间，也找过汪东兴，要他及早对“四人帮”采取行动。李鑫并且向华国锋谈过自己的想法。由于事前他们曾秘密作过这些酝酿，所以，当华国锋谈到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时，汪东兴并不感到突然。但考虑到张春桥是国务院副总理、总政治部主任，王洪文是党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他们都是可以下命令调动军队的人，心底确实有些提心吊胆，觉得还不是很有把握。万一走露风声，发生巨大的风险……

华国锋看到汪东兴内心有忧虑，淡然一笑，说：

“汪主任，你有把握吗？”

“有把握，有军队支持就更有把握！”汪东兴斩钉截铁地说，“只要党中央下命令，我就干。现在只能考虑党和国家的命运，个人的命运就不考虑了！”

“好！好！就这样办！”华国锋握着汪东兴的手，眼睛里闪着光辉，“我马上告诉叶帅！”

叶剑英明白了汪东兴的态度，连续两次来到中南海，在汪东兴家里，同他个别交谈。他俩进一步分析形势，分析“四人帮”的力量，以及他们近几天的动向。汪东兴焦急地说：

“事情非常紧迫。据我了解，张春桥最近两次到江青家里，每次都是几十分钟。”

叶剑英说：“不能再等待了，再推迟，不是我们解决他们，而是他们解决我们了！”

叶剑英以他几十年做最高统帅部工作的才华和经验，立刻意识到解决“四人帮”的时机已经到来。他熟知：“见而不发，人将先发，发而不敏，人将先收”的斗争策略。他果断地说：

“我们要快打慢，快打慢！”

小会议室的聚会

华国锋告笔者说，自9月29日在政治局会议上同江青吵架以来，无时无刻不在思考一个问题：江青一伙干扰党中央无法正常工作。江青的目的不是很明白吗？她公然在政治局会议上，敢于提出要给她分配工作问题，不断纠缠毛远新回辽宁工作的问题，大吵大闹，泼妇骂街……这不是明明想当太上皇、当党中央主席吗？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毛主席生前，早就做过警告，说江青有野心，要当党的主席，要王洪文当委员长。江青根本不把第一副主席放在眼里……

华国锋说，毛主席不是早在1975年就作过交待吗？他老人家说，“四人帮”的问题，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毛主席去世了。他没有完成的遗愿，我们活着的人应该去完成它。现在是解决“四人帮”的时候了！

但是，“四人帮”的问题究竟应该怎样解决？应该采取什么方式解决？用什么方式才最有利呢？……

这些日夜在华国锋脑海里翻腾的问题，1976年10月1日，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建国27周年大会以后，在中南海国务院小礼堂看电

影的时候，又像火一样的燃烧起来，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银幕上的故事、镜头，一个个在他眼前掠过，可是他却全像没看见似的。他睁着迷惘的眼睛，木然地看着银幕上闪过的情景，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思索最近“四人帮”的活动上。

蓦地，他紧皱起眉毛，揉了揉眼睛，腾地从沙发前站了起来。他挺着胸膛，大踏步走出电影厅，向休息室走去了。

同华国锋坐在一排沙发里的李先念，看见华国锋中途退出，立刻意识到，他一定有什么紧急事情。于是，他随即跟着华国锋快步走出影厅。他在后边大步紧走了几步，在靠近休息室的走廊里，赶上华国锋，低声问道：

“国锋同志，有什么事吗？”

“有！”华国锋回答。接着又说，“到小会议室谈吧！”

同华国锋一起看电影的还有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吴德。他看到华国锋、李先念相继退出影厅，也随即跟着他俩来到小礼堂小会议室里。

在此以前，华国锋曾分别同叶剑英、李先念、吴德、汪东兴等人，个别交换过对处理“四人帮”问题的意见。

这天晚上，当李先念、吴德同华国锋面对面坐在一起的时候，华国锋开门见山地说：

“我考虑再三，鉴于现在的舆论工具全部操纵在‘四人帮’手里，如果采取召开会议的形式，用通常解决党内矛盾的方式，来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必然会开动手中掌握的宣传工具，大张旗鼓地宣传，会在社会上造成混乱，带来很大损失。为避免引起混乱，我认为用隔离审查的方法，比较稳妥一些。你们认为这样行吗？”李先念、吴德听了华国锋的陈述，两人都表示同意。

李先念说：“国锋同志，你是中央第一副主席，这场斗争是你来领导的。只要你来领头干，人民是会支持你的！”

华国锋对吴德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北京的任务是稳定形势，解决问题，保卫首都，保卫党中央！”

吴德坚定地说：“北京市委和全市人民，坚决拥护国锋同志的决策，只要是中央的决定，我

们市委坚决去办！”

李先念同志嘱咐说：“一定要保证北京市不出问题，否则就会影响大局！”

紧张、热烈而又短促的会晤，把三个人的心紧紧连接在一起，相互握手，悄悄并肩走出小会议室。

“必须万无一失！”

“必须万无一失！”

叶剑英元帅的嘱托，时刻响在汪东兴的耳边。两天来，他废寝忘食，仔细考虑着组织这次行动的每一个细节，日夜同参加行动的人员个别谈话，布置下达任务。

汪东兴回忆说：“在组织具体行动时，我依靠的是张耀祠、李鑫、武建华三同志。”

10月3日深夜，李鑫突然接到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建华的电话：

“东兴同志要你马上来一下。他现在就站在电话机旁边。”

临走，李鑫对妻子樊宁说：

“我走了。我这是去做件杀头的事！”

妻子是李鑫地下党的战友和同学。解放后，两人又共同经历风浪。今晚，他要走了。此行是福还是祸？她清楚知道，对她个人可能是祸，而对千百万人民一定会是福啊！

樊宁告笔者，面对可能发生的严酷命运，两人都很平静，没有握手，没有拥抱。妻子睁大两只闪光的眼睛，镇定地说：

“你去吧！你杀头，我最多是当个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吧！要牵连也只有我和孩子……”

“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

李鑫登上接他的汽车，来到中南海，走进汪东兴的家里。汪东兴握着李鑫的手，激情地说：

“党中央决定，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要我们尽快做好准备工作，你能不能参加一些工作？”

“我听从中央的安排！”李鑫高兴地回答。

汪东兴立刻将李鑫引进家里的一间小屋里，向他交待说：

“你就住在这里，帮助中央起草文件。我派人给你送水送饭。我从外面把门反锁起来……”

李鑫建议说：

“在抓‘四人帮’的同时，我们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这样有利于稳定形势。”

李鑫建议中央要起草三个文件：

- 一、隔离审查“四人帮”的决定；
- 二、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五卷的决定；
- 三、关于建立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

这个建议，在汪东兴报告华国锋同意后，即由李鑫从10月3日到6日，“关”起来的三天三夜里起草出来。

在李鑫“关”起来的时候，他和汪东兴、武建华三人还具体商议了行动方案的细节。李鑫说：

“现在张春桥、姚文元想抓毛选，要毛选五卷材料要得很急。因此，用中央常委讨论毛选五卷的名义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调他们来开会，他们一定会来。过去中央讨论毛选工作的会议，都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他们肯定不会怀疑，一定会上钩的。”

华国锋、叶剑英批准了汪东兴、李鑫的行动方案。

扭正历史车轮，结束文化大革命灾难的特别行动，就这样决定了！

“天下之事，虑之贵详”。10月5日下午，叶剑英、汪东兴应华国锋的邀请再次来到东交民巷15号华国锋的住地，进一步共同商议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方案。他们根据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意见，充分考虑了可能发生的各种复杂情况，一致认为必须采取稳妥可靠的办法，解决这一尖锐复杂的问题。

叶剑英深谋远虑地说：

“这是一步险棋，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决战，行动要果断，更要周密，必须万无一失！”

华国锋完全同意叶剑英的意见。他说：“我已经同陈锡联、吴德作了部署。我告陈锡联说，北京卫戍区的部队由吴德指挥。陈锡联在我家里，马上打电话给北京卫戍区部队，归吴德统一指挥，负责维护北京的社会秩序，负责解决‘四人帮’在北京的几个死党！”

汪东兴谈了他准备好的具体行动方案。从

执行人员的挑选、隔离审查的地点、时间，以及每个细节的详细安排。他神情严肃地说：

“这件事，要绝对保密，行动要越快越好。时间拖得越久，越危险！”

对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决策，需要有果断的决策。这既需要智谋，更需要胆略和魄力。他们原定10号左右动手解决，后来，考虑到拖得越久越危险，越容易走露风声，于是，三人当机立断，一致决定：

“今天动手！”

四只螃蟹

根据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向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的建议，中央办公厅于1976年10月6日3时，发出当天晚上8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通知。会议通过的议程是：

- 一、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
- 二、研究毛泽东纪念堂的建筑方案；
- 三、研究毛泽东故居的安排。

按规定，通知除送给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外，还扩大范围送给了不是政治局常委的姚文元，请他来参加会议，在文字上对《毛泽东选集五卷》作某些修改，以便把姚文元从钓鱼台调到中南海。

1976年10月6日——这个铭刻在历史纪念碑上的日子，时间仿佛过得特别快。华国锋为此特地打电话给姚文元说：

“今天晚上，常委开会研究毛选五卷的修改问题，请你来参加一下。”

姚文元说：“好！我一定按时参加！”

提前两天集中到中南海执行任务的人员，在一座古旧的小院里，紧张期待着夜晚的到来。院里静悄悄的，没有笑声，没有人语，但是每个人的心里都像一锅沸水在翻腾。叶剑英办公室的警卫参谋纪和富对笔者回忆当时情景说：

“我们提前到了秘密集合点。临走，我对爱人说，我有任务要到外地出差。我不能给你打电话，也不能给你写信，你也不要告诉孩子们。这

是秘密行动!”

他准时到了指定地点。一看在场的都是一些熟悉的同志。汪东兴也在那里,他数了数到场的每一个人,宣布了几条纪律,接着就简短的动员说:

“同志们,江青一伙坏蛋,要搞垮我们党……要让我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汪东兴环顾着每张兴奋的脸孔,胳膊支在桌子上,坚定地说,“我们都是保卫党中央的战士,我们能允许他们一伙横行霸道吗?能让他们继续作恶吗?”

同志们低声而坚决地回答:

“不能!”

“一切听从指挥,服从命令!”

“下命令吧!”

华国锋通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的时间到了。

执行任务的同志,提前3个小时,到达中南海怀仁堂。他们各自坚守在预定的岗位上。

这里的一切都安静如常。

夜晚降临,月亮升了上来,在满地重重的树影上,一辆黑色红旗轿车,穿过柏油路,从玉泉山向城内驶去。一盏盏路灯像飞飘的流星,一闪而过。

叶剑英仰靠在后垫上,两目专注着夜暗里的灯光。这位在战争年代协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运筹帷幄,决战千里之外的革命家,此刻心情欢快而平静。一想到马上就要到来的战斗,他紧紧握着曾经在“二月逆流”会上拍桌折伤了的那个手指骨,脸上泛起了微笑。

叶剑英准时来到中南海怀仁堂。他一下车,就见华国锋、汪东兴的车已停在那里。俩人站在大红门前迎接他。

华灯向夜空射出白光。怀仁堂如同往常一样宁静。所不同的是,今天来到怀仁堂的人,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微微感到一点紧张。集中在大门过厅里的执行人员,机警地听着门外传来的汽车声。经验已使他们能够从汽车声里,辨认出这是谁的车辆。

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在警卫人员的护卫下,走进怀仁堂的会议室。

这宽敞明亮的老式会议室,天花板装饰有

淡淡的图案花纹,一串串玻璃吊灯射出柔和明亮的光线。四周地面上全铺着地毯。四壁又高又宽的玻璃窗,全都拉上洁白的窗纱。正厅中间摆设着几排沙发、茶几。沙发后面靠门的地方竖立一架雕花屏风。简朴的陈设,使厅堂显得格外古朴、雅静、端庄。

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简单交谈了几句,就各就其位了。

华国锋脸上带着平静而严肃的表情,挺立地站在正厅会议室中央的地毯上。

叶剑英庄严威武地坐在中间的大沙发上。全目不转睛地盯着会议室进门的走廊。意料中的事情就要发生了。

汪东兴走进紧挨沙发的屏风后面,隐蔽了起来。他为保障华国锋、叶剑英的安全,右手提一支手枪。

时钟将近晚八点钟,张春桥第一个到了。他像往常一样,仰着脸,戴着眼镜,慢条斯理地走进怀仁堂。他穿过走廊,刚走几步,四个警卫干部强有力的手,扭住了他。这时是8点零2分。

“干什么?干什么?”张春桥扭头挣扎了两下,手铐“咔”的一声响了,执行人员把他连推带拉,弄到华国锋、叶剑英面前。

华国锋庄严地向他大声宣布:

“‘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党中央决定对你进行隔离审查!”

张春桥恶狠狠地说:“你以为你们胜利了吗?不,无产阶级革命派会和你们算账的!”

叶剑英愤怒地大喝一声:

“对你们的罪行是会清算的。你们干了多少坏事!迫害死多少干部!人民要审判你们!”

接着,王洪文第二个到来了。他像往常一样趾高气扬,穿一身军装,一下车,快步跃上台阶,跨进怀仁堂大门。在他穿过走廊,走进会议室时,四位高大体壮的警卫干部逮捕了他。

“不准动,把手举起来!”

王洪文很快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他大喊一声:

“你们要干什么?”

王洪文接着飞起一脚,向冲来的干部踢过去。他猛力挣扎着,由五米远的地方向华国锋、

叶剑英扑了过去。另一干部冲了过来，一只拳头打在他左侧太阳穴上，接着又飞步踢过一脚，将他打倒在地。

王洪文扭着头，像受伤的野兽，恶狠狠地咆哮：“想不到你们动手这么早！”

王洪文被擒拿了。行动组给他戴上手铐，从地上把他拉起来，推到华国锋、叶剑英面前。

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向他宣布：

“‘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党中央决定对你进行隔离审查！”

姚文元第三个到来，他还没有走进正厅，就在东侧的休息室里，几乎毫无抵抗的束手就擒了。他惊恐地瞪着两只金鱼眼睛，吓得后退了两步，瘫倒在地上。同志们把他从地上拖起来，一滴一滴汗珠，从额头上滚下。他低垂着头，连声说：

“我有错误，我愿检查！”

华国锋对姚文元指了一指，他没有亲自宣布，而是委托中央警卫局的一位副局长代他宣布：

“‘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党中央决定对你进行隔离审查！”

江青没有来怀仁堂开会。

江青在干什么呢？

江青继续在做她的“女皇”梦！

这天，10月6日，星期三上午，据摄影记者

杜山回忆，江青集合毛泽东身边和江青身边的七八个工作人员在学《毛泽东选集》。她自己也很清楚，这只是装装样子，标榜她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者。正当大家集体吟读的时候，江青突然一声高喊：

“你们知道中央谁反对毛

主席？”

大家惊讶地面面相觑，谁也不敢接她的话头。江青看见大家很茫然，似乎很开心，拍了一下大腿：“万里！”

江青看见杜山摇头，朝着他说：“你不信，哼，告诉你们，谁反对毛主席我都知道，这种事休想瞒过我！”

这天下午，江青又同工作人员一起，从景山公园后门进入景山的苹果园。她得意地对杜山说：“我们在这里劳动了好几次，特意留了几棵苹果树，今天摘，照些照片。老杜今天看你的啦！”

江青登上事先准备好的架子，让人七手八脚的扶着她，往手边挂的一个小竹篮里放摘下的苹果。摄影记者立刻按动快门，留下她最后自由的瞬间。

6日下午3点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给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局长由汪东兴兼）、中央警卫团少将团长张耀祠打电话：

“你马上到我这里来一下！”

张耀祠是1933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在红色中华首都江西瑞金沙洲坝中央警卫连，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站岗放哨。1953年5月调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即八三四一部队）一直担任中央首脑机关的警卫工作，



华国锋接见作者(1998.2)

指挥着 8000 人的队伍。

张耀祠是汪东兴的老同事老战友。当他来到汪东兴的办公室的时候，中共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建华也来到了这里。

汪东兴以缓慢的声调，严肃地说：

“中央研究决定，粉碎‘四人帮’！”

接着，汪东兴指定张耀祠担任隔离江青小组的负责人，并通知张耀祠、武建华说：

“你们准备一下，今晚 8 点半行动——顺便把毛远新一起解决。”

张耀祠、武建华离开汪东兴以后，把这项高度机密的使命向几位警卫作了交待安排。而他们对于如何逮捕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安排则不清楚。

张耀祠、武建华对中南海地形了若指掌。晚上 8 时半，张耀祠穿着便衣，连手枪都没有带。随身带的几个警卫，虽穿着军装，但也没有带手枪。他们沿着熟悉的道路，首先来到距江青住地很近的中南海颐年堂后院。毛远新就住在这里。

当张耀祠走进毛远新屋内，向他宣布，根据中央决定，对他实行“保护审查”时，还当场要他交出手枪。

毛远新一听，大声说道：“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他拒绝交出手枪。

张耀祠身后的警卫们立即上去，收缴了毛远新的手枪，三把两下将他押走了。

在解决了毛远新之后，张耀祠和武建华带着三位警卫，来到江青住地中南海万字廊 201 号。毛泽东病重期间及去世后，江青离开钓鱼台，住在这里。

张耀祠对江青住地警卫十分熟悉，门口警卫见警卫团长来了，点点头就让进去了。这时，江青刚吃过晚饭，正在沙发上闲坐。她见张耀祠进来，朝他点了点头，仍然端坐着。

张耀祠在江青面前站定，庄重、严肃地宣布说：

“江青（往日他总称江青同志，这一回没有了‘同志’二字，江青马上投来惊诧的目光），我按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到另一个地方去，马上执行！”

“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

江青听罢，一言不发，仍然坐在沙发上。沉着脸，双目怒视，但并没有发生传闻中所说的“大吵大闹”，更没有“在地上打滚”。

江青沉默着，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这才慢慢站了起来，从腰间摘下了一串钥匙——她总是随身带着保险柜的钥匙，并不交给秘书保管。

江青取了一个牛皮纸信封，用铅笔写了“华国锋同志亲启”七个字，然后放入钥匙，再用密封签把信封两端封好，交给了张耀祠。

张耀祠当即吩咐江青的司机备车，押上她平常乘坐的那辆专车，武建华上了车，轿车仍由江青的司机驾驶，驶往中南海的地下室。

10 月 6 日夜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被捕后，也都被关进中南海地下室，只是关在不同的房间里，而不是像传闻所说的“连夜押往秦城监狱”。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江青对于自己的末日，早有准备和预言。据机要秘书张玉凤 1976 年 10 月 22 日揭发，1973 年 10 月，江青来见主席，提出要一笔钱。江青走后，主席痛心地对张玉凤说：

“他们看不行了，为自己准备后路。”

说着，主席流着泪，从自己过去的稿费中批了三万元钱，叫张玉凤去办。当张玉凤把钱给江青送去时，她一边接钱一边说：

“小张，这些钱对我来说是不够的。我跟你不一样，将来我是准备杀头，坐牢的，也可能不死不活地养着。”

江青的预言，为后来的事完全证实了。

北京卫戍区的执行人员，也在同一时间，在迟群、谢静宜的住地逮捕了他们两个人。

中央政治局顺利地执行了党和人民的意志！

彻底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情况，很快汇报到怀仁堂正厅。正在焦急等待的叶剑英元帅，听到胜利的喜讯，脸上露出了笑容，兴奋地说：

“好！没有放一枪，实在太好了！”

这场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的战斗，不

到一个小时,就胜利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

玉泉山的黎明

逮捕“四人帮”以后,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一同到了玉泉山。

1976年10月6日晚上10点钟,党中央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到玉泉山叶剑英住的九号楼,开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当时不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韦国清、李德生、赛福鼎等,由汪东兴在电话上向他们通报了粉碎“四人帮”的情况。他们热烈拥护和支持这一正确的措施,认为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非常手段,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是继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又一伟大胜利。

这一没有枪声的战斗,挽救了党,也挽救了革命,是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

这是一个满天繁星的深夜,在通向玉泉山的公路上,一辆辆闪着灯光的小轿车,响着急促的喇叭,从四面八方疾驶而来。

九号楼的会议室里灯火辉煌。激动、兴奋、欢腾的气氛弥漫着全场。

好多年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象了。老同志们都像一下变得年轻了一样,又是说,又是笑,又是喧嚷,相互紧紧握手、拥抱、拍肩膀。他们不约而同地问道:

“有什么好消息呀?”

“别急,等等就知道了!”

大家把专注的目光集中在小小的主席台上。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正在商量着什么。突然,主持政治局会议的叶剑英,以洪亮的声音,压倒了一切人语音。

“同志们!今晚召开一个紧急政治局扩大会议,”叶剑英满脸笑容,“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

一阵热烈的掌声迸发起来,久久不停。一个个凝神屏息的面孔,立刻又静肃下来。

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向政治局扩大会议详述

了“四人帮”的罪行。

华国锋说,10月6日,为了粉碎这个将给中国人民带来更严重灾难的反革命集团,党中央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

他的话音未落,全场爆发起欢呼和掌声。

接着,华国锋回顾了党中央与“四人帮”斗争的历程。

毛主席早在1974年7月17日,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严厉批评江青说:“不要搞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你也难改呢”。

毛泽东还批评了“上海帮”。毛泽东说:“她(指江青)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毛泽东一再说,“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但是,“四人帮”毫不悔改,在四届人大前夕,大搞结帮篡党活动,阴谋组阁夺权。他们经过密谋策划,背着中央政治局,于1974年10月18日,派王洪文到长沙向毛主席诬告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

毛泽东当即批评王洪文。“四人帮”不服,又由江青出面,给毛泽东写信。毛泽东1974年11月12日在信上批示: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江青不听告诫,竟然又托人向毛主席提出要王洪文当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1974年12月23日,毛泽东又指出:

“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

12月24日,毛泽东又一次批评他们:

“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

毛泽东还当面批评王洪文:“你不要搞‘四人帮’。”

“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

人不好,历来不好。”

毛泽东鉴于“四人帮”的猖狂宗派活动,再次明确指示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

“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华国锋说,“四人帮”是同林彪一样的反革命两面派。“四人帮”利用毛主席病重和逝世的特殊情况,利用他们据有的地位和权力这种特殊条件,使这次斗争更为复杂和艰险。但是,不管“四人帮”伪装得多么巧,隐藏得多么深,我们党终于把他们揭露出来,把他们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华国锋激情地说:“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使我们党避免了一次大分裂,一次大流血,使我们的人民避免了一次大灾难,使我们的事业避免了一次大倒退。这次胜利,再次证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军队是伟大的军队!”

全场又一次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叶剑英讲话的时候,全场怀着分外激动崇敬的心情,用掌声向他致敬。大家都知道,在这场特殊的战斗中,他起到了一个重要组织者、指挥者的作用。

叶剑英说,粉碎“四人帮”是完成毛主席生前没有来得及做的事。他说,毛主席一直对江青有批评、有约束、有限制。毛主席同“四人帮”的斗争,有很重要的两着棋。

第一着棋,是1974年、1975年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当着在京政治局全体同志的面,提出江青和“四人帮”的问题,批评了“四人帮”忘掉了“三要三不要”的原则,批评他们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毛主席反复声明:“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1975年,毛主席再次强调说,“四人帮”的问题一定要解决,这表明毛主席早下了坚定明确的决心。

叶剑英说,毛主席还有一着棋,就是组织安排。周总理病重以后,“四人帮”以为,按照原来的次序,政治局应该由王洪文主持,国务院由张春桥主持,但是,毛主席就是不给他们,给了邓小平同志。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们就集中力

量打击迫害邓小平同志,直到周总理逝世。

叶帅说,邓小平同志被他们推下台以后,他们认为,这应该让王洪文主持政治局了吧,张春桥应该是总理了吧。但是,毛主席还是不给。最后选定了华国锋同志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

叶帅说,为什么要下这盘棋呢?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这是重大战略决策。

叶帅说:毛主席这两着棋,非常英明,为政治局后来解决“四人帮”问题奠定了基础。我们想一想,要是没有毛主席作出这样的组织安排,要是没有毛主席在两次政治局会议上交了底,我们党同“四人帮”的斗争会遇到怎样的困难。这次粉碎“四人帮”,首先要归功于伟大领袖毛主席……

紧张而热烈的会议,连续开了7小时。最后,一致选举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76年10月7日黎明,当与会者散去分片分口传达的时候,人们可以看到一道亮光,从东方升起。淡蓝色的晴空下,朝霞辐射着红艳艳的光芒,照耀着玉泉山的山峰。

这时,九号楼仍然灯火通明,电话铃久响不息。

叶剑英立即将喜讯通知被软禁在西山的邓小平和陈云等其他老同志。

陈云高兴地说,叶剑英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做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

其他老同志都激动地说,叶帅为我们党和国家立了不朽的功勋。

叶帅派人看望胡耀邦的时候,胡耀邦激情地讲了“中兴伟业,人心为上”的名言。他说:“第一,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而这三句话,就成为后来他担任党的总书记时的工作纲领。

邓小平对党和人民的胜利,感到万分喜悦。1976年10月10日,他在写给党中央的祝贺信里写道:

“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

斗争，是在伟大领袖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的胜利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动。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四人帮”被抓的消息，迅速在群众中传播开来。人们奔走相告说，现在逮住了四只螃蟹，三只公的，一只母的！

在家庭里，在招待所里，在街道的酒馆饭铺里，人们自发的狂欢集会，庆祝党和人民的伟大胜利。有位将军因为太激动，犯了心脏病，被抬进医院里。

中央电台的插曲

这里需要写一段控制中央广播电台的插曲。

占领并控制舆论阵地，例如，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中央舆论机关，是粉碎“四人帮”这一历史决战的重要部署之一。

控制人民日报、新华通讯社，由中央指定的专门工作组执行。而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则是由耿飚将军执行的。耿飚同志 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四军师参谋长、十九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建国后任驻几个国家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中央联络部部长。

10 月 4 日下午大约两点钟，华国锋打电话给耿飚，要他到家里来一下。耿飚随即来到华国锋家里。华国锋刚向他谈起“四人帮”的问题，耿飚就性急地说：“你分配什么任务，我都干！”

华国锋爽朗地笑了一笑，单刀直入地反问过去：“我还没有跟你说呢，还没有给你分配任务，你怎么知道，我要你干什么呢？”

耿飚心中一动，马上笑着说：“我已经有所察觉了。”

“那好吧！”华国锋开门见山，说话不再绕弯：“这几天，你呆在家里，不要离开。要经常和我保持电话联系。”

稍停片刻，华国锋又具体交待：

“我的秘书或别人来电话，你都不要相信。只有我亲自打电话，你听出是我的声音，你再讲话，你明白了吗？”

耿飚将军严肃地点点头，心领神会地说：“我完全明白了！”

耿飚呆在家里，整天守在电话机前，焦急地等待着。往常他都由秘书或家人接电话，可是，这两天却一反常态，只要一听见电话铃响，他就像士兵接受命令那样，心上激动得直打颤，急忙抓起电话机来。

他一听对方口音，不是山西口音，马上把话截断。他自己也感到奇怪，打了几十年仗的人，竟然也会被即将到来的事激动得寝食难安。

突然，那台红色的电话机响了。他三步并作两步走了过去，脸上显出狂喜的神色，抓起耳机来。

“你听出我的声音了吗？”

浓重的山西口音从对方电话中传来。

“听出来了。现在就去吗？”耿飚又问。

“你直接到怀仁堂来。”

耿飚立刻跳上汽车，直奔中南海。当他到来的时候，华国锋、叶剑英都已等候在会议室里。华国锋兴奋地对耿飚说：

“我们已经采取行动，并且取得了胜利。王、江、张、姚已被隔离审查。现在派你到中央广播电台去，控制广播电台。还有一个卫戍区邱卫高副司令跟你一块去。”

叶帅紧紧握着耿飚的手，慢声嘱托说：

“要注意两条，一、要防止内部混乱；二、要防止向外泄密。你要防止发生异常情况，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

邱卫高副司令员来到了。耿飚将军望着他，径直问他：

“你带武器没有？”

邱卫高坦率地说：“没有！”

“你要带武器。”耿飚威严地望着他：“光你一个人不行，你下边有部队吗？”

邱卫高说：“广播电台有一个警卫营。”

耿飫又问：“这个营是那一带的？要团长跟我们一块去。”

华国锋同志问耿飫：“你要不要带手枪？”

耿飫说：“手枪不必带了，但是须要你的手令。”

华国锋说：“好！”当即提笔给当时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写了一道手令：

“邓岗同志：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飫、邱卫高同去。你们要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 华国锋 十月六日”

耿飫挺直高大的身躯，默默地把信看了一遍。他转身对邱卫高说：“光我们不行。请你把守卫广播事业局的警备一师的副师长找来，和我们一块去。”

临出发前，华国锋同志又一次向耿飫交待说：“一切交给你去了。总的原则是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内部已发生了变化，但外面不要让人看出异常来。”

耿飫、邱卫高和一师副师长王甫三个人，马上乘车急驰中央广播电台。这时已经夜里10点钟了。警卫营长马上按照首长的指示，挑选了20名战士，耿飫随即带着10名战士直奔局长邓岗的办公室，把华国锋的手令交给邓岗。

邓岗一面看着信，一面竭力抑制住自己的紧张情绪，把剧烈跳动的心压抑下来，他抬起头，看着耿飫逼人的目光，立刻明白了一切，嘴唇歛动了几次，却又说不出一句话。他动也不动地站在办公桌前，只觉得脊梁上沁出一层冷汗。

“你们要想打电话吗？”

耿飫用威严的声音打破了沉默。他向办公室扫了一眼，用手指指电话机，脸上挂着笑容，嘲笑地说：

“你向姚文元请示也可以。电话就在这里打，你打吗？”

邓岗和耿飫两人相对而望。耿飫的目光像一把钢锥望着邓岗，邓岗也以洞察一切的眼睛，注视着耿飫。这两位同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干部，“文革”中都被当做“走资派”挨过批斗，

对“四人帮”的共同仇恨，把他们的心连在一起了。

“我不打。”邓岗心领神会，果断地说，“我不打电话，我没有什么请示的。”

“那好！那好！”耿飫那张饱经战火风霜的脸，突然浮起了微笑。他兴奋地用手搔着满头白发，用变得温和的口气命令说：

“请你把电台党委的成员全部找来，开紧急会议！”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党委的全部成员，准时到来了。待他们都在办公室坐下以后，耿飫以军人特有的作风，立即命令一个卫兵，在门口站起岗，不经批准，其他任何人都不准进办公室来。在紧张的沉默里，党委委员们立刻明白发生的事情了。

“同志们，从今天起，我和大家在此一块办公。”耿飫用洪亮的声音宣布说。同时，用目光注视着每一个人的脸上的表情。他说：

“各位至少在三天之内，不许离开这间房子。吃饭、喝水，军队会给送来。”

耿飫宣布纪律的目的，是确保秘密，不使粉碎“四人帮”的消息过早泄露出去。他和电台的负责同志一起，挤在办公室里，同吃、同住、同睡，连鞋袜也不脱，在地板上睡了十夜，夜以继日地战斗了十天十夜。

接管中央党报

在决定派人接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同时，还决定接管人民日报和新华通讯社。

这时，正在唐山抗震救灾第一线，顶着酷暑炎热，冒着余震，夜以继日地在废墟上战斗的北京军区副政委迟浩田同志，在1976年10月6日深夜，接到中央办公厅电话，要他明天赶回北京。

迟浩田一时忧心忡忡，迷惑不解，不知等待他的是凶还是吉。他在写给《人民日报》的一篇回忆里写道：“一个人的命运总是同党和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的。想想林彪、“四人帮”给我们党带来的巨大灾难，自己就是再受点委屈，甚至作

出牺牲,又算得了什么!”

10月7日,他回到北京,一下飞机就被一辆黑色的卧车,接进了中南海西楼会议室。迟浩田回忆说,一进门,就看到了耿飊、孙轶青、刘西尧同志。耿飊同志一见我,呼地站了起来,迎着问:“你是迟浩田同志吗?”我说:“是。”他一把握紧了我的手,大声地说:“你来了,我真高兴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四人帮’被我们抓起来了!”

迟浩田回忆说,耿飊同志双臂就要拥抱我。我对这位长期从事外事工作的耿大使所用的西方礼节虽不习惯,但又毫不迟疑,也张开双臂迎了上去。我们两个紧紧相拥,从桌前坐到沙发上,从沙发滚到了地毯上。我们可等到这一天了!我们终于胜利了!一种解放了的轻松感、胜利了的幸福感,顿时充溢了周身的每一个细胞。我们的双臂久久地相抱,我们的泪眼久久地对视,总觉得有千言万语,一时难以启口。

不一会儿,耿飊同志的脸色严峻起来,猛地一拍桌子,说:“我们要去夺权,我们要把‘四人帮’抢去的舆论阵地夺回来!”

正说着,纪登奎同志走了进来,热情地与我握手,他说:“浩田同志,这次叫你来,是想给你个任务。”稍顿了一下又说,“上次你在军报,落了个‘复辟’的罪名,把你搞得好苦,那是‘四人帮’搞的。这次让你到人民日报去,再搞一次‘复辟’,把权夺回来。我们研究了一下,觉得你是最合适的人选。你愿不愿意去呀,啊?”

人民日报?!一听说又是到报社去,我不由得犹豫了一下,说:“可以。”

这时纪登奎同志说:“时间紧迫,任务很重。中央决定由耿飊同志牵头,主管宣传口。你们研究研究吧,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说罢就走了。

耿飊说:“浩田同志,你既然在解放军报干过,咱们就有经验了。我们先分分工吧,我到新华社,刘西尧到光明日报,你和孙轶青到人民日报去。你先拿出个方案来,看怎么办好。”

迟浩田回忆说:鉴于“四人帮”被抓起来还处于保密阶段,我建议:兵贵神速,马上进驻。用句军事术语,就是赶快抢占阵地。

他们都同意我的意见。耿飊同志让我和孙轶青商量个进驻人民日报的办法,给他们作个“示范”。

我和孙轶青同志商定:首先和“四人帮”的亲信、也就是当时人民日报的那个负责人谈话,把我们商量的三条意见公布给他,看他的态度如何;同时请中央给我们写封到人民日报工作的介绍信。

耿飊同志很赞成我们的方案,说:“事不宜迟,马上通知他来。”

他们几位坐到里间屋内,我和孙轶青在外间屋里等那个负责人。

对那个负责人,早闻其名。他在人民日报闹出的许多笑话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现在说起来,不仅可笑,而且可悲。让这样的人来管党报,不是对历史的嘲弄吗?

中央的介绍信很快就拿来了。

不一会儿,那个负责人坐着红旗车来了。他稍高的个儿,长长的面庞,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进门后一声不吭,看了我们一眼,就坐下了,背往椅子上一靠,二郎腿一跷,摆出一种莫名其妙的威风。

迟浩田说:我强压了压火气,极力用缓和的语气说:“你是鲁瑛吗?”他“嗯”了一声。我说:“你认识我吧?”他眼皮也没翻,慢腾腾地说:“你不就是那个曾在解放军报干过的迟浩田吗?听说你到北京军区当副政委去了。”

我没再理他的话茬,该谈正事了。我说:“既然认识,那就不用介绍了。”他仍旧跷着二郎腿,依然一副天是老大他是老二的架式。我说:“我受中央的委托给你谈一谈,先请你看看这封信。”我把中央的那封信放到他的跟前。他满不在乎地展开信纸,看着看着,脸上的肌肉开始收缩了。

信的内容大体是这样的:

兹介绍迟浩田、孙轶青等三同志到人民日报工作,人民日报宣传的问题要请示他们。

落款是华国锋。

看过信后,鲁瑛的二郎腿就放下了,背也不靠在椅子上了,眼神一个劲地打楞。我严肃地对他说:“我告诉你,中央里经常插手人民日报的

那几个人已经倒台了。现在我向你宣布三个问题：一、中央决定，过去管人民日报的那几个人，从现在起不能再领导人民日报了；二、我们受中央的委托到人民日报工作，在宣传、版面上要请示我们，不得擅自作主；三、你要服从中央的命令，听从中央的指挥，不能搞小动作，不能泄露机密。在关键时刻你要接受考验。等会儿我们坐你的车一同去，马上召开报社领导小组成员会议，宣布中央的决定。”他呆呆地看着我，我问他：“听明白了没有？”

鲁瑛赶忙站了起来，答非所问地说：“是，是。”

到了人民日报，立刻通知报社领导小组开会，我对鲁瑛说：“你先给大家念念中央的通知吧。”

鲁瑛说：“是。”他站了起来，一本正经地念道：“中央决定，迟浩田、孙铁青等三同志到人民日报工作，在人民日报宣传工作上参与集体领导。你们要服从领导，具体事项由迟浩田同志当场宣布。”

迟浩田说，我们开门见山：“先告诉大家一个大快人心的好消息，‘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打倒了！过去经常插手人民日报的那几个人，现在不行了。他们在人民日报犯下了一系列罪行，党和人民是不能容忍的，是要清算的。人民日报从现在起要听党中央的，要执行正确路线，不能宣传那些奇谈怪论了。这是第一点。第二，我们到人民日报工作，愿意和大家通力合作，把人民日报办好。希望大家同心协力，把应该干的工作干好，让全党全国人民放心。第三，在关键时刻，每个同志都在经受着考验。在座的有的同志可能会不高兴，感到突然，这也不奇怪。不过，谁唱反调，谁逆流而动，谁就没有好下场。我再说一遍，我们是受党中央的委托来的，我们会严格按照中央的指示办事，照中央的政策办事。”

迟浩田回忆说：为了使新生的人民日报更好地传播党中央的声音，就在这天夜里我们又组织了另一场战斗——突击写社论。当时，大家多么想利用夺回来的阵地，首先把粉碎“四人帮”的特大喜讯，告诉给全国人民啊！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当时还不能这样做。怎么办呢？我们

和大家一起议论了一阵，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命题，确定社论的题目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写的是筹建毛主席纪念堂和出版毛泽东选集的事，同时，也把大家对粉碎“四人帮”的喜悦心情溶化进去了。

10月10日凌晨4时，党中央审定的《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以“两报一刊”社论的名义发表了。

10月10日凌晨，党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作出两项决定：《关于建立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

当天，《人民日报》等中央报刊，以大字标题头版头条刊发了这两项决定。

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粉碎“四人帮”的通知：

“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代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采取了断然措施，解决了这个重大问题，消除了党内一大祸害，这是一次伟大的胜利！”

* * * * *

从10月21日起，首都军民580万人，连续几天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与此同时，上海、天津、沈阳、成都等全国各大城市都先后举行了集会游行，欢呼：

“我们党胜利了，无产阶级胜利了，人民胜利了！”

是的，我们的党胜利了！这个胜利是在付出巨大牺牲和代价后，在特殊历史条件下，采取非常手段取得的。

从血的历史教训，党和人民不能不思索许多问题。怎样才能避免类似十年浩劫的灾难呢？

答案只有一个：必须把权力交给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在逐步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军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进行改革开放，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全文完）

刘志丹的悲壮人生

□ 傅国涌

陕北是中国最贫穷、落后而且人口稀少的地区之一，在1928年到1933年间，饥荒席卷了中国西北部，土匪蜂起，军阀横行，饿殍遍野。刘志丹这个“乱世的豪杰”就出生在这片动乱的、贫瘠的黄土高原上。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说他“是个现代侠盗罗宾汉”，“惩奸除恶的天鞭。”这位“陕西罗宾汉”的一生是坎坷的，他牺牲后，毛泽东为他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他的一生虽然只活了三十二年，却是充满了传奇。

官逼民反

刘志丹1903年出生在陕西西北部群山怀抱的保安县(后为纪念刘志丹，改称志丹县)。爷爷是清朝的拔贡，以教书为业，父亲是个秀才，开一家小小的柴草店。因他是8月出生，爷爷为他取学名“景桂”，字“子丹”(后来他自己改名为“志丹”)。

刘志丹从小熟读四书五经，并且是保安县第一高等小学堂的第一批十二个毕业生之一，毕业后考入榆林中学。

榆林中学是陕北二十三县惟一的一所中学。校长杜斌丞毕业于北京大学，在西北名重一时(四十年代他是民盟在西北的领导人，被国民党杀害)。学校不但从北京请来了一批名牌大学毕业生，还请了一批德高望重的前清遗老、翰

林，以示新旧并重，办学风格颇似蔡元培。图书馆内订有《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新文化运动时的著名刊物，所以榆林中学虽地处黄土高原、西北内陆，却并不闭塞，刘志丹正是在这里受到了五四运动的影响，受到了民主和科学的启蒙，特别是从北京来的国文教员魏野畴对他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正是在魏的指导下，榆林中学成立了学生会，刘志丹当选为学生会主席，又组织了社会科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时事研究会、剧社、画社、篮球队等，还出版油印刊物。刘志丹勤奋好学，思想敏锐，在这里开始接触到《共产党宣言》、《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政治经济学原理》等，并写下了小说《官逼民反》，出于对穷苦百姓的深厚感情，以天下为己任的刘志丹，萌生了走向社会、唤起民众的思想。

在榆林中学期间，刘志丹先后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和进步组织“共进社”，并加入了共产党。

1925年五卅运动后，刘志丹和几个同学一起取道山西、北京、上海到广州投考黄埔军校，是黄埔第四期学生。

1926年7月，刘志丹带病参加北伐战争，随东路军出发，在江西吉安前线受命调到北方冯玉祥的国民军工作，先后担任过国民联军驻陕总部组织科长、宁夏的四路军政治处长(该军司令马鸿逵)。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形势剧变。冯

玉祥以“集训”名义，把全军的政治工作人员（共产党员）解除武装，监押在开封宫驿街三道胡同第二中学，一个个审查。出名的32个共产党员则另行看管，刘志丹也是其中之一。十多天后，他们被押上一截铁闷子车驱逐出境。在武胜关脱逃到武汉后，才看见陕西、河南的报纸上都登着冯玉祥捉拿32人的通缉令。

发动渭华起义

刘志丹等人到汉口找到中共中央，有的被派往苏联，有的留下做宣传工作，有的派到南昌参加起义，刘志丹在东路军工作过，被派回原部队组织武装起义，配合南昌行动，他辗转到了皖南，刚一动手就被发觉，兵败后逃往上海，又被派回西北。

他回到西安任中共陕甘区委军委负责人，这时候刘志丹的思想已经十分明确——只有抓起枪杆子。1928年5月起义爆发，成立了西北工农国民军，全军近千人，刘志丹被推为军委主席，同时陕西省委也任命他为领导起义的军委书记。



志丹县的雕塑

渭华起义东路以华县、渭南、临潼为中心，西路以渭河以北的三原、富平等为中心，南路以蓝田、商县为中心。其中，又以东路的渭南、华县为中心，普遍成立了苏维埃政权，故称渭华起义。

6月19日，渭南起义在宋哲元三个师的兵力进攻下失败了。陕西到处贴着“缉拿渭华暴动匪首刘景桂”的布告。刘志丹被派往陕北担任特委的军委书记，他一路走回陕北，几次遇险，总算死里逃生。在极为艰难、危险的处境下，刘志丹冷静地总结了渭华起义失败的教训，如军队太少，又靠着要道，死打硬拼等。他认为西北军阀派系多，广大农村是他们统治最薄弱的地方。陕甘交界的大山中，出了许多山大王，历代统治者都拿他们没办法，就因为他们有枪杆子，有地盘。搞武装，建立自己的军队，创立农村根据地这些思想已在刘志丹的脑子里生了根。从此他就踏上了一条几经曲折、历尽艰难的建立红军和根据地的道路。在一个暴力传统深厚的国家，在西北这片广袤的黄土地上，没有呼吸过现代文明空气的刘志丹不可能想到另外的出路。

创建陕北根据地

刘志丹回到陕北这片熟悉的故土，千方百计地抓武装，拉队伍，几经挫折，屡仆屡起。他又一次拉起游击队。

一系列的失败使刘志丹清醒地认识到，要发展武装斗争，必须有一块巩固的根据地。他用了一年时间，走遍陕北的黄土高坡，通过实地考察，他选中了敌人力量薄弱的南梁山区。他熟悉陕北的山山水水，只要花心血经营这个地区，就可以支持长期的游击战争。1932年2月，他的南梁游击队和西渡黄河的晋西游击队会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刘志丹受命于危难之际，指挥红军陕甘游击队转战渭北，老百姓编了歌谣到处传唱：“红军马踏十三县，威名震西安，五月打韩城，县官发了懵，西安哇哇叫，调来同州兵。”

1932年12月，红二十六军正式成立，1934年红二十七军成立，并先后开辟了以照金为中心的根据地和神府根据地、陕北根据地。在长期

的军事斗争实践中，刘志丹把他的游击战术发挥得淋漓尽致，成为陕甘红军的灵魂人物，国民党到处贴告示：活捉刘志丹赏一万大洋。难怪毛泽东对贾拓夫说：古时候陕北出了个李自成，当今又出了个刘志丹，你们陕北果真是出人才的地方啊！

1934年和1935年间，他领导的红军迅速扩大，1935年在刘志丹的统一指挥下，红二十六、二十七军粉碎了国民党五、六万人的围剿，解放六座县城，使陕甘、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立了陕甘苏维埃政府，共控制着陕甘边境22个县，蒋介石不得不派张学良率领大军来对付他们。

1935年9月，中央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历尽千辛万苦，到达陕北。刘志丹此时正遭厄运，被关押在牢房里，毛泽东派出贾拓夫、王首道等快速赶往瓦窑堡，救出“绿林式领袖”刘志丹及他的同志们，制止了这场清洗。

刘志丹获释后，毛泽东安排他负责组织和指挥新的红二十八军。1936年2月，他奉命率军东征，横渡黄河进入山西，准备去河北和热河前线对日作战。部队在汾河流域遭到蒋介石和阎锡山部队的阻击，刘志丹牺牲，年仅32岁。毛泽东的题词说：“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到底是什么“意外”，细节已无从了解。

刘志丹在那次战役中表现杰出，红军在两个月内就攻占了18个以上的县份。

刘志丹遗体被送回陕北，葬在瓦窑堡，苏区把红色中国的一个县份改名志丹县来纪念他。

康生制造“小说反党”冤案

在刘志丹牺牲13年以后，他的战友从陕北高原走进了北京城，刘志丹为此献出了生命的人民共和国终于成立了。又是13年后（1962年），一部以他的生平为内容的长篇小说《刘志丹》被定为反党小说。罪状是：

——“剽窃毛泽东思想”。陕北根据地是在和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刘志丹通过武装斗争，创立了红军和农村根据地，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和井冈山一样的道路。所以说刘志丹是“剽窃毛泽东思想”。

——小说把陕甘苏区写好了，就是和中央苏区“分庭抗礼”。

——书中某个人就是习仲勋，写得年轻能干，是为习仲勋篡党篡国制造政治资本。

1956年以前，工人出版社就将此书列入选题计划之中，并约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来写，她早在延安就听说过刘志丹辉煌而短暂的英雄一生，积累了一些资料，接受约稿后，她查阅大量资料，采访了大量当事人，历经六年，六易其稿，1962年完成，并节选在《工人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发表。

康生还没有看到书就认定：“完全为高岗翻案。”他通知中宣部要各报刊一律停止转载，同时，康生还通知工人出版社把第五稿印六百本，第三稿印三百本送中央会议审查。书尚未印好，一条“毛主席语录”就出来了：“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后来毛泽东又说：“利用小说反党，是康生发现的。”

这一年夏天，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由康生提出定了个“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



刘志丹夫人讲刘志丹生平

集团”，习仲勋早年就担任过陕甘苏维埃政府主席，是刘志丹的亲密战友，后来担任西北局书记：贾拓夫14岁就参加革命，“是惟一一位从陕北到中央苏区工作，又从中央苏区长征到陕北的领导干部”，是“毛泽东走向延安的向导”，1949年成为第一任西安市长，也是刘志丹的亲密战友；刘景范则是刘志丹的亲弟弟，早年就在哥哥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

自1962年到1966年，西北五省区大批省级干部被调到北京“学习”、审查，称他们是反党集团的人。“文革”爆发后，陕北的志丹县贴出了大字报，把刘志丹、刘景范诬为“叛徒”，曾被国民党捣毁过的保安（志丹）纪念堂又一次被红卫兵砸烂，刻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题词的纪念石碑也被毁了，刘志丹的家人再次被赶到了农村。

1967年贾拓夫被整死在郊外，“习、贾、刘”只剩下两个人，成不了反党集团。1968年1月，刘景范、马文瑞（曾经接受过李建彤的采访）和李建彤被抓起来后，又成了“习、马、刘反党集团”。马文瑞关了五年，习仲勋关了八年，刘景范

因为反抗逼供，揭康生的底，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入狱，坐了十年牢。小说的作者李建彤先是被关在一个地下室，1970年开除党籍，劳动改造。

《刘志丹》小说案最后升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时而定为“西北反党集团”，把西北大部分司局长以上的干部都划了进去，打了几百干部。不仅西北干部，长征过来的南方干部和1962年参加审查这个案件的干部都未能幸免。陕甘宁老区的基层干部和群众，有上万人被打成“彭、高、习反党集团”的黑爪牙，甚至李建彤到陕北采访时，带过路的群众也被打死了几个。

《刘志丹》小说案株连之广，连古代的文字狱都难望其项背。对这些冤情，刘志丹不可能知道了，我们也不知道如果他泉下有知是否会悔恨交加。

小说几经波折，在成稿十七年后的1979年才由工人出版社出版，离刘志丹牺牲已经六十三年了。

（责任编辑 刘文）

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率部在绥远省五原县，举行震惊中外的五原誓师，正式脱离北洋军阀体系，参加以推翻军阀统治为目的的国民革命。

共产国际派刘伯坚到冯玉祥部队担任政治领导工作，随刘伯坚去的还有邓小平等共产党人。

当时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冯玉祥、刘伯坚和总司令部的将官们亲自动手解决吃饭问题。邓小平曾回忆说：“记得我们和焕章先生在红城广场一起用餐，啃馒头吃咸菜，那时西北军的生活艰苦得很。”特别是大西北黄土高原，自然条件恶劣，水源极缺。一年有十分之九遇干旱，老百姓打井找水很难很难，往往井打好了，却没有水，有的打出的井是苦水，很难打出一口甜水井。官兵们很

□ 刘豹

冯玉祥节约用水

少洗澡洗衣服，这时，如能喝上一杯净水，那是最大的满足。

面对严重缺水，冯玉祥要求全军上下节约用水，并带头执行，以度难关。

每天早晨天未明，冯玉祥起床后，端上半缸子冷水，放大了喉咙大喊：“同志们快来洗脸啦。”于是石敬亭、刘伯坚、何其巩等西北军的高级干部，争先恐后地从屋里跑出来，一个挨一个排着队，冯玉祥吸上半口水，把缸子送给旁边一个人。自己把嘴里的水喷在两个窝着的巴掌上，赶紧往脸上一浇，三下两下搓着，再用毛巾擦干，就算洗漱完了。刘伯坚接过缸子照此办理，其他人也如此，等人人都洗了脸，那半缸子水还没有用完呢。

（责任编辑 舒元璋）

为党为公的张浩

□ 王光远

1942年3月9日，有一件事情轰动了延安城。这天上午，只见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党中央领导人，抬着一口棺木，从中央党校门前缓缓走向青年文化沟。延安全城百姓都伫立在街道两旁，观看这既新颖又隆重的葬礼。死者是何人？为什么毛主席亲自为他抬棺？第二天，人们就从报上得知，死者是一位老共产党员，被称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张浩。

—

张浩，原名林育英，字祚培，1897年2月25日出生在湖北黄冈县林家染铺湾，是林育南、林育蓉（林彪）的党兄。父亲是一个染织工人，因家庭贫困，张浩自小就参加劳动，13岁才入私塾。1919年五四运动中，在恽代英、林育南等人的影响下，开始走上革命道路。在家乡创办了一所浚新小学，并和林育南、李求实等人组织“利群书社”，又和林洛浦等人合资在武昌大堤口开办了一家利群毛巾厂，他任厂长。1922年2月，由林育南、恽代英介绍，张浩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最早的工人党员之一。最初，他在武汉、大冶等地从事工人运动。1923年，他领导了长沙人力车夫大罢工。不久，他调往安源，任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营业部主任，与刘少奇、陈

潭秋等人并肩战斗。五一劳动节举行纪念大会，张浩任大会总指挥。是年秋，和李求实、吴化之等人一起，派往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

1925年，张浩由苏联回国，11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发动了轰轰烈烈的首都革命，要求推翻段祺瑞政府。为响应首都革命，12月6日，上海召开了群众大会，反动军警前来镇压，张浩带领群众与军警展开搏斗，头上被刺刀挑开一寸长的口子，血流如注，胸部和手腕也受了伤，他仍领导群众举行了大游行。

大革命失败后，张浩任汉口市委书记，领导地下斗争。“八七”会议后，又领导大冶、阳新、鄂城三县的秋收暴动。1928年5月，他担任湖南省委常委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到安源一带活动。为躲避敌人的搜捕，曾一度“出家”，法名明持。1929年他来到上海，担任沪西区委书记。5月30日组织群众游行时被捕，4个月后被营救出狱。1930年，张浩被派往东北组建满洲临时省委，张浩任书记。9月，他出席六届三中全会，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回东北后，因叛徒出卖，在抚顺再次被捕，受尽各种酷刑，“九一八”事变后，才被营救出狱，担任全国总工会常委、中华海员总工会党团书记。

1933年，张浩化名李复之，前往莫斯科，担

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兼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

1935年7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由于德、意、日三国法西斯分子相继上台，世界局势日益恶化，大会决定建立世界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王明、康生、吴玉章、张浩、孔原等人参加了这次大会，决定在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起草了有名的“八一宣言”。

二

自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以后，共产国际就和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为了传达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恢复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决定派张浩回国执行这一任务。

张浩在回国前，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把“七大”主要文件的精神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示，都默记在心。准备就绪后，他化装成一个劳碌奔波的小商人，身穿光板的羊皮大衣，取道内蒙古回国。

张浩风餐露宿，忍饥挨饿，历尽艰辛，于1935年11月底到达陕北，在瓦窑堡会见了张闻天、邓发、李维汉等人。当时毛泽东、周恩来正在直罗镇指挥作战，等他们回来后，立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张浩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会议还决定成立白军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张浩任副书记，负责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

张浩到达陕北之日，正是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之时。12月5日，张国焘致电党中央宣称：（甲）此间已用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乙）你们应称党的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丙）一、四方面军名义已取消。（丁）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状况报告前来，以便批准。

在武汉搞工运时，张国焘就十分敬重张浩，他们之间有着深厚的感情。针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党中央决定张浩以共产国际特派员的身份，不断给张国焘发电报，进行说服工作。张国



张浩

焘在《我的回忆》一书中说：“林育英到达陕北后，立即致电给我，大意是：他和王明等曾参加1935年7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大会对中国问题的讨论，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的决策。他奉命携带密码，经蒙古来寻找红军，已于某日到达陕北，完成了第一步使命。他拟由陕北继续到川康地区来，与我和其他同志会晤，但因交通阻隔，尚不知能否如愿。”“我接到这个电报，一时喜出望外。立即回电表示欣慰，并请他暂留陕北，以免途中遭受袭击的危险，彼此可用电讯商谈各项问题。”

“接着，林育英的电报源源而来，主要是告诉我们共产国际改采新政策的经过，并提出党内团结的步骤。……”关于张浩所发的电报，从档案中只发现了12月16日的一封。原电如下：

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着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

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传达。

林育英 16日9时

1月24日,张浩致电张国焘,并要张取消伪中央,“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张国焘不敢和共产国际闹对立。1月27日,张国焘致电张浩,表示“原则同意”,并表示“急谋党内统一”。他在《我的回忆》中说:“他们既与共产国际联系上了,我们也就不必旧事重提,斤斤于谁是谁非,大家团结要紧。”

实际上,张国焘南下后,碰了钉子,他剩下的四万红军又损失一半,实在混不下去了,才不得不表示:“红军如果长期停留川康区域内是不利的”,“不能适应目前全国抗日反蒋的局势”,“粮食的缺乏”使当地“少数民族工作增加困难”。在张浩的多次劝说下,张国焘最后终于回到了陕北。

三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实现全面抗战,制定党领导抗日的纲领和政策,8月,在洛川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张浩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发言。会议为健全中央军委,推选张浩为中央军委委员。

8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刘伯承、徐向前任一二九师正、副师长,张浩任政治委员,兼任军政委员会主席。9月,129师开往晋东南,粉碎了敌人的六路围攻,建立了以太行山为中心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繁重的工作,使张浩的身体渐渐不支,头痛病时有发作,常常带着健脑器工作。中央为了照顾他的身体,决定调他回延安,一面休养,一面从事职工工作,由邓小平接任129师政委。

1938年11月,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张浩在会上作了《持久抗战中的职工

运动大纲》的长篇发言。在这次会议上,张浩被增补为中央委员。会后,他遵照中央的指示,与杨永春、章萍等人一起,积极筹备成立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不久,中央职委成立,康生任书记,张浩任副书记,刘少奇、陈云、杨尚昆、邓发、朱宝庭等为委员,后又由张浩主持创办了《中国工人》月刊,张浩任主编。

为培养和造就职工运动的骨干,中央决定在延安桥儿沟创办一所工人学校,由张浩任校长。他处处以身作则,带领全校师生开办了各种工厂,并开垦荒地两千多亩。

1940年4月30日,延安各界2万多人举行集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张浩在会上发表演说时,突发脑溢血,从此一病不起。

1942年3月,张浩的病情加重,他对看望他的中央领导同志说:我奋斗了二十年,现在看到了曙光却要走了,他要求死后葬在青年文化沟,与毛泽东所住的杨家岭隔河相望。他无限深情地说:“我要天天看着党中央、毛主席。”毛泽东也意味深长地说:“让张浩同志天天监督我们。”

3月5日深夜,张浩在中央医院逝世,由李富春、邓发等人组成治丧委员会,在中央大礼堂设置灵堂,门外高搭蓝白色牌坊,上写“工人先进”、“战士楷模”,灵堂内高挂毛泽东的挽联:“忠心为国,虽死犹荣”。每天都有数千人前来悼念。

3月9日上午,在中央党校门前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仪式,由任弼时主祭,中央代表报告了张浩的生平事迹,号召大家向张浩学习。

会后,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亲自为张浩执绋抬棺,入土安葬。《解放日报》报道说:“徐特立同志亦脱去棉衣,挥汗上前,置棺于肩,苍白的鬓发上闪动着晶莹的汗珠,脱落了牙齿的口中在吃力地喘气,见者深为感动。”

张浩被安葬在青年文化沟桃花岭山顶,坟前立碑,碑上镌刻着毛泽东亲笔写的“张浩同志之墓”六个大字。1947年,胡宗南进犯延安,墓和碑都遭到破坏。解放后,已修缮一新,不断有人前来瞻仰。

(责任编辑 刘文)

定陶战役中的刘伯承

□ 丁 曼

1946年6月25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时达成的停战协定，调动了193个旅，共160万人，向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占我城市100余座。解放区23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急骤缩小了三分之一，在中原地区，仅在开封至徐州480华里的地段上，敌人筑起碉堡，挖封锁沟、砍去沿铁路线南北四百米的庄稼和树木，还不断派遣保安团袭扰解放区。

为了粉碎敌人向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进攻，我刘邓大军从1946年8月10日至21日进行的陇海铁路自卫反击战，歼灭蒋军1.6万余人。它打乱了蒋介石集团在南线的围攻计划，有力地配合了我中原野战军的胜利突围和华东野战军对蒋介石集团进攻的自卫反击。

在陇海战役中获得胜利的刘邓大军，行军、作战20余天，伤亡5000余人，正需要休整和补充的时候，蒋介石调兵遣将，气势汹汹地把徐州绥靖公署和郑州绥靖公署的30万兵力，对刘邓大军展开钳形攻势。

蒋介石在8月29日电令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刘伯承部经各部反击，伤亡惨重，开始向北溃退。徐、郑两绥靖公署各部，必须予以彻底消灭。续向3日指定之线推进，以绝匪患，而利今后作战。并限7日之内完成。”蒋介石抓住我军减员多、兵力少的弱点，倾其全力以速战速决来消灭刘邓大军。

在鲁西南战场上，刘邓大军只有第二纵队、

第三纵队、第六纵队、第七纵队共5万余人，是敌人总兵力的六分之一，且装备远不如他们。刘、邓认为，无论怎样困难，也要坚持连续作战，力争粉碎敌人的猖狂进攻。

根据对敌情的分析，从郑州方向进攻之敌的力量较弱，如果先击败这一路，郑、徐两路的钳形进攻便会随之瓦解。因此，他们决定，首先寻机攻歼郑州之敌，且先打中路的整编第三师，然后再歼其他。

我第六纵队（1949年2月改番号为第十二军），从8月23日开始，以十八旅和十六旅的小股部队，对进攻的敌人整三师“示弱”，以节节抗击，节节后退，既迟滞敌人，又纵敌骄横。狂妄的整编第三师，真的认为：“刘伯承的队伍已溃不成军了。”因此，更猖狂地向我小股阻击部队进攻。整三师师长（原十军军长）赵锡田吹嘘：不用两个星期，他们就可以占领我鲁西南，把刘伯承赶回太行山。

我军且战且退，打了9天的运动防御战，整编三师前进了50公里。我军争取到了短时间的休整和补充。同时，在运动防御中消耗、疲惫了敌人。整三师伤亡1500余人，其主力二十旅的两名团长被击毙。这是刘伯承司令员常用的“猫盘老鼠”战术。

刘邓原计划诱敌到定陶地区歼灭之，于8月31日向部队颁发了《定陶战役基本命令》，作了具体部署。后得知敌人改变进攻计划，刘、邓

也相应地调整了作战部署。当狂妄的整编三师9月3日被我军牵着鼻子冒进到菏泽西南50公里的大杨湖一带我军预设的战场时,在大杨湖前面3华里的大张集,遇到了我第六纵十七旅五十团的顽强的阻击,战斗打得很激烈。敌人向菏泽市进攻的强劲势头被扼止住了,未能再前进一步,被迫退至大杨湖等村庄,而且发现钻进了我军暗设的口袋阵。

占领大杨湖的整编三师五十九团,紧急地抢修工事,构筑碉堡,砍伐树木,设置路障,组成严密的火力网。大杨湖这个村庄有200户人家,它周围除东北角二华里处有一村庄外,地形平坦开阔,难攻易守。英勇善战、足智多谋的王近山司令员,率领的第六纵队的任务就是歼灭占领大杨湖的敌人五十九团。

王近山是刘、邓很器重的战将。早在红四方面军当连长时,他就因为能打仗,被战友们昵称为“王疯子”。在定陶战役开始之前,在召开的各纵队领导人会议上,邓小平问大家:“我们是坚决消灭敌人,还是背起背包回太行山?”王近山当场站起来:“一号(刘司令员)二号(邓政委),我王近山今天立下军令状,如果六纵打得剩下一个旅,我当旅长,义德同志当政委;剩下一个团,我当团长,义德同志当团政委;剩下一个连,我当连长,义德同志当指导员;如果全纵队打光,对得起党,对得起哺育我们的太行山父老乡亲!”(王近山和杜义德早在红军时期就在一个连队、一个营共同战斗过),刘、邓首长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当场表扬他们照顾全局、勇挑重担的高度责任感。

9月4日和9月5日,中共中央军委连续两次通电给刘、邓,指示作战任务。此时,整编三师左右邻的蒋军正紧急调动,企图增援整三师。如不尽快歼灭整三师,待它同增援部队会合后,就很难打垮敌人的进攻了。严峻的战场形势,引起刘、邓的极大关注。邓小平给王近山打电话指出:“大杨湖战斗是歼灭整三师、粉碎两路敌人进攻的关键。事关全局,必须打赢这一仗!打得好,我们才能在冀鲁豫站得住脚。”王司令员坚定地回答:“报告二号,我保证把大杨湖的敌人消灭!”



刘伯承登上大别山三角峰

9月5日是极为关键的时刻,刘伯承司令员亲自来到了前线六纵司令部作战室,他还特地给前线指战员带来80个肥城桃。同他一起来的有李达参谋长、张廷发作战处长。

刘司令员和各纵队指挥员研究了作战情况,再次强调了在战术上集中优势兵力的问题,重新作了全线进攻的部署。第六纵队攻歼大杨湖敌人第二十旅五十九团;第二纵队的一个旅包围周集、大黄集之敌第三旅,并牵制小杨湖之敌,配合六纵作战,以一个旅迂回到敌左侧后,切断敌人交通运输,并阻止敌人向西南突围;第七纵队、第三纵队主力首先攻陷申倪寨敌第二十旅旅部和守在方车王的一部,再攻敌整编三师师部阵地天爷庙。会议决定在当天(9月5

日)夜晚对整编第三师发起总攻击。

王近山回到六纵前沿阵地指挥所,召开了各旅指挥员作战会议。王近山说:这一仗事关全局,我纵队必须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破釜沉舟,不惜任何代价,坚决歼灭大杨湖的敌人!”他决定由十八旅并配以善于突破敌人防御的十七旅四十九团担任主攻,由村东面和村西南角实施主要突击,十六旅主力由村北面相机助攻,十七旅为预备队,四十八团、五十三团准备打击增援之敌。

临战前,担任主攻的十八旅五十四团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一营教导员朱辉抢先站起来要求担任尖刀任务。卢彦山团长看着他那坚毅而又恳求的目光说:“好吧,交给你们一营!”

在对大杨湖敌人发起总攻击之前,王近山把自己的指挥岗位移到距前沿阵地300米的地方,他精神焕发,向坐镇在六纵司令部作战室的刘伯承司令员报告说:“一切准备就绪。”

第六纵队司令部作战室设在沙古寺村老百姓的两间草房里,房子中间用秫秸秆编的箔子隔开,靠近屋门的外间墙上挂着作战地图,破旧的抽屉桌上放着两盏棉油灯和两部电话。

第六纵队原来是由太行军区第六分区机关和直属部队,韦杰支队,石志本支队,秦基伟、向守志支队,在1945年11月新组建的一支部队。刘司令员信任这支部队,倒不如说更信任王近山。有人说王是“中国的朱可夫”。

这时,参谋报告,通往各纵队的电话已经架通。刘司令员拿起电话,分别同第七纵司令员杨勇、第三纵队司令员陈锡联、第二纵队司令员陈再道通了电话,作了指示。

在鲁西南前线的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全体指战员,都已经知道刘伯承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他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刘司令员放下电话坐在木凳上,不时抬起左手,看看手表,望着墙上的作战地图。他两鬓斑白,深思时,额上皱纹特别明显。六纵政委杜义德陪伴在刘司令员身边。

12点30分,炮火准备开始,寂静的夜空,像是突然出现雷鸣电闪,大地颤动了,紧接着,机枪声、手榴弹爆炸声也纷纷传来。

“已经攻上去了!”李达参谋长高兴地对刘司令员说。

接着,捷报从电话上又传来:“六纵的4个营突进大杨湖!”

“三纵也搞下了申倪寨……正向整三师师部天爷庙进击!”

“七纵的一个团打进方车王……!”

我看到,在作战室的每个同志的脸上,都浮现出了胜利的微笑。

在大杨湖,敌人的阵地第一道防线是鹿砦,全村各个角落暗堡密布,房屋的墙壁上挖满了枪眼。拥有2000多名官兵的蒋军五十九团全部是日式装备,他们有10门八二迫击炮,每个营有6挺92式重机枪,每个连有9挺歪把轻机枪,步枪一律是三八式。围攻大杨湖的第六纵队,从大杨湖村的东北角、西南角和村东面,分三路,在一片弹雨火海中冲向敌人阵地。

以善于攻坚著名的六纵十八旅五十四团,奉命迂回到村西南角,在敌人的屁股后面实施突击。这个团从团到班,各级干部都下放一级指挥。团长卢彦山带领一营,政委李少清带领二营,副团长带领三营,参谋长带领团指挥所的电话员、通信员、卫生员,政治处主任带领担架队。他们进攻的村西南角,是敌人五十九团和驻在天爷庙的整三师师部的接合部,距天爷庙只有两华里,是十分敏感和十分险要的地段。

五十四团一营教导员朱辉携带着9颗手榴弹,率领一营三连迅速勇猛地跨过鹿砦,用手榴弹开路,冲过吐着火舌的地堡群,首先突破了敌人的坚固防线,像一把尖刀插进敌人的咽喉。敌人拼命射击,未能阻挡住勇士们甩出的一排排手榴弹。五十四团团指挥所紧跟一营,从突破口进入一处大院。接着二营从右翼突进,三营也跟进。他们占领的三处院子的前面是大杨湖村的街中心,敌人在一片开阔的平地上构筑了许多暗堡,火力密集,几次突击都未成功,这时,五十四团已伤亡一半。

敌人像潮水一样反扑过来。勇士们依靠断壁残垣,用火力的组成坚固的堤防,阻挡敌人的冲击。团长卢彦山决定坚决固守已经占领的三处院子,以吸引敌人的兵力和火力,援助兄弟部队

的进攻。他们把敌人扔过来的手榴弹又扔给敌人。当敌人扑到跟前时，他们用刺刀同敌人拼杀。

一营教导员朱辉身上三处负伤，鲜血浸透了灰色军衣，但他仍然拖着沉重的身子，率领战士们和敌人厮杀。在打退敌人几次反冲锋后，再也支持不住了，他把一支打光了子弹的手枪交给身旁的排长孙金贵，拉着孙的手吃力地说：“你们要狠狠地打呀，有刘司令员指挥，一定能全歼敌人……！”朱辉停止了呼吸。孙金贵向身边的战友李三元、张玉顺、刘心恒高喊：“为教导员报仇！”他们投出一排手榴弹，把冲过来的敌人压制在巷口。李三元一把抓住了敌人手中的一挺机枪同敌人扭打在一起。正在争夺时，三个敌人端着刺刀斜冲过来，孙金贵手疾眼快地拉响了一颗手榴弹，把三个敌人炸死。李三元打死了和他扭在一起的敌人，他抱起机枪朝敌人扫射，敌人的反冲锋给打退了。

到后半夜，五十四团已剩下不足 100 人。此时，天爷庙的敌人出动了。三辆坦克掩护着步兵，向五十四团背后冲来。固守大杨湖的敌人也乘机反扑。五十四团腹背受敌，他们在身经百战、带彩六处、右手残废、机智勇敢、沉着老练的长征干部卢彦山团长的指挥下，浴血奋战。轻伤员继续战斗，重伤员在枪弹的呼啸声中爬来爬去，在地上搜寻弹药。指挥员们都拿起了武器。卢团长、李政委跃出荫蔽部，端起机枪和敌人干起来。团长边打边喊：“同志们！守住阵地就是胜利，坚决打！”全体指战员都知道，他们所占据的这块地方，对敌人是致命的威胁，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坚守。七连长栗志富打了 100 多个手榴弹，打得胳膊都抬不起来了，手指被弹弦拉破，终因多次负伤，倒下了。

敌人欺负我军没有反坦克炮，他们的坦克竟然冲到五十四团团指挥所跟前。守在电话机旁的团政治处主任霍宗岳，冒着敌人机枪的扫射，提起两个手榴弹，喊着：“跟我来！”他向坦克冲去，警卫员、通信员、电话员等人也都提着手榴弹迎坦克而上。

五十四团处在很危险的时刻。他们一度 and 旅指挥所失掉电话联系。四十九团团长沙宗书阁

用电话向十八旅旅长肖永银报告了五十四团伤亡惨重、团参谋长负伤、团干部都参加了战斗的情况。肖永银深知，如果五十四团守不住，整个战斗都将失利。因此，他放出了十八旅的预备队，命令五十三团的两个营不顾一切地迅速支援五十四团，另一个营支援四十九团。支援五十四团的两个营十分勇猛，冲垮了敌人的坦克和靠它掩护的步兵，坦克胆怯地退回去了。

此时，六纵副司令员韦杰和十七旅副旅长尤太忠率领四十六团、四十七团和五十团上来了，再次向大杨湖村内的敌人发起了攻击。在冲天的火光中，爆炸声混着厮杀声，响彻云霄。

激烈的村落战在大杨湖展开，敌我双方在仅二百多户的村子里进行逐家逐院的争夺。“你们打得很好啊！要毫不放松地继续扩大战果，要坚决吃掉敌人！”刘伯承司令员鼓励着正在同敌人进行血战的六纵勇士们。

六纵已有十八旅、十七旅、十六旅的六个团打进大杨湖。在这不足一平方公里的村庄里，聚集了一万人在厮杀！

王近山司令员坚持要和旅指挥员一起进入硝烟弥漫、横尸街巷的大杨湖村内，经过同志们的一再劝阻，才未进去。

这时，敌整编第三师五十九团已被我六纵的勇士们压缩到大杨湖村的一个角落里。我六纵战士的子弹打光了，手榴弹快没有了，垂死的敌人还在进行疯狂的反扑，我军又倒下了一片，再前进一步都很困难，天快明了，天一明，敌人飞机、援兵可能赶来，战斗就很难解决了。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我看到刘伯承司令员向指挥大杨湖战斗的王近山大声地说：“赵锡田已经没有力量了，他在天爷庙的师部只能派出两个步兵连、三辆坦克增援大杨湖，敌人总崩溃的形势来到了，这是我们最后胜利的时刻。”

刘司令员向王近山强调：“我们困难，敌人更困难。敌人顽强，我们要更顽强！你们要咬紧牙关，用上最后一把力，就一定能最后消灭敌人！”

在大杨湖的敌人五十九团代理团长吴耀东，用报话机向旅部求援说，他只能再坚持 15 分钟，如果 15 分钟援兵赶不到，他就要自杀。

六纵有的连队只剩下几个人了。在这胜败极为关键的时刻,大家上下一心,他们用从敌人尸体上捡来的手榴弹、子弹,他们端着刺刀,勇猛地冲入敌人的阵地。五分钟,仅仅用了五分钟,在9月6日8时的晨光熹微中,蒋介石的嫡系整编第三师第二十旅第五十九团在六纵勇士们的扑搏下屈服了,投降了。中校代理团长吴耀东(团长向介江于9月1日在白茅集被我六纵十六旅的阻击部队击毙)还未来得及“杀身成仁”,就被一个战士从桌子底下拉了出来,作了俘虏。蒋介石嫡系整编第三师第二十旅主力五十九团被彻底、干净地消灭了。

至9月6日晨,我第二纵队、第三纵队和第七纵队各歼敌一部。整三师的第二十旅被我军全部歼灭,第三旅亦遭重创。我军逼近整三师师部所在地天爷庙。剿共多年的蒋介石嫡系整三师陷于严重混乱之中。刘峙曾几次严令其整四十七师向整三师靠拢,增援整三师,但在我军阻击下未能得逞。

到中午10点多钟,重要的信息从电话上传来:天爷庙的敌人,企图在飞机的掩护下突围,其他村庄的敌人,也有要逃走的迹象。

刘司令员立即向部队发出了追击敌人的命令:“全线敌人都在退却,我们要坚决地把进攻发展为追击,把战术的胜利发展为战役的胜利!”

由于劳累和天气炎热,滴滴汗珠从刘司令员坚毅和容光焕发的脸上流下来。在院子里,我站在距刘司令员很近的地方,听得明明白白,看得清清楚楚。

整三师赵锡田,这个内战老手,年龄45岁、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生,历任该校教官及蒋军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军长等职的中将,在天爷庙,脸上抹满了黑灰、身着美式军官服,正在顽抗时,我军第三纵队的一位连党支部书记张景小,举枪击中他的颈部,他倒在地上,作了俘虏。

9月8日,定陶战役结束。六天之内,共歼灭敌人4个旅,1.7万余人,其中毙伤敌整三师第二十旅旅长潭乃大以下5000余人,俘敌1.2万余人。蒋介石挑起内战后,在各大战场频频得

手,定陶之役却遭到惨败,他在发出的密令中哀叹:“鲁西第三师之覆败,赵师长之被俘,为我国军之莫大耻辱。”这一胜利非同凡响,我军战史指出:“定陶战役是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内线打的第一仗……严重地打击了敌人全面进攻的疯狂气焰,提高了全区党政军民战胜敌军进攻的胜利信心。”

我作为新华社随军记者,目睹了我国大军事家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定陶战役的经过。他们面对不可一世的蒋介石,诱使敌人钻进我军预设的阵地,到集中优势兵力、给以各个歼灭,充分展现了他们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劣势胜优势的非凡气魄和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这一来之不易的胜利,代价也不小,我军伤亡3500余人。9月6日下午,我在六纵十八旅五十二团看到有位炊事员在痛哭。他是平汉战役中解放过来的,叫庞起祥,为他们连在大杨湖战斗的100多个同志去送饭,但他看到吃饭的只剩下几个人了。他回来后说:“还做啥饭呢,没人吃了!”他痛哭起来。我看到五十二团的第一、四连,只剩下四五个人了。

冀鲁豫解放区人民全力支援了定陶战役的胜利。参战民兵8800余人,参战民工14.2万余人,出动担架1.7万副、大车5000余辆。各县县委书记、县长带领干部、民兵和民工奔赴前线。

在定陶战役中,我军第六纵队的表现很不平凡,他们立了大功。晋冀鲁豫野战军领导同志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张际春在9月7日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说:“9月5日,我六纵以最顽强的战斗,消灭敌二十旅之五十九团,三、七纵队亦各消灭其一部,打开了战局。”刘、邓、滕、张首长向晋冀鲁豫各军区各纵队发出通报说:“在此次陇海战役及消灭第三师作战中……我们特对六纵全体官兵表示敬意。”

延安《解放日报》1946年9月12日发表《蒋军必败》的社论,高度评价定陶战役的胜利。

毛泽东主席对定陶战役的评价很高。1946年9月16日对全军下达《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把定陶战役当作一个范例。

(责任编辑 刘家驹)

中国反贪史的启迪

□ 白 钢

自从私有制产生,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贪污就与人类形影相随。贪污不受时空、国别的限制,主要取决于有没有遏制它的制度及其机制。不久前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的王春瑜研究员主编的《中国反贪史》,以历代反贪的实践与经验,雄辩地说明了这条真理。

无数经验事实表明,贪污与“权力”是一对孪生子,二者伴随着整个政治过程。当“权力”的供给与人们对“权力”的需求发生矛盾的时候,经济学上的“设租”与“寻租”的理论便支配着整个政治过程。掌权者用手中的权力设租,甚至直接出卖手中的权力,造成“官以财进,政以贿成”的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贪贿只是政治腐败的必然反映。所以,反贪不能只查经济账,更重要的是要查贪贿赖以形成及愈演愈烈的政治原因。否则,贪污就会越来越多。乾隆皇帝反贪的决心不可谓之不大,惩治贪污的法令不可谓之不严,然而,实际效果如何?正如薛福成所说:“乾隆朝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庸庵笔记》卷3《人相奇缘》)。他虽然处治了不少大案要案,但却放过了清朝有史以来最大的贪官和珅,直到乾隆帝病逝,嘉庆帝继续进行反贪事业,才把这个“贪鄙成性、怙势营私、僭妄专擅”的“群臣之首”和珅拉下马。

《中国反贪史》系统地描述了历代反贪斗争与王朝兴衰隆替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揭示了在君主专制时代,反贪斗争不可能走出轮回怪圈的尴尬。这实质上是一条不依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传统的官僚政治体制,或由

官府直接经营工商业,或由行政长官统摄赋役财政,这就赋予官吏以政治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方便条件。历代开国之初,反贪斗争往往卓有成效;中期以后,贪贿之风就愈演愈烈,以致发展到无法收拾的程度。其所以如此,归根到底,是制度问题。邓小平同志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根本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君主专制政体,皇位是世袭的,官吏任用则是任人惟亲,这就决定了历代王朝只能是“家天下”。专制制度的这种劣根性,必然导致有限的监察机构及其职能属于自己监督自己的性质,只能形同虚设。这样,贪污腐败就成为不可避免和无法克服的了。这就使历史上的反贪斗争犹如“割韭菜”,割了一茬,又长出一茬。

几千年来,人类一直在关注着反贪斗争。古今中外的贪污腐败有许多共同点,按照寻租理论或“公共选择理论”,贪污贿赂是租金在政治市场中的一种存在形式。只要有租金,就必然有寻租行为。改革的任务,就是要设计出用来遏止那些志在获取和保留现存租金竞争的各种制度,关键在于避免建立会引起寻租行为的规制和规制机构。为了杜绝寻租行为,就需要认真进行宪政改革。从权力配置,到制度安排;从规则的制定,到机制的建立,都要符合宪政理论的规范。——这是《中国反贪史》所提供给我们的最有益的启迪!

(责任编辑 程 度)

辛亥忠烈吴禄贞

□ 李孝平

留学日本 志报祖国

吴禄贞，字绶卿，湖北云梦县吴家台人，1911年11月7日殉国，年仅32岁。

1899年，吴禄贞与其湖北武备学堂同学一行20人，东渡日本留学。他在这批同学中年龄最小，但才气纵横，与之同行的同学刘伯刚曾说：“当时留学之风初开，国人尚多视远适异国为畏途，尤以时距甲午之败，仅只数年，敌意犹存，有些同学对赴日留学，尚心存疑虑与抵触，甚至不欲应选，惟绶卿独认为临阵用兵，必须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常说，欲雪甲午之耻，亦惟有先了解和学习日本人的长处，方能有济。”其时，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已于一年前来日本物色同志，组织“兴中会”。孙中山先生与吴禄贞一见如故，顿成革命知己。旋即委以领导庚子起义（大通起义）的重任。由于维新派头号首领康有为将招兵买马得的海外捐款，用于他途，中断了对起义军的接济，迫使起义军临时推延起义时间。而吴禄贞所统之大通义军位居最前线，未得延期通知，按期一举攻占大通贸易金局，威震江汉。清政府慌了手脚，急调各路大军合力围剿。其他各路，皆因奉命延期，自然按兵不动，致使大通义军陷于孤军作战之险境，终因寡不敌众，遭到惨败。

大通失败后，吴禄贞脱险重渡日本复学，立志学成报国，于190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时人以他与张绍曾、蓝天蔚并称“士

官三杰”。吴回国后，被湖北总督张之洞赞为“奇才”，加以“将弁学堂总教习”、“护军全军总教习”、“武备学堂会办”等头衔，一时轰动了武汉三镇。吴禄贞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继续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广交革命志士，尤其提倡“秀才当兵”（即知识分子从军）和“招营战略”（即变敌对力量为革命力量），为武昌首义播下了革命种子。

南北呼应 铭记重托

1903年，清政府极欲重建新军，专门设立练兵处，以亲贵大臣主其事，并搜罗全国一流的军事人才为之用。吴禄贞为士官杰出者，名噪一时，闻于清廷，乃被指名征调入京。当时吴禄贞正应革命党人黄兴邀请，与李书诚、耿伯钊偕往长沙，共商两湖革命大计，不愿中途离去，也不想入朝廷。后因黄兴等人坚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既受朝廷器重，指名征调，入京必得重用，实乃千载良机。与其在外难以建树，不如趁机投身其中，虚与周旋，暗为内应，将来良机成熟，共成大事。”黄兴还反复强调北京地位的重要，并认为机不可失。他说：“今后湘、鄂之事，我自任之，北方之事，赖兄主之，来个南北呼应，成功可期。”

吴禄贞肩负革命党的重托，毅然进京。他到京后，被清政府任命为练兵处骑兵监督。他在日本留学时，专习骑科，此番得任全国骑兵监督，似尚能任其所长。故他在初任监督时，也以为真



吴禄贞

能就此练得一支骑兵劲旅，为日后革命效力。没想到腐朽的清政府，徒尚练兵之名，不务练兵之实，更不愿给吴禄贞以兵权，只要他整天在办公室里埋首伏案，编审“骑兵操典”之类的东西，而不让他有半点机会接触练兵场。所谓“全国骑兵监督”，竟是这样高高在上，甚至连一兵一骑的影子也不能看到。吴禄贞曾寄书其兄感叹道：“盖人皆羨我用心所学，青云独步，我则视同身处囚笼，不可终日。三十功名尘土耳！脾肉已生，奈何奈何！翘首楚天，犹觉神驰，更不知何日始得插翅南飞也！”可见他此刻的痛苦心境。

1906年，吴禄贞为了冲出此苦闷处境，上书军机大臣铁良，自请赴西北考察边务（时值沙俄图我新疆，西北边防正吃紧），征得同意，乃携亲信秘书与同志周维桢联袂西行。他在《西征草》诗篇《潼关望黄河》七律中吐露心声：“走马潼关四扇开，黄河万里逼城来；西连太华成天险，东望中原有劫灰。夜烛凄凉数知己，秋风激烈感雄才；伤心独话兴亡事，怕听南飞塞雁哀！”

诗中的“知己”、“雄才”，自然是指黄兴等人；“中原劫灰”、“秋风激烈”指的是革命斗争的情景，是重申“南北呼应”旧约的深意。

燕晋联军 共谋北京

吴禄贞入京后，清廷对他一直是阳为笼络，暗怀疑忌。使他不能有所作为。在这种情况下，其左右李书诚、黄恺元等为之出谋献策，并由黄恺元为之筹措白银二万两，贿于庆亲王奕劻，才于1910年12月23日得任为陆军第六镇统制。

当时清政府的中央新军，总共只有六镇。吴禄贞满以为凭他的军事才能，一定能在短期内，把这支作为皇权支柱的新军，改造成为一支革命劲旅，但事实却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原来这六镇新军，被当年袁世凯安置了许多爪牙。这时袁虽已垮台，但潜势力依然很大，特别是陆军大臣荫昌，同袁暗中勾结，狼狈为奸，把持着这六镇新军。吴禄贞威望甚高，荫昌对他奈何不得，但却能凭藉陆军大臣的权力地位，予他以限制。如吴禄贞欲任革命党人李书诚为参谋长，荫昌不允；后欲任为标统，荫昌仍不允，使他无法把革命力量引进六镇。六镇所辖十二协协统周符麟出身马贼，形同匪盗，他力主撤换，荫昌也极力阻止。为了革命，吴禄贞决心硬干，径自下令撤了周符麟，这使周符麟恨之入骨。周符麟被撤后，被荫昌收留身边，密谋报复，为日后吴禄贞的死埋下了祸根。

正当吴禄贞迫于革命形势的急需，对第六镇进行革命改造时，辛亥武昌首义爆发了。这个重大时刻的到来，使吴禄贞的心情喜忧交加：喜的是他当年在武昌播下的革命种子，今已开花结果；忧的是第六镇这支军队还没改造好，不能由他如意指挥。如何冲出虎穴包围，响应武昌首义，以践其“南北呼应”之约？为此，吴禄贞召集在京党人，反复商量计议，决定由他以“讨伐叛军”为名，自请率部出征，等到了武汉前线，同首义军队取得联络后，再举行阵前起义。他的这个决策遭到荫昌破坏，并被荫昌抽走了六镇的第十一协，编入第一军，南下打武汉义军。这就把他手中的兵力夺走一半，使他更陷于势单力弱，

孤掌难鸣。

正在此时，“滦州兵谏”又给吴禄贞燃起了希望。因为“滦州兵谏”的主事者张绍曾、蓝天蔚是他留日时并称“士官三杰”的校友，三人交谊甚深。清廷想利用吴禄贞与他们的私人关系，派他去平息这场“兵谏”。而吴禄贞也想借这次机会联合张、蓝共同举兵，呼应武昌，推翻朝廷。怎奈张、蓝“兵谏”的目的只是要保存清室帝位，实行君主立宪，不是要推翻帝制，实行民主革命。可见，吴禄贞在武昌起义爆发后的重大时刻，一直是在苦心孤独地筹划奔走，要为举兵响应创造有利条件。虽会师武汉的计划，遭到了荫昌的破坏，第二步联兵滦州的设想又未能实现，可他面临这些失败和困难，丝毫都不心灰气馁，最终他选择了燕晋联军这条路。

1911年10月29日（清宣统三年，辛亥九月初八），武昌起义爆发后的第19天，山西新军成功地举行了起义，成立了革命军政府，由阎锡山任军政府都督。当时清政府在惊惶失措之际，发出十万火急的电令，直接调派驻防保定的六镇协统吴鸿昌率部镇压山西义军。正在滦州劝说张绍曾联兵起义的吴禄贞接到消息后，心急如焚。清政府竟乘他远离六镇的时候，直接调令他的部下去攻打山西义军，这对他意味着什么？他是完全明白的。吴禄贞对张绍曾说：“我革半辈子命，现在我的部下竟要去充当清廷镇压革命的凶手，叫我怎能的脸见人，又怎能对得起革命的将士呢？”吴禄贞连夜从滦州奔赴石家庄。这时，吴鸿昌的兵马已开到娘子关前，举枪待发。他急令亲信参谋何遂追上吴鸿昌，用计制止开火。倘若吴鸿昌一开火，他作为六镇统制，就会立刻成为山西义军的最大敌人。而吴鸿昌是直接奉了清廷之命，吴禄贞虽为统制，也不能下令停火，只得命何遂用计。也就在此时，清廷发布命令，任吴禄贞为山西巡抚，这是清廷的又一条大毒计：它一面想用巡抚高位利诱吴禄贞为它效忠，使吴禄贞必须拼命攻打山西；一面把吴禄贞进一步摆在同山西义军直接冲突的位置上，使山西义军必须拼命抵抗吴禄贞。这样就自然折断了吴禄贞同山西义军的联系。吴禄贞对斗大的巡抚金印，一笑置之。一些同他素昧平生的

山西革命党人，最初不免要用看待一般人的眼光来看他，对他心存疑虑，当何遂入关讲和时，他们要求吴统制亲自进关和阎都督面谈。吴禄贞毫无难色地对何遂说：“你办得很好，我明天就同你一起去！”

第二天，娘子关戒备森严，如临大敌，阎锡山带着卫队由太原来到这里，将信将疑地等待着一位统制的到来。不一会儿吴禄贞果然来了，而且是那样从容平易，跟在身旁的只有几位亲信，没有前呼后拥的卫队，简直不像身统大军的统制，更没有半点巡抚的势头。吴禄贞见到阎锡山拉着他的双手，郑重而亲切地说道：“我是来同你一起革命的，不是来当巡抚的，请你千万放心。”满天疑云，被吴禄贞几句话驱散了，大家谈笑自若，了无拘束。在阎锡山举行的盛大欢迎会上，吴禄贞讲道：“我同张绍曾、蓝天蔚已商约好了，只要山西的军队和我们第六镇的队伍联合起来，从石家庄北上，他们的军队就从滦州西来，这样南北夹攻，北京旦夕可下。”又说：“现在袁世凯陈兵汉口，想要消灭义军，他是个大阴谋家，也是个大毒瘤，非要除掉不可。如果能抢先一步，夺得北京，他的一切阴谋就都完全破产。我们再同湖北义军，对他前后夹击，不难把他全部消灭。”最后还说：“现在清廷派我做山西巡抚，要我带兵打你们，这完全是梦想，是对我的侮辱。我是革命党，绝不是他们用高官厚禄能收买的。今天只有你们公推的阎都督，才真是你们山西的主人，我是来帮你们带兵打仗的。”阎锡山深受感动，不禁振臂高呼：“我们一致拥护吴统制做我们的最高统帅！”全场欢声雷动。欢迎大会后，举行了吴、阎为首的最高军事会议。会上一致决定，把滦州张、蓝两军，山西义军和第六镇合并起来，成立燕晋联军，推举吴禄贞为联军大都督，张绍曾、阎锡山为副都督，温寿泉为参谋长。并决定由山西义军，即日抽派三营开赴石家庄，同第六镇会师起义。

壮志未酬 捐躯殉国

当时，清政府正谋以袁世凯为中心，重组反革命力量，以为苟延残喘和卷土重来之计。袁世

凯也正谋乘机窃取清廷政权,以为其操纵南北两方,进而夺取全国政权的凭藉。他们狼狈为奸,眼睛都盯在石家庄方面。特别是此时的袁世凯还留在武汉军中,正要晋京就任内阁总理大臣,如果石家庄方面发生变化,清廷巢穴为之倾覆,他就再也进不了北京,一切阴谋计划将完全破产,而且背腹受敌,他的军队也会遭到惨败。“有吴无袁”,情势显然,袁世凯当然比任何人看得更清楚。所以,他想要在晋京之前,先除掉吴禄贞。因为他自知在战场上决打不过吴禄贞,所以决定用阴谋暗杀的手段来达到目的。他找来被吴禄贞撤职的前六镇协统周符麟,面授暗杀毒计,许以事成之后,回任协统。周奉命后携巨款潜至石家庄活动。吴禄贞的参谋何遂发现后,曾把此消息告知吴,但未引起吴禄贞的注意,吴还说:“卫队营长马惠田亲信可靠,可以放心。”没想到万恶的凶手正是这个马惠田,周符麟用两万两银元把他收买了。

1911年11月7日(清宣统三年,辛亥九月十六日),那时燕晋联军的组建工作已经完成,根据娘子关会议的决定,山西义军的一营先头部队已于当晚赶到了石家庄,还有两个营将于明天到达,只等他们一到,就同第六镇的主力部

队,举行声势浩大的会师起义。从太原、娘子关、石家庄直到保定,有关的人们都在为此彻夜不眠地忙着,大家都以空前紧张和无比兴奋的心情,迎接充满希望、充满光明的明天。时针指向了午夜一点,再过几个小时,就会听到一声炮响,把古老沉寂的北国大地从睡梦中惊醒,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石家庄联军起义的枪声将汇同武昌起义的枪声“南北呼应”,交织成一支光荣、胜利的辛亥革命进行曲。谁能想到,就在这个关系着亿万人生死祸福和国家命运前途的重大时刻,一支万恶的毒箭射进了联军统帅的心脏!出卖了灵魂的可耻叛徒马惠田,乘着深夜,悄悄走到了他的长官面前,口称贺喜,手放冷枪,隔壁房间里的何遂听到枪声,赶忙跑了过来,只见这位英雄的统帅倒在血泊之中,且首级也被割走,案上还摆着吴禄贞给滦州张绍曾的复电,墨迹尚未全干,再看张世膺,周维桢两位战友也都横尸一旁,凶手已经逃走。刚刚建立起来的燕晋联军,一时群龙无首,陷于混乱。山西和滦州的两路起义大军,在失去统一指挥的情况下,先后为清军各个击破。这场气壮山河,志吞北国,本可一举推翻清廷,建立共和的革命起义,义旗尚未举起,便瓦解冰消、宣告结束。



吴禄贞一家

辛亥革命老人孔庚在悼念吴禄贞时,曾这样写到:“吴禄贞,是个雄才大略,辩才无碍的人;尤其是识见过人,热心爱国。假使他这次(燕晋联军)的事能成功,袁世凯当时决不能存在;北洋派也不至祸国十余年;民国成立,必另有一番气象。”

噩耗传来,举国悲痛。辛亥革命领袖孙中山含泪为他的亲密战友、同志亲撰了祭文:“荆山楚水,磅礴精英,代有伟人,振我汉声,觥觥吴公,盖世之杰,雄图不展,捐躯殉国……”

(责任编辑 赵友慈)

扼杀戊戌变法的 慈禧为何也搞新政

□ 王戎笙

清末朝廷有过一场巨大的权力斗争，斗争的焦点是革新与守旧。激烈斗争中的两个阵营，都有大量的汉族高级官员和著名知识分子，且在两个对立阵营中各自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场斗争的结局，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影响深远。权力斗争背后的慈禧太后也起着一言九鼎的作用，历史学家对这位铁腕太后的政治智慧和政治主张，基本上是持批评和谴责的态度。

洋务运动和维新时期的慈禧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之间爆发了甲午战争。如何应付这场战争，清政府内部存在着两派：一派以慈禧太后为首，史称后党，主张避战求和；另一派以光绪皇帝为首，史称帝党，是主战的一派。光绪皇帝虽已亲政，但重大事务的决策权仍在慈禧手里。后党是当时最有实力的一派，从中央到地方，掌握实权的大臣，都仰承慈禧太后的意旨行事。尽管当时中国已经拥有用洋枪洋炮洋军舰武装起来的海军和陆军，单从军事力量来说，与日本不相上下，官兵们为国捐躯的献身精神也是可歌可泣的。但由于政治腐败、战略错误，甲午战争以中国惨败告终。中国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这是自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以来，西方列强迫使中国签订最苛刻的不平等条约。

《马关条约》，成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新党

醒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被一个新近崛起的小国打败，这一严酷事实，不能不引起一批有识之士的思考。

日本向西方学习和中国“师夷之长技”，差不多是在同时和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开始的。但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以后，短短三四十年之间，奇迹般地变成令人刮目相看的强国。而中国呢，经过30年的洋务运动之后，依然还是贫穷落后的国家。中国“师夷之长技”的“洋务运动”，只着眼於技术，不求政治革新。政治上依然是封建主义的君主专制。洋务派只允许在工业技术方面进行改革，不愿也不敢提出把专制制度改革为民主的政治制度。洋务企业无论是官办、官督商办或者是官商合办，官场上的种种恶习都带进了企业，使企业衙门化，缺乏生机和活力。企业里养了一批根本不懂得企业经营管理和在科学技术上一无所长的官僚，官僚们的一大批亲朋好友也在企业里挂名分肥。积弊积弱的中国，没有通过30年的求富图强的运动真正富强起来。

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洋务运动”不同之点在于，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同时推进。1885年日本2月11日由天皇颁布日本宪法。1890年召开国会，举行第一次大选。宪法将各项改革成果从法律上肯定下来，标志着君主立宪形式的近代天皇制的最后确立。

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洋务派那种只在工业企业上向西方学习无补於大局，非革新政治不足以救亡图存。于是便有了光绪皇帝支

持下的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领的戊戌维新运动。

维新派的目标是要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醉心于拥立光绪皇帝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富强。光绪皇帝之所以支持变法，其目的是希望大清江山繁荣昌盛，慈禧太后又何尝不希望大清江山繁荣昌盛呢？就拿洋务运动来说，慈禧开始并不反对，如果那时她说半个“不”字，奕訢、文祥、李鸿章、曾国藩，就不敢有任何作为，据《慈禧传言录》载：“后尝告德宗，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凡以图富强也。”慈禧太后有一条铁的准则是必须严守的，即“师夷之长技”可以，但“祖宗之法不可变”。

《马关条约》刺痛了光绪，“皇上日夜忧愤，益明中国致败之故，若不变法图强，社稷难资保守”。难道《马关条约》就没有刺痛慈禧太后？她就心甘情愿地把大清江山割让一块给外敌？她就心甘情愿地把白花花的银子作为战争赔款送给外人？据《盛宣怀未刊信稿》载，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初二（1899年10月6日）慈禧在召见盛宣怀时说：“你说的甚是，必要做到自强。但是现在外国欺我太甚，我所以十分焦急。”不要让大清江山被列强蚕食鲸吞，帝党和后党之间是没有分歧的。光绪变法图强之初，慈禧采取了有条件的支持态度。光绪帝在下决心变法之前，曾到颐和园叩见慈禧太后请旨，慈禧对光绪说：“凡所施行之新政，但不违背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致国家于富强是共同的要求，变法也是可以的，但还是要坚守那条铁的准则：“祖宗之法不可变！”当然皇太后的绝对权威，满洲的权势，也是不允许有丝毫触动的。慈禧太后尤其不愿看到的，是在光绪皇帝周围聚集了一股新的势力，一批不受慈禧太后喜欢的人；而这些人

也不喜欢慈禧太后所宠信的死守着祖宗旧法的老臣。这是帝党和后党之间矛盾的焦点，这两方面的人愈聚愈多，矛盾也就愈来愈激烈。当恭亲王奕訢还活着的时候，由于他的特殊地位，既能约束光绪皇帝，也能向慈禧太后进言，实际上起到了在帝后两党之间进行协调的作用。奕訢关于变法的主张接近于慈禧，他认为“祖宗旧制不可尽更，新进之士不可遽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日（1898年5月29日），恭亲王奕訢去世，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光绪帝颁发《明定国是诏》，标志着戊戌变法的开始。几天以后，光绪不得不遵照慈禧的旨意砍断自己的左臂右膀，下谕将草拟这个《明定国是诏》的翁同龢开缺回籍。同日以荣禄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又命二品以上大臣要到慈禧太后处谢恩。慈禧这几项措施，是对刚刚起步的维新变法的当头一棒。光绪心里明白，他已失去了二品以上大臣的进退黜陟之权，军机大臣及各省督抚只对慈禧效忠，对皇帝的诏谕却可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甚至公然抗旨。帝后两党之间的裂隙已经演变成了鸿沟，变法的失败已成定局，只是时间迟早而已。慈禧对待维新变法，就像猫对待利爪下的老鼠



慈禧在颐和园仁寿殿前乘舆

一样,随时可以把它一口吞下。

由于操纵朝廷实权的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坚决反对,自6月1日光绪皇帝颁发《明定国是诏》起,维新变法只进行了103天。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幽禁光绪皇帝,处死谭嗣同、林旭、杨锐、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史称“戊戌六君子”。先后罢免或遣戍参与新政的官员数十人,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批维新志士亡命海外。慈禧策动政变的得力亲信荣禄,内调为军机大臣,节制北洋各军,操军政大权。被光绪革罢的官员,一一起用。恢复八股旧制,停止经济特科,除京师大学堂等少数几项外,废除了绝大部分新政诏令。

慈禧的宣战与求和

1900年6月10日,英国海军提督西摩率英、德、俄、法、美、日、意、奥等国侵略军2000人,从天津向北京进发,在廊坊一带受义和团抗击。6月17日晨,英德俄法美日意奥“八国联军”以优势兵力向大沽炮台发起猛烈进攻,激战数小时,炮台失守,守将自尽。

这时,清政府面临空前严峻的内忧和外患。内忧是人数众多、具有强烈盲目排外思想的义和团;外患是用精良武器装备起来的八个国家联合起来的侵略军。如何对付义和团,如何对付八国联军,这是当时关系国家命运的艰难选择。慈禧为此召开了四次御前会议。名为御前会议,实际上是慈禧一人说了算。这时,慈禧获得两个完全不准确的信息,一个信息是义和团有刀枪不入的神功,有不怕洋枪洋炮敢于和一切“洋鬼子”血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这个信息使慈禧太后得出了民心可用的结论。另一个信息是各国公使要求慈禧太后归政光绪皇帝。这个信息使慈禧得出了洋鬼子可恨的结论。在6月19日召开的第四次御前会议上,慈禧太后已经决定向各国宣战。这是一个草率的决定。在没有进行任何战争动员,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均无准备的情况下,便向为数众多的强国宣战,总署随即照会各国公使,令他们在24小时内离京。宣战之后,慈禧所作的惟一重大决策是“招抚”

义和团,利用这些未经军事训练手持简陋武器的团民去围攻外国驻华使馆,击杀外国人。由于慈禧的所作所为,一场本应是全国军民高举反侵略的伟大旗帜,坚决抵抗入侵之敌的正义斗争,起码在外观上扭曲成了一场愚昧的盲目的排外活动,而这个活动中还夹杂着帝后两党之间的权力斗争。

慈禧颁布宣战上谕之后,曾令各省督抚将义民“招集成团,借御外侮”。但东南地区的地方实力派,却提出了与慈禧主政下的北京中央政府完全相反的政治主张,史称“东南互保”。所谓地方实力派,主要是指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还加上江苏、湖北、安徽、江西、湖南等省的巡抚。他们认为,义和团是“邪教”,是“乱民”,他们戕害无辜洋人,焚烧洋货洋房,杀死外国外交官员,必然造成全局混乱,不可收拾。这些地方实力派公然对抗慈禧太后的决策,要求立即剿灭义和团;要求飭令驻各国使臣分别向各国道歉;要求“明谕各省保护洋商、教士”。几个地方督抚大员竟敢串通一气,如此明目张胆地与朝廷对立,这是从清王朝建立以来前所未有的奇变。公然抗旨,其罪当诛,这是大家心里都明白的。可是这时的慈禧太后却顾不得这些,在报告有关东南互保的电文上,无可奈何地批了三个字:“知道了。”她心里当然明白,这些督抚大员的行动,无论怎么辩解,都越出了可以容忍的界限,但她不得不容忍他们的越轨行为。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烧杀抢掠,慈禧惊惶失措,带领光绪和一些王公大臣,向西逃亡,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赋予便宜行事之权,收拾她留下的乱摊子。受命为全权大臣的李鸿章,非常清楚与联军议和这副担子的分量。要使联军停止在华的烧杀抢掠,结束战争行动,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在项新的屈辱条约上签字是不可避免的。李鸿章犹豫了,朝廷多次电催他兼程北上,而他于7月21日从广州到达上海,便称病在此暂住,直到9月14日,也就是派他为全权大臣之后一个月零七天,他才自上海起程北上。

慈禧太后从6月21日下诏向列强宣战,到

8月7日派李鸿章向列强求和，这个急转弯才用了四十几天的时间。

与帝国主义列强的议和谈判是一个复杂的讨价还价过程，最大的难点是惩办肇事大臣和赔款数额。每一个谈判细节都要请示，正如奕劻、李鸿章奏报中所说：“臣等相机因应，笔秃唇焦，卒以时局艰难，鲜能补救，……所有一切办理情形，均随时电陈折奏。”列强屯兵京津，拿到谈判桌上的和议总纲十二款，“不容改易一字”，还不时以派兵到西安相威胁。逃亡在外的慈禧希望尽快谈成，南方的刘坤一、张之洞则希望尽量减少损失。列强之间由于各自的在华利益不同，相互钩心斗角，还需要时间协调立场缓解冲突。求和谈判进行了一年之久，奕劻、李鸿章将最后文本电奏，慈禧太后立即批准：“公约业已定议，即行画押。钦此。”1901年9月7日，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代表中国与德奥比西美法英意日荷俄等十一国代表，签订了最后议定书，共十二条。因为是辛丑年，故称之为《辛丑条约》。根据这个条约，中国要向各国赔款4.5亿两白银，分39年还清，加上年息4厘和地方赔款，总额超过10亿两白银。因为是为上一年的事件赔款，所以称之为庚子赔款。这是自“马关条约”以来，列强以武力胁迫清政府签订又一贪婪无耻的条约。

慈禧罪己、求言和变法

1900年8月20日，慈禧在向西逃亡的途中，以光绪帝名义，下罪己诏。诏中对列祖列宗及慈禧太后作了一番颂扬之后说：“不谓近日衅起，团教不和，变生仓猝，竟致震惊九庙。慈舆播迁，自顾藐躬，负罪实甚。……知人不明，皆朕一人之罪。”无论谁读了这段文字都会知道，承认“负罪实甚”的不应是被幽禁的光绪，而是专制独裁的慈禧。

8月22日，在向西继续逃亡途中，在宣化府城又下诏求直言。谕曰：“自来图治之原，必以明目达聪为要。此次内讧外侮，仓猝交乘。频年所全力经营者，毁于一旦。是知祸患之伏于隐微，为朕所不及察者多矣。惩前毖后，能不寒

心。自今以往，凡有奏事之责者，于朕躬之过误，政事之阙失，民生之休戚，务当随时献替，直陈无隐。”这道求直言的诏书，没有得到任何反应，因为谁也不敢轻易相信慈禧求直言是真诚的。

又过了100天，12月1日，慈禧已逃到西安，在西安行宫发布上谕：“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欲求振作，当议更张。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各直省督抚、驻扎各国使臣，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兵政财政等，有因有革，有省有并，各举所知，限两个月内详悉以闻。”要求大臣们在两个月的限期内，就政治改革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两个月过去了，屠杀维新志士的恐怖记忆，使大臣们仍然噤若寒蝉。

1901年1月30日（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一向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了变法诏书。诏书以雄辩的文字说明，只有“变法”，才能使国家渐致富强。祖宗之法也不是不可变的，而且列祖列宗也是在不断地变法。请看诏书的几段原文：

“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论语》。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伊古以来，代有兴革。当我朝列祖列宗，因时立制，屡有异同。入关以后，已殊沈阳之时。嘉庆、道光以来，渐变雍正、乾隆之旧。大抵法积则敝，法敝则更，惟归于强国利民而已。自播迁以来，皇太后宵旰焦劳，朕尤痛自刻责，深念近数十年积习相仍，因循粉饰，以致成此大衅。现正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致富强。懿训以为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

“今者恭承慈命，壹意振兴，严祛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借为藏身之固，而胥吏恃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牒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祸天下者在一例字。晚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机械而已，

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学之本源也。居上宽，临下简，言必信，行必果，服往圣之遗训，即西人富强之始基。中国不此之务，徒学其一言一语一技一能，而佐以瞻徇情面，肥利身家之积习，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邪？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须议更张。”

慈禧当然知道臣民们对于不久前戊戌变法的被血腥镇压会心有余悸，所以在光绪的变法诏书中不得不作某些新的解释。说康有为、梁启超等“妄分新旧”，以致造成“伪辩纵横”。给康梁定性为“乃乱法也，非变法也”。为表朝廷变法之心诚，诏书还呼吁：“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内悉条议以闻。”

慈禧在西安大讲变法图强，尽管娓娓动听，但很难取得大臣们的信任。除了两年前那腥风血雨的可怕记忆外，还有眼前的现实：八国联军驻在北京，和议谈判仍在艰难地进行。此时此地大谈变法图强，总给人以玄机莫测的感觉。疑虑、惶惑、观望，是当时官员的普遍心态。

慈禧用成立领导变法的办事机构，以证明自己倡导变法的真诚。1901年4月21日，下令成立督办政务处，网罗了当时在位的全部军机大臣和全部大学士，还加上当时最有影响的地方实力派人物遥为参预。成立这样一个强有力的督办政务处，使得慈禧所推行的新政，一亮相就是声势显赫，如上谕所说，“示天下以必信必果”。

慈禧新政种种

慈禧下令成立督办政务处，使得她的变法决心，终于取得大臣们的信任和理解。列名督办政务处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先后于一个月之内（7月12日、7月19日、8月11日）联衔会奏，连上三折，即著名的《江楚会

奏变法三折》。

同年10月2日，慈禧以发布太后懿旨和皇帝上谕的形式，充分肯定了刘坤一、张之洞联衔会奏的变法三折。懿旨云：

“兹据政务处大臣荣禄等面奏：变法一事，关系甚重，请重申诰诫，示天下以朝廷立意坚定，志在必行，并飭政务处随时督催，务使中外同心合力，期于必成。用是特颁懿旨，严加责成，尔中外臣工，须知国势至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惟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亦即中国民生之转机，予与皇帝为宗庙计，为臣民计，舍此更无他策。尔诸臣受恩深重，务当将应行变通兴革诸事，力任其难，破除积习，以期补救时艰。昨据刘坤一、张之洞会奏整顿中法，仿行西法各条，其中可行者，即着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各省疆吏，亦应一律通筹，切实举行。”

从这道懿旨不难看出，慈禧的变法是大胆的、真诚的，而且有很强烈的紧迫感。刘坤一、张之洞联衔会奏的变法三折，实际上为慈禧绘制了一幅变法自强的蓝图。

这时的慈禧，还在逃亡途中，此时决心变法图强，自然与被迫逃亡有关。慈禧以往的口头禅是祖宗之法不可变，可是坚持祖宗之法的结果是愚昧贫穷软弱，眼看着龙兴之地让俄国人蹂躏，列祖列宗的陵寝无力守护，不得不告别宗庙社稷，来一个噩梦般地大搬迁。教训当然是惨痛的。以顽固不化著称的慈禧太后终于明白了：为了祖宗，为了保住祖宗留下的江山，祖宗之法是可以变的，不变祖宗之法不足以图富强，到头来连祖宗的江山都保不住了。

慈禧的新政，就其重要者说，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行政制度的改革。裁撤或合并一些有名无实或职能重复的衙门。创设了一些新的官署，最重要的是将总理衙门改组为外务部，改变了沿袭千余年的传统的六部建置，而且品级高于其他各部。此后还设立了前所未有的商部、巡警部和学部（教育部）。

军事制度的改革。裁汰绿营十分之二三，取消武举，命各省创设武备学堂。设立练兵处，控

制各省的新军,光绪三十二年并入陆军部。改革的目标是按西方模式,建立一支强大的新式军队。

教育制度的改革。颁布《学堂章程》,这是我国近代第一部完备的教育法规。学堂有普通学堂和专业学堂。改书院为学堂,命各省于省城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县改设小学堂。学堂的管理、课程设置和考试方法完全是从西方引进的。1905年明令废除了沿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

法律制度的改革。中国的法律制度起源甚早,直到清代,还没有适应工商业发展需要的民法和商法。为此,制订了《商会简明章程》、《大清商律》、《公司注册章程》和《矿务章程》等等。同时,参照西方的法律修订了《大清律例》。

慈禧新政,无论从深度和广度说,大大超过了被她一手扼杀的戊戌变法,这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但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仅仅是实行这些新政而不改变国体,是不能使国家富强的。于是,便有了变更国体的议论。而这种议论,也来自地方实力派。

1905年7月2日,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署两江总督周馥,联衔奏请立宪,要求派遣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政治。慈禧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以光绪帝名义颁发上谕,决定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

五大臣先后考察欧美及日本等十几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并亲眼看到了这些国家工业、交通、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情况。他们回国后,慈禧多次召见,询问考察心得。他们一致赞扬这些国家的立宪政治。出国考察政治的载泽、端方,都先后上折,请慈禧太后准备立宪。

经过王公大臣一番辩论之后,慈禧发布懿旨,宣示预备立宪。懿旨说,“我国政令积久相仍,日处阽险,忧患迫切”,“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睽,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权限,以及筹备财用,经划政务,无不公之于黎庶。又在各国相师,变通尽利,政通民和,有由来矣。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

政。”慈禧这次急转弯,也是迅猛的。自听取出洋大臣的考察报告之后,短短的一个多月,便下懿旨,宣示仿效西洋,为立宪作准备。

专制暴戾之西太后,晚年承诺采用立宪制,曾遇到来自两种势力的反对。一种势力是一批顽固守旧大臣,他们反对的理由有两条,一条是立宪妨碍君主独揽大权,一条是立宪利于汉人不利于满人。另一种势力是清末的革命党人,他们认为,西太后预备立宪是假的,是为了麻痹革命党人的意志而进行的欺骗宣传。一开始就采取了激烈的态度。当慈禧派五大臣出国考察政治的时候,他们便密谋予以阻挠。在五大臣乘火车出京时,革命党人吴樾勇敢地掷放炸弹,吴樾壮烈牺牲,五大臣只有两人受轻伤,出洋考察政治改期进行。

慈禧晚年实行新政,并准备立宪,其中一些改革举措,不仅超越了百日维新,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她用铁腕把戊戌变法扼杀在血泊之中,两年之后又用铁腕实施了戊戌年间提出的变法主张,并且还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历史的潮流是不能阻挡的,即使像西太后那样顽固出了名的铁腕人物,也不例外。慈禧的新政无可非议,承诺预备立宪也非一无是处。但慈禧的顽固保守和她的急转弯,仍然逃避不了历史的谴责。正是她的顽固保守,丧失了改革政治体制的大好时机。当她实行新政、承诺预备立宪时候,一个新的政治气候已经形成。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不推翻清政府不足以刷新政治,不足以使中国走向富强。这个新的政治观念,代替过去那个在君主专制体制内进行政治改革以使中国走向富强的政治观念。民主共和与君主专制的较量,取代了君主立宪和君主专制的较量。即使慈禧的立宪是真诚的,也只是君主立宪,而且只是一个承诺。挽救覆亡的努力,尽管由铁腕人物挂帅,但为时已晚。她的预备立宪的承诺,遇到的是革命党人举起的民主共和的大旗,一面推翻君主专制的大旗。

历史是无情的。几年之后,清王朝就被革命党人推翻了。铁腕太后的种种努力,都不能挽救清室的覆亡。

(责任编辑 洛松)

中国载人航天飞船 总设计师王永志

□ 马京生

王永志曾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宇航科学院外籍院士，博士生导师。

干这一行，他感触最深的是一辈子提心吊胆。然而，让他感到最幸运的是，走上工作岗位就开始研制火箭，他参与主持的六种新型火箭首发无一败绩；他最受累的要算当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院长；风险最大的是研制中国的第一发大推力捆绑火箭；现在他最大的压力和愿望是用中国的飞船把宇航员送上天。

自古以来，神州大地就流传着嫦娥奔月的故事。飞上太空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梦想。在敦煌，我们的老祖宗头顶着昏暗的油灯，在漆黑的石窟中，一笔一笔地把自己遥远的梦幻描绘在洞壁上。于是，我们看到了隋唐时代色彩艳丽的飞天。今天炎黄子孙的美好愿望终于要实现了！

担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的是火箭技术专家王永志。1932年11月17日，他出生于辽宁省昌图县只有五六户人家的偏僻农村里，祖祖辈辈没有文化，一家人勒紧裤带省吃俭用供他上学读书。小学毕业，正好抗战胜利，八路军在他的家乡创办了昌北中学，寒门子弟免费入学读书。他连年考试成绩名列第一，初中毕业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免试保送到沈阳的东北实验学校就读高中。

50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了。当时，他听说在朝鲜战场我们的空中英雄使敌人闻风丧胆，他特佩服，同时也深深地迷上了天上的喷气式飞机。

高中毕业时，他最想学的是设计飞机。班主任钱老师对全班同学说：咱们班里有三个同学成绩突出，可以报考清华大学航空系飞机设计专业。王永志在填写大学报考志愿书时，郑重地写上了老师推荐的专业，还特意加上一句“喷气式军用飞机设计”。1952年，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考入了清华大学航空系飞机设计专业。

在清华大学学习了一年，航空系要选送10名学生到苏联留学，王永志是其中之一。

1955年，王永志来到莫斯科航空学院飞行器设计系飞机设计专业学习。

后来根据1957年10月25日中苏两国政府的协议，王永志等中国留学生改学火箭导弹设计专业。

苏联火箭专家对王永志说：“中国人不仅是火箭的发明者，而且也是首先企图利用固体燃料火箭将人载到空中去的幻想者。”

王永志知道自己国家的历史，北宋时，中国发明了火箭，元朝时传入西方。明朝的万户是试图利用火箭作为载人飞行运载工具的第一人。他将47支火箭绑在一把椅子上，万户坐在椅子上，手持两只大风筝，火箭点燃后发出巨大的轰鸣，万户消失在一片火红的烟雾中。

王永志决心实现祖先的理想，满腔热情地投入学习。在航空学院5年，他的学习成绩都是优秀，深受米申院士的重视。米申院士是苏联火箭总设计师科罗廖夫的第一副手和接班人，他协助科罗廖夫做了大量工作，在火箭领域很有成就。米申认为王永志具有成就一番事业的潜

质和秉赋,他将来一定有所作为。于是米申主动向院方提出,由他亲自指导王永志的毕业设计。米申对王永志说:“中苏两国关系紧张了,那是政治家的事,咱们的毕业设计该怎么搞就怎么搞。”

在米申的指导下,王永志的毕业设计选择了《洲际导弹设计》这一题目,毕业时获得优秀生文凭和工程师称号。

王永志回国时,他在校的学习笔记和毕业论文,按校方的保密规定统统被扣下,因此,他回国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关在屋里,凭着记忆把所学的知识整理成笔记,这些笔记为指导后来的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尔后,王永志在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部开始了我国第一种自行设计的中近程火箭的研制工作,他任总体设计组组长。

1964年6月29日,王永志第一次走进戈壁滩,执行发射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种中近程火箭任务。试验发射时,火箭射程不够,失败了。专家们都在考虑,怎样再给火箭肚子里多添加点推进剂,可火箭的燃料贮箱有限,再也喂不进去了。正当大家绞尽脑汁想办法时,王永志站起来说:“火箭发射时推进剂温度高,密度就要变小,发动机的节流特性也要随之变化。经过计算,要是从火箭体内泄出600公斤燃料,这枚火箭就有足够的射程。”

大家的目光一下子聚集到这位中尉的身上。他是在座的人中军衔最低的。有人不客气地说:“本来火箭射程就不够,你还要往外泄燃料?”于是再也没有人理睬他的建议了。

王永志并不就此甘心,他找到坐阵酒泉发射场的技术总指挥钱学森。当钱学森听完这个“小字辈”意见后,眼睛一亮,高兴地喊道:“马上把火箭的总设计师请来。”钱学森指着王永志对总设计师说:“这个年轻人的意见对,就按他的办!”

果然,火箭泄出一些推进剂后射程变远了,连打三发,都命中目标。

从此,钱学森记住了王永志的逆向思维,也记住了王永志。三十多年后,总装备部领导去看望钱学森,钱老还提到了王永志,并兴致勃勃地



王永志

说:“我推荐王永志任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他年轻时,大胆的逆向思维,就和别人不一样。”

60年代末,中国集中精兵强将加快研制远程火箭,王永志被选调到这支研制队伍中,并晋升为远程火箭的副总设计师,协助总设计师屠守锷工作。

1971年,王永志担任火箭首飞试验发射阵地的技术负责人,首飞试验获得成功后,他主持把这种火箭改型为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技术设计和研制工作,为我国以后发射返回式卫星准备好运载火箭。

1978年,王永志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

这一年,中国的航天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开始研制中国的第二代战略火箭。一天,钱学森和国防科委、航天部的领导来到火箭技术研究院视察,听完王永志的汇报,钱学森的脸上露出笑容,幽默地建议:第二代战略火箭让第二代人

挂帅,让王永志担任总设计师。

王永志当了多年的总师,他的目光始终盯着世界最高水平。他首先从设计质量抓起,特地撰写了《设计守则》。

为选择优质元器件,他请来了四十多个厂家的代表。当面协商,当面敲定,择优录用。并编制了《电子元器件选用目录》,规范了选用范围。在质量控制,标准化要求等方面,实行了一整套的组织管理办法。同时把经济观念引入型号研制之中,最先实践了型号研制经费包干制。把一切型号的研制都纳入预算、概算,按项目规定经费。在型号发展上,他力主并率先实践了“基本型、系列化”的研制思想。

总之,他挂帅第二代战略火箭时,在各级领导和老专家们支持下,在技术、管理、思维方式等方面都做出了新的突破。

王永志担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期间,适逢1986年国际航天发射市场由于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和阿里安火箭频频失利,出现了运载能力危机,特别是大型卫星的运载能力在商业发射服务方面几乎是空白。王永志等人以此为契机,向航天部提出,以“长征二号”火箭为基础,研制大推力捆绑火箭,使火箭近地轨

道的运载能力由原来的2.5吨提高到8.8吨,可以承揽用航天飞机发射的大型卫星,由此,将中国的运载火箭推向国际市场。

1988年,他们与美国卫星公司签订的协议规定:1990年6月30日前,捆绑火箭必须竖立在发射平台上。否则,取消合同,罚款100万美金。

这是一副空前沉重、风险最大的担子:一头是研制火箭需要的几亿元贷款,一头是全新的技术加紧迫的研制周期。王永志作为一院之“长”和研制这种大推力捆绑火箭的总的指挥,他和总设计师一起制定切实可行的技术方案和研制方法,带领全体研制人员闯过了重重难关,相继突破了“捆绑”、推进剂和大型整流罩等新技术。

18个月后,捆绑火箭巍然竖立在西昌航天城的发射平台上。

1990年7月16日,中国火箭从“一根棍”的老面孔变为大推力捆绑火箭的新形象,不负众望地飞上了云霄,运载能力达到9.2吨,比长征二号火箭的运载能力几乎翻了两番。不仅为以后发射澳大利亚通信卫星奠定了技术基础,也为载人航天运载火箭的研制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中国航天人这一辉煌成就终于使美国人信服了。

王永志由于成功地研制了捆绑火箭,而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并被任命为航空航天部运载火箭系列总设计师。

王永志在航天领域走了三大步:导弹——火箭——飞船。1987年4月,他成为“863计划”航天领域专家委员会7名成员之一。时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的朱光亚找他谈话,请他参与拟制我国发展载人航天的蓝图。

1992年1月,王永志被中央专委任命为中国载人



王永志和夫人王丹阳

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

这一年他正好 60 岁,进入花甲之年也是他生命中辉煌的一年,他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宇航科学院外籍院士,一顶顶耀眼的桂冠戴到他的头顶上,是光荣也是责任。

王永志是一个胆大心细的人,在工作上他力求稳妥可靠。飞船的着陆场,最初经空勘选在了河南驻马店地区的黄泛区。为了万无一失,1993 年 2 月初,王永志等率队开始对该地区进行地面详细勘查。他发现那片黄泛区仍然人口密度很大,每平方公里平均 600 人。接着他勘查了内蒙古的大草原,发现有一片退化了的草原,平均每平方公里只有 2 至 3 人。于是他提出改变轨道倾角,将这里选为飞船的着陆场,受到中央的赞扬。

王永志作为整个工程的技术总负责人,逐个审定了航天员、飞船应用、火箭、载人飞船、发

射场、测控通信、着陆场等七大系统的技术方案。为了使“神舟”飞船首飞成功,1998 年他作为技术总负责人主持完成了火箭——飞船——发射场合练,以及零高度状态下的逃逸救生飞行试验,并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

1999 年 11 月 20 日 6 时 30 分,我目睹了中国第一艘飞船“神舟”号从酒泉发射场起飞,绕地球转了 15 圈,飞行 21 小时 11 分,于 11 月 21 日凌晨 3 时 41 分在内蒙古中部着陆场成功返回。在中国航天史上树起了新的里程碑。在飞船发射前的三天,恰逢王总的生日。三天后飞船发射成功,同事们又为他过了一次大喜的生日。王永志说:这是航天事业赠给我的最有意义的一次“生日蛋糕”。

王永志现在已经瞄准了要用中国的载人飞船,把中国的宇航员送上太空。

(责任编辑 刘 文)

康熙粉碎“台独”

□ 艺 兵

康熙二十年,清政府平定三藩之乱以后,东南沿海近海的大小岛屿均为清政府所控制,中国大陆已完全统一。此时康熙皇帝决心出兵收回台湾。

出兵前,清政府主张用和平方式收回。条件相当宽松,清军不上台湾岛,台湾居民不剃发,也不必穿清服;甚至还放宽到“不称臣、不入贡也可。”实际上,允许台湾实行和清政府不同的社会制度,让它们高度地方自治。但台湾情况复杂。郑成功的孙子郑克塽刚接位,他还正在读“人之初”,一切大权已被侍卫长冯锡范等人把持。上层又腐败,还千方百计阻挠统一,康熙“招抚”政策长期没有结果。这时,朝廷有人主张,认为台湾“孤悬海外,易藪贼,欲弃之。”水师提督施琅,长

期在海上作战,深知台湾的重要性。他说“台湾虽一岛,实腹地数省之屏蔽。弃之,则不归藩(指日本)不归贼(指郑氏),必归荷兰,恃其戈船火器,又据形胜膏沃为巢穴,是借寇兵而资盗……。”他的意见深得康熙皇帝的赏识,坚定了收回台湾的决心,并继续派大员和台湾方面谈判。但郑氏集团提出台湾应“仿琉球、朝鲜例,列台湾为藩属。”这就意味着他们要求清政府把台湾当一个“国家”对待。这种台独言论遭到康熙的强烈反对。他说:“郑氏乃中国之人”,“台湾人皆闽人,不得与琉球、高丽比。”坚定表明台湾不能从祖国分裂出去。

康熙经过充分准备,1683 年 6 月,他命施琅率战船三百,水兵两万,扬帆从福建前线打到澎湖列

岛,并迅速攻上台湾本土。不到一个月,郑氏招架不住,只好投降,献出了台湾的土地、户口、军资及明王朝所授的王、公、侯、伯和所有将军、都督印授。从此以后,台湾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后来,施琅被任为台湾的靖海侯。

台湾回归祖国 38 年之后,又爆发了朱一贵动乱。这个原为鸭贩子的人,借口清政府苛捐杂税太重,煽动三十万群众,自称“中兴王”,七天就占领了台湾全岛,扬言要脱离清政府统治。康熙不能容忍这种叛国行为,又派战船 600 多只军队 12000 多人,镇压了朱一贵的叛军,重新夺回对台湾各方面的控制权,维护了祖国领土的完整和统一。

(责任编辑 老 赵)

一代学人丁文江

□ 尹 骐

丁文江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是很有名气的。他不但被誉为“中国地质学的开山大师”，和翁文灏、李四光等共同开拓了中国现代地矿事业，而且广泛涉猎人文学科领域，对中国现代的政治、文化、经济、社会等诸多问题，进行过积极探索，发表过大量论文，并因此成为颇有影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表人物之一。只是在解放后，他才被人们所淡忘，乃至完全被遗忘。其所以如此，原因不外是：他曾经和胡适、傅斯年等人长期交往，过从甚密，因而在解放后被打入了资产阶级反动学者的另册；他还一度从政，被军阀孙传芳拉去做过半年多的上海地方行政主管，即淞沪督办公署总办。有这一大历史污点，自然更为革命左派所不齿。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就使这位著名的学人和社会活动家长期地被冷落、被淹没于历史的尘封之中。然而这毕竟有失于历史的公正。

从“神童”到 “通才”的求学之路

丁文江，字在君，1887 年出生于江苏泰兴县的一个大户人家。当他还在“襁褓”中就由其父丁吉庵先生教其识字，5 岁即正式入学读书。除正常课业外，又常浏览古今小说，尤好读

《三国演义》；到六、七岁后，即阅读《纲鉴易知录》以及《四史》、《政治通鉴》等。数年之内，便将《四书》、《五经》通读完毕，还阅读了大量古典诗词、古文名家名作。少年丁文江不仅勤于读书，而且勤于思考，学以致用，十一岁就能写议论文章。

所谓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驹。少年丁文江有幸获得当时在泰兴做知县的湖南人龙研仙的赏识和支持。龙先生是一位饱学之士。他在泰兴做地方官时正是“戊戌维新”提倡“新学”之际。他听说丁文江少年好学，便有意给予提携。1901 年丁文江想投考上海南洋公学，按当时习惯须由地方官保送，龙研仙便将丁文江找来进行面试，以《汉武帝通西南夷论》为题命丁作文，丁文江洋洋洒洒论古及今，使龙大为惊异，当即决定收丁为弟子，并悉心给予指导，后又力劝丁家让文江出国留学，还委托一位熟悉国外情况的胡子靖先生直接将丁文江带往日本。

1902 年，丁文江到日本后名为留学，但却并没有进什么正规学校。当时中国留日的学生参与革命政治活动的较多。他们热衷于办杂志，宣传排满。丁文江同他们交往，也深受影响，渐渐地也就热衷于谈政治，写文章。当时留学生办有好几种以中国地域命名的杂志，如《浙江潮》、《江苏》等，丁文江积极为杂志撰稿，

并做了一任《江苏》杂志的总编辑。这时他还不满 18 岁,但他的文章却写得很流畅,也很有见地了。

1904 年初日军袭击旅顺口,随即爆发了日俄战争,中国留学生更无心念书了,丁文江对此感到不满。这时,正在英国的吴稚晖给日本留学生写信,劝说他们到英国去留学。丁文江就同另两位学生相约结伴前往英国。

到了英国之后,丁文江以他的聪明天赋加上勤奋的努力,用两年时间读完了全部中学课程,并顺利考取了著名的剑桥大学。但在剑桥,他也只读了半年书,后因负担不起剑桥的高昂费用,他又到苏格兰进入当地的葛拉斯哥大学,1911 年初获得了该大学的动物学和地质学的双科毕业文凭。

从 1902 年到 1911 年,丁文江先后在日本和英国留学九年。这正是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一个高潮时期。他在日本两年虽然没有进入正规学校系统学习,但通过自学和社会实践活动,在人文科学领域内却取得了很大收获,经受了良好锻炼,这为他后来作为一个人文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奠定了基础。而在英国的七年,则使他系统地学习和掌握了数学、物理、化学等近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和生物、地质、地理等学科的专业知识。这些自然科学知识的积累以及后来的不断实践和研究,使他最终成为一位出色的科学技术专家,并使他从一个独具潜质的“神童”成长为一个十分难得的接近于“通才”的大家。

中国地质学的开山大师

1911 年的春天,丁文江结束了在英国的留学生活,决定回国发展,他选择了乘船从越南登陆,由陆路进入中国云南境内。他先到昆明,然后从昆明由西向东,徒步前行,经云南的马龙、沾益、平彝,又经贵州的安顺、贵阳、龙里、贵定、清平、黄平,历时整整一个月才到达黔东南名城镇远。此次旅行,他主要是以地理学者的身份进行实地考察。考察的结果,纠正

了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中国地图》以及英、法、德、日文版百万分之一的中国地图没有标明他所旅行的这条贯通云贵两省的重要驿道的错误。原来所谓的《最新中国地图》还是以康熙年间一位天主教士所测的地图为蓝本的。

1912 年,丁文江到北京后,利用北京大学已经停办的地质专业的图书资料和标本,开办一个地质研究班,以培养地质人才。这个研究班后改称地质研究所,由丁文江主持,并由他担任“古生物学”的授课任务,后来又把刚刚留学回国的翁文灏请来做主持教授。这个地质研究所虽只开办了两年,却培养了一批出色的地质学人才,其中的一些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地质学界的领军人物。

1916 年,北京大学决定将地质研究所收回重办地质学系。丁文江同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商定,北大地质学系专门培养地质人才,丁自己主持由政府管辖的地质调查所,则专门做地质调查研究工作,并且随时吸收北大地质学系的毕业生参加调查所的工作,使这些毕业生得到锻炼和提高。

由于有以上的商定,丁文江对北大地质学系的建设就特别关注。地质学系最初的几位毕业生到调查所去找工作时,丁文江亲自对他们进行考试,以判定他们的学业水平,考试的结果使他很不满意。他同胡适商量整顿改进的办法,结果是:聘请更好的师资以加强地质学系的建设。很快就请来了在地质学方面卓有成就的李四光到北大地质学系任教授,又从美国请来著名的古生物学家葛利普来担任古生物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这位古生物学家后来就一直留在中国,直到 1946 年去世,整整为中国地质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了 26 年。他死后,被安葬在北大地质馆的门前。这是对他的贡献的最好证明。

丁文江不仅在中国地质事业的开创时期,为建立地质科学的研究和管理机构、为地质人才的培养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而且他在地质科学的实践方面也做出了重大成绩。1913 年到 1915 年间,他曾先后到山西、云南、四川做

长时间的实地调查研究工作，并获得重要成果。他跑了山西很多地方，对当地的地矿资源进行考察，重点是测量铁的储藏情况，他以确凿的数据否定了此前德国一位地质学者对山西铁矿藏量的过高估计。在云南、四川，他长途跋涉，考察了许多府、县，着重研究了东川的铜矿，个旧的锡矿，宣威的煤矿情况。又将其经历的路线作成地质图，标明地层地质构造，并采集了大量化石。后来此项成果的一部分曾正式出版，为后人的进一步调查研究奠定了基础。

从1921年起，丁文江由于经济和其他一些原因暂时离开了地质科学工作岗位，先后担任过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和上海督办公署总办。经历过1927年的历史巨变后，1928年他又回到了地质战线继续其调查研究工作，并于1928、1929、1930三年内两次到广西、贵州、四川进行大规模的地质调查工作，获得了大量成果。在此期间，他被推举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从1931年起，他应聘担任北大教授，为地质战线又培养了大批英才。直到1934年应邀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才离开北大。但在中央研究院，他仍以组织领导科学研究工作为己任。1935年为了查明粤汉铁路沿线的矿藏，他亲自带队做实地勘查。直到1936年1月病逝于湖南长沙。他是死在地质科学工作第一线岗位上的，真可谓是鞠躬尽瘁。

热心议政参政 不失书生本色

前面提到，丁文江这位大师级的一代学人之所以长期被人们淡忘乃至遗忘，一是因为他和胡适、傅斯年等人交往甚密，在政治思想和文化方面与胡、傅等的观点相同或相近，因而被列入了资产阶级反动学者而划入另册；二是因为他曾一度做过孙传芳统治下的上海地方行政主管。这就成为他的一大历史污点而为人们所“不齿”。

但我们必须承认，在上述两个问题上，我们过去的了解和认识都是过于简单化的，存在

着很大的片面性。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曾经讲述过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中国人不断向西方（包括日本）学习和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毛泽东对此是充分肯定的，称他们是“先进的人们”，“求进步的中国人”。丁文江就正是属于这一批“先进的人们”。他从1902年到1911年在日本和英国留学期间，不仅学习了近代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而且在政治思想和文化方面也吸取了不少近代西方的新观念和新思维。他和当时大多数的先进知识分子一样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忧国忧民的意识。

问题是，毛泽东在讲述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过程时，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列主义被传入中国之后就宣告终结了。似乎中国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历史任务已经最终完成，从此就不再有所寻求，也无需有所寻求了。但事实上，十月革命后马列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也只是被一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所接受。此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思潮在十月革命后的中国仍继续传播并被一些另类的知识分子接受。这正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思想文化多元化的一个重要特色。这些另类知识分子所接受和传播的其他思潮固然有其种种局限和不足，但也不能简单地一概予以否定，统统斥之为反动思潮，其接受和宣传者也不应一律视之为反动学者。这样简单地和片面地观察事物和评价一个人物，是不公正的，也是不足取的。

丁文江就正是属于那些另类的知识分子。他在马列主义传入中国之后并没有接受这一激进的革命思潮，而是继续信奉他久已形成的维新和改良的政治思想，并且不遗余力地宣扬自己的主张。正是基于这一原因，他在20年代初，面对着军阀派系势力的纷争及其政治统治的腐败与黑暗，积极提倡组织小团体，筹办小刊物，对现实政治进行研究和讨论。他联络当时北京大学的几位学界朋友，热切地动员他们说：“我们有职业而不靠政治吃饭的朋友应该组织一个小团体，研究政治，讨论政治，作为

公开批评政治或提倡政治革新的准备。”他的倡议得到了胡适等几位朋友的支持,不久他们就办起了一份名为《努力》的周报,并在思想文化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周报的第二期上,发表了一篇宣言式的文字:《我们的政治主张》。签名的共有16位,领衔的是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三位,而在最后签名的丁文江、胡适实际上则是这些主张的首倡人物。他们这些主张自然不是什么革命性的政治纲领,而是把改革现行政治结构及其运作方式作为首要的和最低限度的要求,即所谓建立一个“好政府”。这个被称为“好政府主义”的主张,过去曾经被我们嘲笑和批判过无数次,但其具体的内容,如“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官吏”,“要充分利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要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要建立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的用人”等等,我们过去都是不屑一顾或是完全彻底否定的。然而这样的批判与否定不能不说是过于简单化的。因为他们至少反映了人民大众的部分政治诉求。“好政府”总比“坏政府”更符合人们的愿望。这正如“清官”总比“贪官”好一些。如果认为“好政府”比“坏政府”更糟,那就和那种认为“清官”比“贪官”还要坏的荒谬逻辑如出一辙了。当然,丁文江和胡适等提倡的“好政府”主张在历史的实践中并没有行得通,而是完全失败了。因为专制的军阀们根本就听不进这些学者们的强烈呼声,但也不能因此而完全否定这些学者们的良苦用心和努力,把他们统统斥之为反动学者显然是有失偏颇的。

30年代初,中国社会仍处于矛盾重重、动乱不已的局面。内战烽烟不息,外患日益猖獗。“九一八”事变后,国内思想文化界又一度活跃起来,对国事表现了严重的关切。这时,丁文江再一次与胡适等朋友联手创办了《独立评论》这份比十年前的《努力》周报影响更大的刊物。这是一份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同人刊物,经费同《努力》周报一样,完全由大家捐助,所发表的文章是一律没有稿酬的。刊物第一期上发表的《引言》明确表示了编者的态

度与用心:“我们八九个朋友在这几个月之中,常常聚会讨论国家和社会的问题,有时候辩论很激烈,有时候议论居然颇一致。我们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各人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我们叫这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

丁文江无疑是《独立评论》最热心的编者和撰稿者之一。据胡适说,丁文江不仅是经常负编辑责任的人(另外三人是胡适、蒋廷黻、傅斯年),而且是最积极的撰稿人之一,在《独立评论》创刊后的三年多时间内,他就发表了各类文章64篇,其中论文21篇。这些文章的观点当然都未必正确;有一些还是错误的。但其关心国事的爱国主义出发点和忧国忧民的意识也是不能否定的。他在1933年访问苏联回国后所写的《苏俄旅行记》中,对苏联政府积极发展地质科学事业及其有效的组织管理工作就表示了充分肯定和热情赞扬,这正表明了他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精神和实事求是的不抱成见的政治态度。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如果把丁文江的积极创办《独立评论》以及他所发表的那些文章统看作是“资产阶级反动学者”的标志显然是不恰当的。

顺便说一下,丁文江所积极参与创办并在其中发表了大量文章的两种刊物《努力》周刊和《独立评论》,现在都已由岳麓书社重新影印出版。学术界认为这是“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继承做的大好事”。因为20世纪的中国文化传统,包括了“马列主义、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等不同的思想流派,它们的文化成果也都值得重视。

关于丁文江从政的那一段经历,过去人们只简单地把他出任淞沪督办公署总办看作是追随军阀孙传芳的不光彩的劣迹,而没有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丁文江对军阀的本质缺乏认识,对个别军阀人物曾抱有一些幻想,这是事实。但对此应作客观的具体分析:第一,孙传芳原是福建、浙江的军务督理,1925年江苏的

一些绅士因不满奉系在江苏（包括上海）的统治而求助于孙传芳出兵驱除奉系势力。当时一般人认为出身于北洋陆军学堂，又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过的直系孙传芳要比大多是土匪出身的奉系要好一些。丁文江对奉系一直表示憎恶，因而也支持孙传芳出兵江苏，并对孙治理江苏寄予希望，这正是丁文江“好政府主义”的一种愿望。第二，孙传芳打败奉系势力入主江苏后，也确实表示了某种礼贤下士的姿态。他在出任淞沪商埠督办时，接受了丁文江参与拟定的关于建立“大上海”的计划，并请丁担任督办的全权总办，也就是把上海的行政治理大权完全交由丁来行使。丁也正是为了实现建立“大上海”的计划而接受了孙的委任。他要运用自己的权力来实践自己的“好政府主义”。第三，丁文江上任之后，果然按计划实施，经过多方面的努力，终于把原来分散的零乱的所有租界以外地区的各种权力机构统一集中到督办公署的管辖之下，从而形成了从吴淞到龙华，从浦东到沪西的大上海的行政权力中心。这就为整个城市的市政统一建设以及为解决许多外交悬案，如越界筑路、越界收捐、收回会审公堂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他还通过艰难的交涉从外国人手中争回了许多重要权利，“连交出这些权利的外国人，反而能够真诚佩服他”（傅斯年语）。外国人办的《字林西报》后来也称赞他是“一个真实的爱国者”。

当然，丁文江的权力毕竟有限。他也只能在自己主管的行政事务范围内行使若干权力，而在军事、警务、司法等方面则基本上无权过问，自然也无能为力。因此当时的军阀统治在镇压群众运动、对付共产党和国民党（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的国民党）方面则完全体现了残酷的反

动本质。不过即使如此，丁文江也做过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事。例如由郭沫若领衔的“创造社”的门市部当时曾一度被查封，并被淞沪警备司令部抓走了几员干将。“创造社”的骨干人物潘汉年便通过郑振铎和高梦旦的关系恳请丁文江出面干预，终于使“创造社”门市部得以迅速恢复业务（被捕人员则通过互济会营救而被释放。）

总之，丁文江在从政七个月（1926年5月至当年12月）期间，虽然丝毫改变不了孙传芳统治上海的反动本质，但在他个人权力范围内还是做了不少好事的。虽然他的从政对孙传芳可能会起到一定的粉饰作用，但也可说是功大于过吧。后来丁文江坚决辞去总办一职，也正是因为孙传芳拒绝了丁文江和另外一位朋友劝说他同国民党的北伐军合作共同推动北伐事业，反而采取了与奉系军阀合作共同阻止北伐军前进的反动立场。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丁文江的从政与弃政并不是不讲任何原则的。从另一种角度看，他始终努力坚持着一种独立的精神和自由主义的思想。这也正是他作为一代学人的书生本色所在。

（责任编辑 程 度）

欢迎订阅
2001年

安徽老年报

四开四版
每旬两刊

全国统一刊号 CN34—0051 邮发代号：25—42

一版新闻、言论

二版卫生、保健

三版《枫林》副刊

四版中外文摘

《安徽老年报》，老年人都需要，增加知识，开阔眼界，欢迎老年人订阅，也欢迎为自己的老朋友赠订。

《安徽老年报》中青年人也需要，传统美德，尊老敬老，欢迎中青年为自己的长辈赠订，以献上你一份爱心。

全国各地邮局（所）均可订阅，邮发代号：25—42。

全年72期，定价21.60元，零售每份0.30元。

新兴工业国(地区) 转型期腐败的启示

□ 俞新天

对于发展中国家腐败现象的总体描述,已经在不少文章著述中论及。本文将注意力集中于那些在现代化过程中已经“起飞”的国家,或者为新兴工业国,或者与中国类似的人口大国如印度等。根据考察一些发展水平很低的国家,既有严重腐败的,也有腐败程度较低的;发展水平已接近发达程度的国家和地区,腐败都得到了相当的治理,如新加坡和香港。而正处于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国家,腐败都处于高发期,恰恰出于历史发展的观点,必须把腐败与现代化转型联系起来,甚至也可以将它作为衡量现代化转型的标尺之一。当现代化转型实现得比较顺利时,市场经济得到发展和规范,民主与法制会有长足进步,遏制腐败便有了根本保证。如果腐败仍很猖獗,哪怕经济发展程度相当高,在民主法制建设上必然仍有缺陷,现代化转型还不能算完成。

新兴工业国(地区)在现代化转型期腐败的特点,与西方国家同一时期的腐败特点大相径庭。这是因为它们现代化的时代条件截然不同,现代化所承受的内外压力不同,以及作为政治经济运行基础的社会文化有巨大差异。

第一,政府干预经济多,“寻租活动”正兴旺。

发展中国家在赢得政治独立和民族解放之

后,主要的任务是如何较快地改变经济上的贫穷落后,实现现代化的“赶超”。由于发展的起点很低,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一般比较软弱,只有政府的作用能够弥补此弱点。为了发动社会各个方面的变革,只有政府才能形成覆盖整个社会的权威,规划和规范空前规模的行为。政府从一开始就不仅作为经济活动的一般管理者,而且还作为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者、组织者和从事者,深入经济活动的内部,推动工业化的前进。政府对于经济生活实行如此广泛的干预,寻租活动便兴旺发达起来。所谓租金,是指由于政府的政策干预和行政管制抑制了竞争,扩大了供求差额,从而形成的差价收入。寻租活动又称寻找直接的非生产性利润活动,是指利用政府对经济生活的管理权直接为个人或小团体攫取物质财富或收入的活动。这种租金或直接的非生产性利润是政府干预的产物。寻租活动在本质上是非生产性的,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一种浪费。

寻租活动是发展中国家极普遍而富有特色的腐败现象,既可以采取合法的形式,也可以采取半合法或非法的形式。所谓合法的寻租活动是在不违反法律政策规定情况下进行的。它往往是由寻租者利用自身职权合法从被管理者那里收取的。例如: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以总统府

的文件形式，规定进口商每进口一箱鱼罐头必须付出 15 比索的回扣，从而将收贿合法化。凡是他经手办事，都要索取 10% 的回扣，因此被戏称为“10% 先生”。商人巨贾投其所好，事先通过各种门路塞进贿赂，然后偷税漏税，非法牟利，无人敢问。按照菲律宾法律，总统年薪为 57000 美元，即使 20 年没有任何消费，总计不过 120 万美元，而马科斯夫妇敛财的总数超过此数的一万倍！他们生活的骄奢淫逸，挥霍无度，远远超过了历代君主，在世界各国也极为罕见。

所谓半合法的寻租活动是钻现行法律或政策的空隙的寻租行为。在半统制半市场的条件下，政府所控制的各种资源、商品的服务，与市场所流通的资源、商品和服务之间存在着双重价格，前者远远低于后者，两种价格的差额往往成为寻租者的目标。而在政府垄断或严格控制某种资源、商品或服务的情况下，由于供求之间差额过大，往往驱使寻租者不惜违法而去追逐差价收入。例如，在促进经济高速发展时，政府对要扶植的产业给予信用贷款和外汇分配的支持，给某些企业发放许可证，产生了大量的半合法甚至非法的寻租活动。韩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最典型的，以至于人们将其称为“韩国总公司”。韩国不仅实行了多个五年计划，而且国有企业在 80 年代之前在肥料工业、钢铁工业和石油工业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为了获得财政补贴、低息贷款、进口配额等等，企业便大量使用贿赂手段。1961 年朴正熙上台时，带领了一批少壮派军人进入政界，大多数军人出身寒微，不仅有建国雄心，而且以清廉为号召。然而当 1979 年朴正熙遇刺身亡时，民众“打倒腐败贪官污吏”的呼声不绝于耳，继位的全斗焕不得不发起“社会净化运动”，撤换了一批涉嫌贪污的官吏，被国外戏称为“全都换”。1988 年全斗焕刚宣布“自动退位”，其胞弟全敬焕侵吞国家对“新村运动”的拨款和财界捐款约 100 亿韩元案爆发，紧接着其堂弟、内弟、外甥、妻子连同其本人的巨额贪污也被揭发。全斗焕夫妇被迫到百潭寺修行忏悔。虽然卢泰愚总统对全斗焕处理得留有余地，但卢泰愚于 1990 年收受韩宝集团

1300 万美金，为其颁发建造公寓许可证，1995 年东窗事发。卢泰愚与全斗焕于 1996 年双双被判死刑，后二审定为 17 年监禁和无期徒刑。韩国接连不断地发生高层腐败，固然与当权者个人品德有关，但更是经济体制的弊病所致。印度长期实行“混合经济”，政府对各种紧缺生产资源进行补贴，因此负责发放许可证、关税、税收的官员贪污腐化最为严重。由于企业的产品价格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企业家不是用降低成本的方法去提高效益，而是靠获得政府补贴获利，于是就转向行贿。这种现象只有在政府逐渐退出具体经济活动时才能抑止。在一些市场经济获得更自由发展的国家，寻租的腐败形式会大大减少。

第二，“强人”政治约束少，高层犯罪难监督。

目前进入新兴工业经济的国家（地区），几乎都有相当长时间的主张现代化的政治或军事强人上台执政。

政治或军事强人的出现，扭转了一般发展中国家政府软弱、混乱的颓势，经常采取激烈的措施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因为其政权的合法性必须通过突出的经济成就加以证明和巩固。然而，这也往往使强人大权独揽、不受监督，极易走上贪污腐败的邪路。印尼总统苏哈托靠枪杆子夺得政权，也依靠军人巩固政权。他在位三十年，不可否认对印尼的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他越来越变得滥用职权，贪污腐败，引得天怨人怒。苏哈托共有三子三女，组成了庞大的家庭经济王国。据媒体报道，苏哈托家族在国内 3200 家公司的持有股份，拥有的财产至少在 200 亿美元，还不包括其在国外的财产。

苏哈托家族聚敛财富非自今日始，问题出在没有可以监督纠正这种腐败现象的机制体制。

由强大政党推出的政治强人的情况略有不同，其中有举世闻名的廉洁之国新加坡的缔造者李光耀，也有严重腐败的高官。印度一般并不算作“新权威主义”国家，但是其政府集权程度比西方民主制度要严重得多，而印度国大党四

十余年执政,几乎由尼赫鲁家族一脉相承(尼赫鲁、英·甘地夫人和拉·甘地),又非常符合强大政党支持政治强人的模式。早在本世纪60年代,印度成立的预防贪污机构——桑特哈兰姆委员会的报告透露,按照保守的估计,由于腐败行为的侵蚀,国库损失了两个五年计划建设资金的5%。1991年担任总理的国大党主席拉奥,实行经济改革政策取得一定的成绩,但腐败丑闻缠身,据说在喀什迪·迈赫塔股市丑闻中收受1000万卢比“政治捐款”,与10万美元诈骗案有牵连,以及以金钱收买反对党议员等等,成为第一个在任期间接受法庭传唤的总理,终于在1996年被迫下台。腐败也成为使执政近50年的国大党一蹶不振的主要原因。

无论是政治强人还是军事强人统治,政治设计的基本宗旨有二,一是维护政治安定,二是保证经济发展。对于新兴国家,首先是建立国家权威,然后才能谈到限制权力;首先要积累政治资源,然后才能谈到分配权力。必须看到,在发展初期,百废待兴,反腐败排不上议事日程,甚至也未进入政治设计。随着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进展,这些国家也开始注意政治体制和反腐机制的建立。然而,政治制度化的发展和完善需要相当长的过程,权力制约的机器也许已经存在,但运转不灵,只能针对中下层官员,还不足以惩罚高官。民众的参与和监督需要不断地与限制作斗争,才能缓慢地扩大。大众传媒或被权势集团控制,或受到严厉审查,还不能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人治的痕迹还很深刻。这是腐败严重的政治原因。

第三,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惩治腐败阻力大。

在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先产生了比较发达的市民社会,资产阶级领导其他阶级阶层的人民奋起斗争,通过立法促进了现代国家的成长。发展中国家正相反,赢得民族独立在先,改造传统社会在后。传统观念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与现代国家的民主和法治格格不入,成为纵容姑息腐败滋生的思想温床。虽然国家从法律上确定了平等的权力,然而过去等级制的封建性的人际关系准则影响仍很深远,保护人——被保护人的结构或庇护型关系仍然很兴

盛。

在新兴国家中,庇护关系有各种形式,大约有三种类型,即亲缘关系(家族关系、宗族关系、教亲关系),人情关系(同乡、同学、同事、战友、上下级、朋友等),以及交易关系(互惠利用)。家族关系几乎是一切社会的基本组织关系,但在东亚尤为突出。韩国全斗焕的腐败涉及家族中至少7人,苏哈托家族腐败人人有份,连倡导廉政的金泳三也因包庇儿子的腐败而下台。

不论哪种庇护关系,都并不证明某种文化特别具有腐败性,而是证明这些国家的文化还处于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之中,人民的心理还处于从“臣民”向公民的转变之中。这使得腐败容易滋生,老百姓虽然从内心深处痛恨腐败,但对待反腐败却态度冷漠,孰视无睹,客观上纵容姑息。虽然国家颁布了法律,但建立法治社会极其艰难,司法腐败相当严重。人们的传统观念还很顽强,转型期人们对于物质生活的期望又大大提高了,腐败便在社会上蔓延。在许多新兴工业国,不仅高层腐败的比例高,而且基层腐败形成风气。高层腐败为害巨大,但一般民众不易察觉,基层腐败却因为量面广,直接天天与群众见面,最使百姓痛恨。官僚、工程技术人员、警察、教师、医生,一面向官员行贿,一面向老百姓索贿。基层腐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低级公职人员的待遇太差,难以维护体面的生活。在印尼,高级将领的工资不过40万盾,仅为香港菲佣收入的十分之一。因此军队到处经商。大多数军人不善经营,所以都与华人富商合资,出现了大量的腐败。在印尼、菲律宾、泰国,腐败都被民意测验列于问题的前茅,可见这一现象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新兴国家的腐败为害极大,从根本上损害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首先,新兴国家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发展,尽快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迅速改善人民的生活。但是,腐败分子化公为私,将公共财富流入私人腰包,使国家损失惊人,无法将这些资金用于投资和扩大再生产。1982年在继任的就职演说中,墨西哥总统乔斯·洛佩斯·波蒂罗大力抨击腐败,揭露了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墨西哥人依靠不法行为所攫取的国家财

产数量,要比帝国主义在其整个历史上剥夺的总和还要多!在菲律宾,据有关专家估计,40%的国民生产总值被政府各级官员贪污掉。各级官员由于接受回扣,在政府工程中或采购物资中坑害国家,大大增加了政府开支,往往还购进劣质设备。对泰国、印尼、印度等国的情况研究表明,采购中的腐败使政府要多支付20—100%的费用。同时,企业的注意力集中在行贿官员,买得许可证等各种优惠,而非提高生产效率,而且降低了整个社会资源利用的经济效益。韩国政府扶植的特大企业集团,印尼和马来西亚政府对于马来人企业的“扶强”战略,背后都有大量的腐败交易,促成了官商勾结、金权政治的现象,使腐败的规模越来越大,性质越来越恶劣。尤其当发展中国家处于起飞阶段,资金显得格外宝贵时,人民的血汗积累却被贪污腐败的黑洞吸走,造成资金的短缺。外国投资援助也是官员贪污的对象。贪得无厌的官员对外国投资也使用寻租、设租、索租的恶劣手段,影响了外资的投入。

其次,腐败危及政治稳定,造成政局动荡,延误现代化转型,甚至造成现代化的断裂,教训多多。现代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民众的支持。如果公职人员以权谋私,就使政府的合法性受到损害;如果腐败成为政府的特征,那么政府被人民抛弃也就为期不远了。新兴工业经济的建成意味着相当多的人提高了生活水平,例如韩国的城乡差别大大缩小,印尼和马来西亚的绝对贫困人口比例下降,印度从经常灾荒饿死千百万人到解决九亿人口的吃饭问题,都是不容抹煞的成就。但是,应当承认,在社会转型期收入差距一般要拉大。社会不公平在某些新兴国家还相当严重,人们的心理不平衡程度加强,改善生活的期望值与现实可能性之间有相当距离,承受差距的能力还比较脆弱。在这种情况下,腐化的官员却搜刮民脂民膏,骄奢淫逸,花天酒地,必然激发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和反对情绪,成为政治动荡的导火索。1980年韩国学生和民众示威游行,反对腐败,要求民主是主要口号,暴动蔓延几个省,结果发生了光州事件,死伤几千人,其后遗症至今犹存。

腐败的急剧增生是民主与法治薄弱的结果,而严重的腐败又会阻碍民主与法治的推进。为了压制人民对腐败泛滥的不满,政治家往往采用限制公民自由甚至镇压的手段,它与法治的精神背道而驰。腐败的官员形成了既得利益者和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关心的只是如何维护和扩大自己的特权,满足日益膨胀的私欲,决不肯去发动真正有益于国家、社会和人民的改革。如果阻挡不住改革,他们也会歪曲改革的内容,从中钻出寻租设租的通道,攫取改革所带来的利益果实。腐败的政治家和官员维护的只是一己或狐群狗党的私利,怎么能指望他们把公众利益置于私人利益之上,为了国家的繁荣而损害自己的私利?苏哈托、全斗焕既是盗窃国库者又是集权主义者,便是鲜明的实例。而在一个容忍腐败的环境中,洁身自好极其困难,好人也会在天长日久的耳濡目染中最终同流合污。

最后,腐败将助成“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局面,从根本上瓦解民众对于现代化的信心,造成普遍的沮丧和消沉情绪,使国家丧失最宝贵的人心资源。现代化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天翻地覆的社会变化,必须动员千百万人参与。假如现代化没有提供机会的平等,没有让民众看到勤劳致富的前途,他们就没有积极性。腐败盛行使得个人发展的余地被堵塞,只有占据权位者,只有有能力搞歪门邪道,才能上升,普通百姓则毫无希望。腐败者窃取、浪费和挥霍人民的血汗钱,并没有创造出社会财富。经济增长也许是明显的,但社会的发展却极其缓慢,甚至停滞不前。在腐败盛行的地方,必定会发现大多数平民百姓的冷漠和意气沮丧。如果现代化不能提供公平与效率的更好结合,人们会从根本上质疑社会改革与现代化的转型,现代化就难以获胜。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新兴工业国(地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而自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也暴露了其发展模式的深层阴暗面,腐败即为其中之一。各国政治家和人民都在思考,如何进一步推动现代化的转型,在经济升级的同时加快民主与法制的建设,遏制腐败的恶性增长。人们不仅在学习和借鉴西方发

(下接62页)

历史上的忧患意识

□ 张岂之

“忧患”意识是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特色之一，内容丰富，影响深远。关于古代“忧患”意识，已有不少学人作过研究，现在有条件对此进行归纳。同时在某些观点上加以深化，例如关于“忧患”意识的历史分析，就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

道德情操的表述

我们打开先秦、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典籍，可以看到，当时“百家争鸣”中的各个学派几乎都有它们自己的忧、乐观。例如孔子这样表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学而》）不注重道德品质的提高，不切磋学问，不按道义的原则去行动，有了过错不能及时改正——这些就是他目睹春秋末期现实状况而产生的忧虑。

与“忧”相对的是“乐”。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经常看到并且宣扬别人的长处和优点，结交有高尚品格的朋友，踏踏实实地培育自己的德行——这三种就是对人有快乐呀。

孔子的“忧”与“乐”主要指“君子”体现在学业和品行上的高尚情操。他夸赞自己的学生颜回：颜回身居陋巷，生活艰苦，在“人不堪其忧”的状况下能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实

在是贤明的君子！孔子说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学而》）。这些论述发人深省，它们奠定了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理论基础。孔子为人的思想感情提出了道德标准，而情感与道德的结合就称之为高尚的情操。对于人的道德情操的重视，正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显著特点之一。

“忧患”—— 人生价值观的核心

战国中期，儒家思想发展到孟子的时候，“忧”与“乐”逐渐具有了理论形态，成为儒家人生哲学的主要内容。它超越了个人道德情操的范围，带有理论的抽象性和普遍性。因此，所谓“忧患”意识便成为人生价值观的简洁表述。

孟子从历史中举出若干有成就的人，说明他们都是从忧患和痛苦中磨练出来的。比如，舜出身于农家，后来成为一国之君；胶鬲这个人遭遇战乱，以贩卖鱼盐为生，后来周文王提拔了他，为周朝做出了很大贡献；孙叔敖隐居在海滨，楚庄王推举他做令尹，有很大的政绩。这些事例说明，对于人来说，如果没有“忧患”的磨练，没有失败教训的反思，要培养出刚强意志、奋发精神，那是不可能的。孟子将这些道理提到人生哲学的高度加以总结，写出了自古以来中国人都熟知的一句名言：“生于忧患而死于安

乐”(《孟子·告子·下》),忧患足以使人生存发展,安乐足以使人沉沦死亡。这是多么深刻的人生哲理!

在孟子看来,仅仅懂得“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道理是不够的。有大志的人应当在此人生哲学的指导下勇于实践,勇于开拓,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为此,孟子说了一段很有教育意义的话,其大意是:一个人要挑起重担,他的身体和思想都要经受长期的锻炼,饥饿、困乏经常袭来,思想矛盾经常发生,不如意的事经常遇到。这样,只有这样,才能坚定他的意志,提高他的能力,使他更加冷静、成熟……(参看《孟子·告子·下》)

在孟子看来,人们在“忧患”中磨炼,最重要的是,培育一种基于高尚理想和志向的精神。他称之为“浩然之气”或“正气”。这不是天生的,要靠后天的培育。“正气”的长期积累,才能使人实现自身的价值,并逐渐达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高度。可以看出,孟子关于人生价值观的论述,以“忧患”意识作为起跑点,而“大丈夫”则是力争达到的目标,由此构成了严密的人生哲学体系,在历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忧患意识 与古代哲学辩证观

“忧患”意识作为中国优秀的文化思想遗产,并不是哪一位先哲从他的头脑中猜想出来的,而是深深地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其中便含有哲学理论思维的重要内容。

我国古代哲学辩证观有很高的成就,春秋战国时期许多学派在此领域内都有独特的贡献。例如,道家学派的创始者老子,在《老子》一书中关于事物相反相成的道理作了各方面的论述。他的重要哲学命题是:“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第40章)。“反”即向相反的方面变化。当事物发展到顶点,它不可避免地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而转化到相反的方面以后,还要再向相反的方向转化,以便回到原初的状态。因此,老子所说的“反”含有对立转化和返本复初的两种

含义。老子认为“反”才是事物变化的总规律,人们几乎是无法加以抗拒的。因此,“物极必反”成为中国古代人们熟知的名言。

还要提出,古代杰出的兵书《孙子兵法》,其价值并不限于军事,它实际上也是一部讲哲学辩证观的著作。在《孙子兵法》看来,人在“物极必反”的规律面前,并不是无能为力的。在军事斗争领域,人们——优秀的军事指挥家们可以认识并利用事物的辩证规律,制定符合实际所说的战略战术,从而指挥并取得战争的胜利,由此显示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

中国古代儒家学派称辩证观为“有对”之学,“万物莫不有对”。《易传》一书系统地从自然到社会论述了“有对”之学的许多方面。例如强调“变革”的重要性,即人们顺应事物的变化趋势,自觉地进行变革。《易传》的名言:“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革命”一词即出自这里,认为商汤灭夏、武王灭商,这些都是顺应历史潮流的革命。还有一点,《易传》提醒人们,“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当政者应当居安思危,不可以因表面无事而沉迷安和;只有保持头脑的清醒,谦虚谨慎,扎扎实实地做事,这样才能长治久安。

很明显,中国历史文化的“忧患”意识,是古代朴素辩证观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的表现。换言之,古代的“安危”观念实际是“忧患”意识的另一种表述,其意义是相通的,受到忧国忧民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们的重视。有了辩证观,才有“忧患”意识;中国历史上“忧患”意识影响之深远,由于它不是个人一时的感言,也不是政事上的临时措施,而是根植于辩证观的政治哲学,由此才有了强大的生命力。

忧国、忧天下的 社会责任感

秦统一六国,建立了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从这个时候起,“忧患”意识逐渐成为古代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就是说,人们的“忧患”总是与国家的兴衰治乱联系在一起。西汉时期,从更大范

围而立论的“国格”观念应运而生。人们将“国格”作为衡量人的品德、操行、功业、学问的标准。例如史学家司马迁将“国”摆在首位,称赞“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的观点。

西汉初期的贾谊是一个思想敏锐、敢讲真话、有强烈责任感的政论家。他心系国运,给汉文帝上书,即著名的《治安策疏》,时当西汉立国20多年,政权日趋稳定,经济有所恢复发展。然而,贾谊却根据他自己的观察和研究,在上书中忧心忡忡地指出,“进言者皆谓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认为当时的“事势”不容乐观,有“可为痛哭”、“可为流涕”、“可为长太息”之处并不少。他也正面地提出了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像贾谊这种警世危言正是责任感的表现,并不是无病呻吟,也不是悲观绝望。

到了宋代,“忧患”直指“天下”。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学者范仲淹在所写名文《岳阳楼记》中,将此前的“忧患”意识提到了一个新高度。岳阳楼初建于唐代,宋仁宗时重修。范仲淹应友人之邀,曾访问岳州(今湖南岳阳市)岳阳楼。这篇名文首叙登楼俯视洞庭湖的景观,接着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览物之情,得无异乎?”意思是说,人们欣赏景物的感触,会不会因环境的变迁而改变呢?在霪雨霏霏的日子里登楼观景,使人产生“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的心情,可是在春和景明之际登楼,又会使人“心旷神怡,宠辱皆忘”……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结尾: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矣。……”

一个人怎样才能不因环境变迁而改变自己的志向?不因个人得失而转移自己的感情?这必须要有坚定的信念。这个信念可以这样表述:在朝廷做官,要心系黎民百姓;不在朝廷做官,要有对国家的忧患情怀。当天下人都有了快乐幸福,这个时候才有个人的欢乐愉快。这是多么宽广的胸怀,多么崇高的感情!宋代文学家欧阳修

为范仲淹写的碑铭中,称赞范氏少年时就有大志,不论他身处何种环境,也不论别人对他如何评论,都不能动摇他的志向。他始终心怀天下,以“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勉自励。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境界才是古代“忧患”意识的真谛所在。

忧患意识与改革要求

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有些有远见的思想家们在抒发其“忧患”情怀时,视野更加开阔,并提出了社会改革的迫切要求。

例如,历经明末清初巨变的思想家黄宗羲,于清康熙二年(1667年)写出了划时代的著作《明夷待访录》,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深刻剖析。他假托三代(夏、商、周)为黄金时代,说这时“以天下为主,君为客”。三代以下情况大变,“以君为主,天下为客”。由于主客颠倒,君主视天下为己物,独占天下之利,形成黑暗政治。黄宗羲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明夷待访录·原君》)。他提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同上《原臣》)他将个人的忧乐归结为众人的忧乐。他又说,臣之出仕,“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同上)。“天下”这是具有深刻内涵的名词,与一家一姓的统治是不同的。黄宗羲的挚友顾炎武同样强调“保天下”,他说:“……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日知录》卷13“正始”条)。顾炎武于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给黄宗羲的信中说:“……大著《明夷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古之君子所以著书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亭林佚文辑存》)“忧患”意识促使他们将希望寄托于未来。

如果说时当17世纪的明末清初是“天崩地解”的时代(黄宗羲语),19世纪的中国“外患频仍”,那么其间还有18世纪;这个时候是世界资本主义在西方迅速发展的百年,也是中国清朝统治相对稳定的时期。其时,中国思想文化悄然地发生着变化。一方面,具有开拓精神的学人们

结束语

以上我对历史上(主要是古代历史)的忧患意识作了一些描述。由此可以看出,忧患意识之所以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优秀遗产,它并不是悲观主义和厌世主义,而是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其精神是积极有为的;有时甚至带有警世危言的形式,不同于一般世俗的看法,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这种忧患意识提醒人们: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应当保持头脑的清醒,居安思危,不骄不躁,使正义的事业立于不败之地。从这个主流来看,历史上的忧患意识(或称之为警世危言)仍然值得人们借鉴和研究。

(责任编辑 洛松)

对以往的人文学术进行总结(当时只能在这个范围内探索),另一方面他们试着为学术的发展踩出一条新路。他们一般不直接抒发“忧患”意识,只是全神贯注地在学术领域内爬梳。到19世纪中叶,这种情况有了很大变化。由于外国侵略的猖獗,中国具有良知的人们关注国家兴衰存亡的“忧患”意识又重新成为历史的强音。生活于19世纪前半叶的思想家龚自珍,他的诗文洋溢着浓重的“忧患”气息,他的名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便成为对于新时代的憧憬和召唤。

20世纪初,古代忧患意识成为民主革命先驱者反对外国侵略和期望改变国体的一种思想资料。先驱者们的忧国忧民情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和古代“忧患”意识一脉相承,同时也增加了时代需要的新内容。

(上接 58 页)

达国家的经验,也将眼光转向反腐倡廉成绩优秀的发展中国家,它们的经验教训更加切近实用。新加坡堪称世界反腐模范,但这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几十年坚持不懈努力的结果。新加坡也曾经有过腐败成为生活方式的年代,但是政府作出了庄严的承诺,一定要把国家建成繁荣“清洁”之地。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整治腐败。一、高薪养廉,注重效率。行政机构官员的薪金待遇,跟上私人企业最优越的条件。与此同时,政府以效率为中心,奖勤罚懒,奖廉罚贪。二、严刑峻法,执法如山。政府通过法律建立公平的环境,不容任何人超然法外。前教育部长周瑞麒 70 万新元的贪污案、前环境发展部长黄循文四项贪污罪以及前驻日大使黄望青的逃税案,不但受到查处,而且在大众媒介广泛宣传。反腐机构不仅查官,也查私人企业,行贿受贿一起罚,毫不手软。三、专设机构,直属总理。新加坡设立了反贪调查局,直属总理公署,免受其他方面的干扰,具有反腐调查实权。老百姓相信政府的承诺,给予反贪机构以极大支持。四、清理社会,提倡道德。新加坡对于社

会腐败也决不留情,报纸广告部门给广告公司回扣,记者给消防局几十元钱好获得独家新闻,家庭主妇过年时塞给垃圾工人或邮差的赏钱,都违反政府的规定而要受罚。这些限制使全社会对腐败现象防微杜渐。政府提倡的道德观、价值观已被广大民众所接受。在1998年国际透明组织颁布的贪污印象指数排名中,新加坡排入10名最廉洁国家。新加坡的例子说明,发展中国家完全有可能遏制腐败,只要政府紧抓不舍,持之以恒。其他发展中国家尽管反贪成绩不如新加坡,但在某一时期,某一部门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值得进一步总结推广,同时也须研究为何这些成果不能巩固下来的教训,以便再接再厉地向腐败作斗争。

新兴工业国(地区)要通过现代化转型,走近发达的门槛。它们的实践并未结束,而是处于进行之中,有待进一步观察。但可以断定,哪个国家能够在繁荣清廉方面成绩越佳,便越能尽快地跨过这道门槛,走向现代化的更高阶段。

(原载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所编《激浊扬清》,致中节编)

敦煌学研究在中国

□ 孟宪实

1900年，6月22日，敦煌莫高窟的王道士在洞窟中清理积沙，发现墙上还有沙子在向下滑，他满心狐疑地敲了一下那面墙，竟然有空洞的声音传出。沿着墙的缝隙，他挖开那道墙壁。原来是别有洞天。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敦煌藏经洞。纸写经卷堆积如山而且排列整齐。王道士惊呆了。

所谓经卷，主要是指佛教经典。洞藏除了大量的佛经以外，还有很多种其他类型的文书。有印刷术发明以前的手写文书，也有印刷品。这些文书的时间跨度从五世纪到十一世纪，用汉文、藏文、回鹘文、于阗文、吐火罗文、波斯文等多种文字书写的经卷、典籍、方志、信札、契约、户籍、帐簿、变文、曲子词等。可是后来，藏经洞的主要藏品却没有留在中国。当“敦煌学”在世界引起重视的时候，外国人有一种说法：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

海外学者对敦煌宝藏的掠夺

王道士发现藏经洞两年后，汪宗瀚出任敦煌县县令。这位谙熟历史文化的县令以及同年任甘肃学政叶昌炽，他们对藏经洞里的经卷都很有兴趣，特别是叶昌炽对于这些经卷的意义看得很清楚，但他们都没有亲身到过藏经洞，所以在外国人到达敦煌之前，中国有七年的时间

可以妥善保护藏经洞中的珍品，但是中国与自己的国宝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流失。

在中国昏睡不醒的时节，西方学者们却睁大眼睛在中国各地搜寻文化财宝。藏经洞首先成全了英国的斯坦因。1907年5月21日，斯坦因怀着一颗渴望已久的心来到了莫高窟，采用预先想好的各种词语，骗取了王道士的信任，带走了大批的经卷。

1908年2月26日，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来到了这里。在以后的三个星期中，伯希和凭借着昏暗的烛光，以每天一千卷的速度，翻检着每一件写本。伯希和在翻检过程中，顺手将它们分成两堆，一堆是最有价值、必须想方设法据为己有的，另一堆是需要但不是最重要的。他的挑选准则，实在是精明透顶的。随行的摄影师努埃特为伯希和翻检写本时拍了照，记下了伯希和在藏经洞里的情景。在我们看到了伯希和的专心致志用功的同时，全世界的人们也得到了第一现场的证据。

伯希和也像斯坦因一样想“买”走全部藏品，然而政府指令在先，且香客不断，王道士拒绝。最后，伯希和送500两银子给王道士作功德，便将他从藏经洞挑选的写本精华和斯坦因所遗绢纸绘画及丝织品全部带走。

1914年5月20日，俄国的奥登堡开始了规模浩大的远征，这次的目标正是敦煌莫高窟。他批评英国的斯坦因、德国的勒柯克的考古工作，

认为他们只是盗宝而不是科学考古。后来的结果证明,奥登堡将藏经洞彻底挖了一遍,真的做到了掘地三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奥登堡听到中国参战的消息,结束考察,于1915年1月26日启程,赶着满载文物的驼队回返。

奥登堡此次所得劫掠品,回到彼得堡之后被分放多处。写卷部分,移交亚洲博物馆(今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保藏,也即该所的“敦煌特藏”;艺术品、地形测绘资料和民族学资料、野外考察记录和日记存放在俄罗斯艺术博物馆、民族学博物馆、地理学会等各博物馆。后来几经搬迁,最后全部集中到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即冬宫博物馆。多年以来,既没有出版过任何完整的藏品原件,连完整的目录汇编都不曾有过,对艺术品而言,尤其如此。今天,我们知道文献部分有:写卷18000余号,其中包括完整的经卷365件以及一些尺寸不大的写卷残片;文物部分有:雕塑(含附件)43号,壁画16号,绢画9号,麻布画、幡画78号,工艺品36号,纸画24号,残片49号。因为缀合、或者总号下包括多个残片,总数约300件。

1923年初冬,美国福格考察队出现在寒风凛冽的河西走廊上。为首的华尔纳到达敦煌时,王道士外出。华尔纳直接就进入了石窟,精美绝伦的壁画,立刻使他呆若木鸡。一连10天,他用带着分离壁画的化学溶液,剥下了12幅壁画。不过幸运的是,带到美国的12幅壁画,挽救出了11幅。直到这时,华尔纳才喜形如色地说道:“(这些壁画)是极可宝贵的珍品。在美国我们还从未见过能与之相比的东西。同时它们与德国人从新疆的墙壁上锯下来的成了方形的壁画相比,也可能会引起他们的忌妒。”

外国学者对敦煌宝藏的掠夺,使这些宝藏现今分布在10多个国家的地区。

在世界各国学者对此进行研究的时候,中国学者也开始了研究历程。

敦煌宝藏在中国的命运

中国人知道这些宝藏的价值,是因为端

方。端方,是第一个见到了伯希和所劫遗书的一部分的人,他作为满族要员,又属于晚清的立宪派。政治上既干练而又不无开明倾向。善诗文,好金石书画,是著名的古董收藏家。

端方一见伯希和手中的中国文物,让他敬畏异常、战战兢兢。后来,伯希和在回到巴黎后的演说中提到端方,“颇殷勤,屡次接见余,礼有加焉。”敦煌出土的文献,端方认为关系到考据学的生死。考据学,在当时就是中国学问的另一个名字。端方深深懂得,多少代学人的辛勤工作,关于中国历史的很多证明,现在由于藏经洞的发现,有可能完全丧失意义。中国人的历史记忆,正面临着严重的考验,也许会被彻底推翻,也许被冲击得凌乱不堪。而这样的证据,如今就握在眼前这个洋人手中。事关中国学问的生死,端方的官僚身份烟消云散,学者的性质显露无遗。他对伯希和十分礼貌,不断地招待这个法国人,动机也许是极其简单的,无非是想从伯希和那里多得到一些关于中国文物的消息。但是,除了拍摄了《沙州志》残卷以外,端方从伯希和那里并没有得到更多的资料。

伯希和到达北京是在这一年的8月,北京学术界正在以一种复杂而平静的心情等待他的到来。知道伯希和敦煌得宝,是由端方告诉北京学术界的。伯希和住的北京胡同,一时间那里成了北京的一道学术风景线。中国敦煌学的第一批代表性人物几乎每天穿梭往来这条胡同。董康、罗振玉、王国维、王仁俊、蒋黼(斧)、叶恭绰等,或抄录或观看,忙个不停。中国敦煌学研究的起步,实际上就是从这几天开始的。

罗振玉曾用可悲、可恨、可喜、可愁表达当时的心情,是十分典型的。

面对中国宝物的流失,中国学者百感交集。而志得意满的伯希和,也是感慨良多。伯希和说“诸君有端制军(端方)之风,以德报怨”。伯希和的内心深处,对中国是有愧疚感的,他当然知道这些文物是属于中国的,但是当中国学者了解了事实的真相以后,没有人对伯希和加以指责,甚至没人对他提出质疑,即使背后有许多怨言,但都是对中国的当地官员的。他们努力的是对发现的文物进行抄写和研究。当时的中国

学者实际上还没有文物所属概念，不懂得保护文物所有权的意义。但是，这在伯希和的眼里，成了中国学者的良好教养的表现，伯希和称赞这是以德报怨，他确实是被感动了。应该承认，这事实上成了以后伯希和与中国学界保持几十年友谊的一个重要基础。

当罗振玉又痛又恨地在伯希和寓所抄着敦煌写经时，伯希和告诉罗氏，敦煌石室尚留存有以佛经为主的八千轴写卷，如不早日购运北京，将会被人攫取散尽无疑。罗振玉听后却是又惊又喜，立即报告学部左丞乔茂楠，请火速发电给陕甘总督毛庆蕃，让他购买回学部。并拟好电文，先购买再说。

发出电文一个月后，京师大学堂和学部同时收到了同样内容的回电，说已经购得八千卷，总价三千元。开始时，学部以为必定花费昂贵，没想到竟只要三千元。于是留在学部的京师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前身），京师大学堂也就不再惊动了。

藏经洞在它发现以后的第九年，中国终于完全接管了。这些藏品虽然是斯坦因、伯希和剩下的，但毕竟还有八千多件，数量还是可观的。把这些珍贵文物运到北京也是合适的，不但有利于保管，也有利于研究。这些文书有情，也应该是满意的。但是，谁也不会想到，从敦煌到北京，竟是怎样的一个苦难旅程。

在王道士管理藏经洞的时候，藏品的流出都是在秘密的状态下发生的，只有极少数人了解一些情况。现在，北京的命令和兰州的执行，使得藏经洞有宝藏成了公众新闻，无人不知敦煌卷子价值连城。于是，一场以获得藏经洞藏品为目标的游击战广泛展开。从敦煌到北京，变成了一条掠夺敦煌藏经的战场。

根据后来的调查，先后有 696 件敦煌藏品从这些地方的名士、官宦、乡绅手中获得，这当然不包括已经到手但没有透露风声的部分。对敦煌卷子有兴趣有盗窃机会的人都是当地的上层人士。因为敦煌卷子一时成为抢手货物，所以敦煌为官者乃至甘肃的为官者，甚而至于行伍出身的军人，也无不以得到敦煌写经为快慰。实际上，多少人参与这一路的盗窃，有多少经卷流

失，如今已经成了永远不能揭开之谜，只是后来露出的冰山一角，令人推测那一路的惊人盗窃。

到达北京的敦煌经卷实际上又开始了新一轮劫难。

是学部侍郎宝熙发现了学部的敦煌经卷有问题，于是他写了上告奏折，负责押送经卷的押解员傅丰韦被扣留，不许返回甘肃。现在所知情况仍然有限，但后来有人出面替傅丰韦说情，使我们有了一些线索。也许是说情起了作用，也许是辛亥革命爆发的缘故，这件案件最后不了了之。这是一种通行的说法。

一些年过去之后，这个案件的真相才渐渐露出水面。

当甘肃解送入京的敦煌残卷抵达北京后，载经大车不是押进学部大院，而是进了何彦升之子何震彝的宅第。何震彝叫来其岳父藏书大家李盛铎以及李的亲家刘廷琛、方尔谦等，进行了一次认真的挑选，选出的精品收入自家书



敦煌马战壁画

房。当初陕甘总督在接到北京的指示以后,曾经把一箱藏经送往北京,作为样品,同时附上了一个大致的清单,这个清单中没有详细的目录,只有一个大概的总数。北京学部只掌握经卷的总数量,而没有经卷的具体名称及行款字数,因而这些人在取走一些精品后,将一卷撕成二份、三份,以符合上报清册的数量。

敦煌国宝流失,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指责外国的所谓探险家,他们实际上使用的各种办法获取中国的这笔精神财富,不合法的手段显然是存在的。但是,我们在中国内部的严重盗窃行径中,看到了中国之所以饱受欺凌的原因。如果说甘肃的地方士绅国家观念单薄,自私心太重的话,那么如何评价何彦升、何震彝、李盛铎、刘廷琛、方尔谦等人呢?他们不是一般民众,他们是政府要人,学界名流,属于中国当时的统治阶层。鲁迅先生在讨论中国图书的灾难时指出,中国人对于图书的态度,内行就是偷,外行就是烧。国人如此,在我们理直气壮指责外国探险家的时候,声音不得不有所降低。

中国学者对“敦煌学”研究的贡献

作家刘半农法国埋首抄经卷

一首情动国人的《叫我如何不想她》,几乎家喻户晓,而作者刘半农与敦煌学的关系则鲜为人知。

1920年初,刘半农在上海登上了赴欧留学的远洋海轮。第一年在伦敦,1921年夏,刘半农转赴法国,入巴黎大学语音学院,兼在法兰西学院听课。苦读数年,终于撰成《汉语

字声实验录》。然而,即使再忙,刘半农也没有忘记敦煌宝藏。抄录敦煌文献,是刘半农的主要副业,多少个日夜就是在埋头抄写中度过的。

1925年夏,返北京大学任国文系教授,兼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同年,他将所抄文献辑印为《敦煌掇瑣》三册,作为中央研究院语言历史所专刊之二,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丛书之一刊行。北大校长蔡元培特为之作序。三册分别是民间文学、社会资料和语言文学。此书开辟了敦煌研究的新领域,社会世俗文书的研究从此受到重视。

胡适

紧接在刘半农之后来到伦敦和巴黎,不远万里前去查阅敦煌经卷的,是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胡适。

1926年,中英庚款委员会会议在英国召开。为了参加这次会议,胡适来到了欧洲。同时为了调查敦煌经卷,他准备好专门资料,前去查阅敦煌经卷。比起刘半农来,胡适的调查更具有专门性,因为当时他正在研究中国禅学史,而关于神会,他不能相信传世资料,因为宋以后人改造的痕迹太明显,所以必须到唐朝的原始资料中去寻找,敦煌文书成了唯一的希望。

在伦敦,胡适两度在大英博物馆查阅了近100卷敦煌写本,收获很是满意。确确实实地证据被他找到了。根据从伦敦和巴黎藏敦煌写卷中找到的数种神会著作及其他禅宗典籍,1930年在上海出版的《荷泽大师神会遗集》,是中国禅宗史研究划时代的著作,影响很大。

从1926年深秋第一次从敦煌遗书中发现神会的著作,到1962年早春去世,胡适与禅宗史交往了几十年,因而也与敦煌遗书交往了几十年。



敦煌壁画散乐百戏顶竿图

陈垣与陈寅恪

在学者前往西方寻找敦煌文献的同时，对于保存在国内的敦煌文献的整理研究也积极开展起来。1922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兼京师图书馆馆长的陈垣，以《敦煌石室经卷总目》为基础，将馆藏敦煌遗书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检阅考订。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的推动下，陈垣又将以前的初稿加以修订，删其复出，补其漏载，正其误考，于1931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行，命名为《敦煌劫余录》，列为史语所的专刊第四种。

在《敦煌劫余录》一书前，有陈垣和陈寅恪的序各一篇。“劫余”二字，取其历劫仅存之意。陈垣在序中直陈：“匈奴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继至敦煌，载遗书遗器而西”，有人劝他不要直接提名，陈垣答道：“用劫余二字，尚未足说明我们愤慨之思，怎能更改！”

与陈垣序言的激情相比，陈寅恪的序言则更多理性。“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陈寅恪强调的重点是国人应该在研究上预流，“庶几内可以不负此历劫仅存之国宝，外有以襄进世界之学术于将来。”相对于激情呐喊式的爱国主义，学术研究毕竟更艰苦，但也更具持久的影响力。而陈寅恪的序言实际上是指明了中国敦煌学发展的方向。

陈垣的敦煌学研究以目录学和宗教史最具代表性。解放后长期担任北师大校长。陈寅恪的研究领域涉及太广，不能一言概括。解放后一直在中山大学工作，长期接受统战待遇，1969年在“文革”迫害狂潮中去世。

巴黎的王重民

1934年9月27日，王重民到达巴黎。壮丽的凯旋门、雄伟的艾菲尔铁塔、还有那塞纳河的柔美，都丧失了吸引力，他的心中只有敦煌遗书和其它流失的古籍上了。此后，王重民在巴黎工作了整整5年。他偶尔也曾暂时离开巴黎，前往伦敦、柏林和罗马，都是为了查阅敦煌文献。敦煌遗书之外，他还探访并拍摄了明清之际天主

教士的汉文著作、太平天国史料和古刻旧抄罕见的中国传世书籍。

王重民在巴黎，主要是编写伯希和目录，其他时间是抄录、著录敦煌卷子。5年中他拍摄了三万多张敦煌遗书和其它古籍的微缩照片，而经他所拍之书，都是先行翻阅，摘录题跋，叙其梗概以为叙录。他的代表作《敦煌古籍叙录》，就是这样产生的。对于中国人而言，别说这些经卷不能收为国有，就是连看的机会也并不多，看时一次只能看几卷，拍照要交钱等等。王重民知道机会难得，使命重大。一边抄录，王重民一边把有关敦煌遗书的新材料和自己的研究心得寄回国内，迅速地在《大公报》、《北平图书馆馆刊》、《图书季刊》、《东方杂志》等报刊上发表，以推动国内的敦煌学研究。作为一名学者，王重民知道整个中国文化的压力正集中在他一人的肩上，他知道他此行巴黎的意义。中国已经错过太多的机会，他不愿意因为自己的不努力导致中国文化再蒙损害。

王重民回国的时候，没有受到英雄凯旋的欢迎，但他确实是凯旋而归的。建国以后，与所有的中国人一样，王重民兴高采烈。当然，他还是没有逃过中国特色的政治运动。作为右派，他甚至奇迹般地熬过了五六十年代。1975年4月16日，这位中国敦煌学的代表人物，北大图书馆系主任，在他批判会的第二天夜里，来到颐和园，在王国维投水的地方自缢而死。

姜亮夫与敦煌学的不解之缘

1934年夏，刚过33岁生日不久的姜亮夫，辞去中山大学教授职务，卖掉三四部文稿，登上海轮，从上海出发自费去法国学习考古学。姜亮夫，名寅清，1902年出生于云南昭通。师从章太炎、王国维等大家，在楚辞学、敦煌学和古文献等领域均卓有贡献。他与王重民分工合作，专门收集和摄制韵书、字书、儒家经典、老子卷子以及有关文学史地卷子。当时每照一张片子要付14个法郎，姜亮夫能够做到的就是节衣缩食。他一早一晚吃的都是包心菜煮大米稀饭（巴黎大米最便宜），中午就在图书馆内啃面包干。

“七七事变”的前两天，姜亮夫经莫斯科，穿越西伯利亚，经过东北到北京。在东北，所有的

东西都被日本人拿走了。幸而敦煌学资料和许多考古学的材料是由一个公司寄回的，还没有丢失。在上海，他取出三百来张敦煌卷子，把余下的东西放在上海闸北的朋友家里。万万没有料到，这一箱资料不久便全部毁于日本鬼子的轰炸中。不幸中之大幸，敦煌卷子幸亏带在身边，完好无损。从此，这些卷子就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带着这些在国内惟一的文献资料，随着东北大学一路逃难。到达四川，空袭依旧频繁。于是开始了他的抢救性整理研究。因为他对日本人的炸弹太不放心。三年之后，24卷的《瀛涯敦煌韵辑》完成。此后，他继续躲藏空袭，抱着的是书稿而不是卷子。1955年，《瀛涯敦煌韵辑》由在上海出版公司的郑振铎正式出版，为祖国保留了珍贵的文化遗产。1956年出版的《敦煌——伟大的文化宝库》，也是抗战时期撰就的一部分底稿而改成。解放后，姜亮夫一直在浙江大学任教，引导浙江大学成为敦煌学研究的一个重镇。

幸运的王庆菽

1948年8月，王庆菽因爱人在英国留校任教而前往。对于王庆菽而言，除了与爱人团聚以外，能够查阅敦煌经卷也是值得兴奋的事。此前，王庆菽开始做唐代小说的总目提要。但由于伦敦所藏的敦煌文献一直没有公开，她的编目也无法真正完成，对于唐代小说而言，敦煌遗书是个宝库。1949年初，王庆菽独自来到伦敦，通过王重民的介绍信，她开始每天到大英博物馆阅读敦煌卷子。开始，她每次只准借阅卷子5卷，在没有目录可参考的情况下，七千多卷卷子，要想找到自己需要的资料谈何容易！后来她终于获得了“一个偶然的幸运而又难得的机会”。经过室长福尔敦同意，王庆菽获准可以自己得从头阅读，一番苦尽甘来之后，终于将该室所藏七千汉文卷子大致翻阅一遍。除了将俗讲、变文和通俗文学资料抄录了一些外，还影印了一些诗词、医药方和一部分古籍及其它资料，共计262卷，1182张显微照片。

1950年，又前往巴黎查阅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敦煌经卷。王庆菽得以随杜女士进入书库，阅读了所能看到的经卷。同样，除了将俗讲、

变文和通俗文学资料作了一些抄录外，影印了45卷，553张显微照片。1951年，王庆菽夫妇回到国内。又用了一年时间，将有关资料全部加以整理，得有关俗讲、变文资料196篇。1954年由沈阳借调来北京，与王重民、向达、周一良、启功、周绍良、曾毅公等名家一道，编辑出版了敦煌学的名著——《敦煌变文集》，为中国的敦煌学达到与世界同步的水平而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文革中，王庆菽被戴上多种政治帽子，受尽侮辱和折磨。

我们无法全部记录下所有到过欧洲写敦煌卷子的中国学者，早期出版家张元济、董康、研究汉晋木简的张凤，藏学家的于道泉，历史学家傅斯年等，但是敦煌学的历史上，确实有他们不可磨灭的一页。

张大千在敦煌

1941年春天，敦煌莫高窟迎来了一位尊贵的客人，著名画家张大千。张大千携带家眷、学生和助手，浩荡来到敦煌，甘肃和敦煌都显出受宠若惊的样子。华尔纳走了之后，敦煌已经十几年没有这样热闹了。张大千一行到达莫高窟时，已经近半夜十二点钟。稍事休息后，张大千即带着电筒、蜡烛首先来到了“藏经洞”。张大千的电筒照射处，只见菩提树下一位侍女，亭亭玉立，眉目清秀，线条柔和而有力。张大千不由得一声惊叹。原计划3个月的敦煌之行，马上改为半年，又改为一年，最后竟变成了三年。

张大千先是为莫高窟编号，接着进行临摹。不仅临摹莫高窟还有西千佛洞和榆林窟等处的北朝、隋、唐、五代等历代壁画精品，将近300幅，大者达40米之巨。三年激情临摹，张大千的“乌发丝丝，黑髯飘飘”换来了“华发如许，鬓须霜染”（徐悲鸿语）。但他连续在兰州、成都、重庆等地举办的《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无处不轰动。中国竟然有这样一个去处！敦煌在一般中国人心目有了印记，与这一系列展出是有关系的，有的艺术家从此决心献身敦煌。张大千也同时迎来了自己的一个艺术高峰。

向达在敦煌

王重民在巴黎抄写敦煌卷子的时候，同时北平图书馆的向达也在伦敦从事着同样的工

作。1938年,向达带着手抄、拍照和晒图所得的几百万字资料和照片从英伦回到了烽火连天的祖国。应北京大学之约,担任北大文科研究所专任导师,同时兼任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

1942年春,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中国地理研究所,合作组建了西北史地考察团。向达为历史组负责人。向达到达敦煌的时候,正是张大千干劲正浓的时候。为了看到下边一层壁画,张大千毫不犹豫地吧上层壁画剥落,里层的壁画露出来了。

向达用了三天时间写出了《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一文,寄到重庆,由傅斯年在文前编加按语,自12月27日开始,在重庆《大公报》连载三天。呼吁敦煌千佛洞亟应收归国有,并交由纯粹学术机关管理,对张大千的行为直接进行了批评。向达写道:“我们之所以不甘为奴为隶,情愿忍受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困苦,来奋战求存,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为的我们是有历史有文化的民族,我们有生存的权利,我们也有承先启后的义务。千佛洞是我们民族在精神方面一个最崇高的表现,保护和发扬这种精神,难道不是我们应尽的义务么?”一个星期之后的《大公报》上发表了贺昌群的《敦煌千佛洞应归国有赞议》,作为响应。当时正逢第三届全国美展的前夕,向达文章立刻引起美术界人士的关注,一场轩然大波轰然而起。张大千1943年春离开敦煌,实际上他是被甘肃方面赶走的。他对向达的憎恨是可想而知的,有一段时间,向达甚至担心张大千人多势众自己会吃皮肉之苦。

向达在敦煌坚持了九个月。没有经费没有物资,在摄氏零下20多度的房间里写报告、写论文,甚至生不起火。但他依然乐观,向达“午夜风来,铃铎交响;朝阳始上,万窟争辉”。他甚至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一种锻炼,“如经济充裕,则养尊处优,何从有机会受室内摄氏零下22°之训练,自亦无从有今日这幅顽躯。来日大难,此刻能有机会,锻炼身体,即他日可多受一份艰苦。”

然而,向达一语成谶。解放初,向达迎来了暂短的一个兴奋期,很快就遇到了一个又一个

政治风暴。五十年代,他敢说实话,替陈寅恪抱不平,右派当然非他莫属。但他没有绝望,他仍有一系列研究计划,他甚至住进寺院,准备大干一场。红卫兵再次拦住了他的去路。他被剃光了头,在六月的中午当众爆晒。向达此时是否绝望,是否想到当年零下20多度的莫高窟。1966年11月,向达在“文革”的第一个冲击波中就倒下了,时年仅仅66岁。

常书鸿:敦煌的艺术囚徒

由于向达等学者的呼吁,再加上1941年冬天访问过敦煌的监察院长于右任的积极推动,“寓保管于研究之中”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终于在1943年正式在敦煌成立,首任所长即艺术家常书鸿先生。自1935年在塞纳河边一个书摊上看到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以后,常书鸿的敦煌艺术情结终于有了抒发的方向。

常书鸿在敦煌的岁月是一言难尽的。事业的成功,理想的追求,令人欣慰的场面如同临摹的壁画。莫高窟终于开始新的历程。修筑了围墙,清理了流沙,测绘地形,临摹壁画,摄影、调查和题记抄录等等,都开始上路了。虽然简单,但筚路蓝缕之功是后人永难忘怀的。1944年8月底,为了建立职工宿舍而发现了60多卷的土地庙文书,无疑是对他们最好的报酬。原来经卷所出的残塑像系王道士所造,这就意味着土地庙藏经就是藏经洞旧物。但艰苦的环境也给常书鸿带来重大创伤。1945年春天,他的妻子终于留下孩子离他而去。祸不单行,夏天教育部又有了撤消研究所的命令。经常书鸿、傅斯年、向达、夏鼐等学者的奔走呼吁,敦煌艺术研究所得以恢复,改隶中央研究院。1946年5月新器材,新的资料和新招收的美术人员同乘一辆十轮美制军用大卡车驶向敦煌。常书鸿重返敦煌。第二年又招收了一批美术人员。千佛洞内外又充满了生机。权威的编号编出了,大规模的壁面临摹出来了。

1948年8月22日,常书鸿携带600多幅壁画临本在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举行了“敦煌艺术展览”。一个星期后,蒋介石率领一批国民党高级官员冒雨前往参观。随后在上海展出一周,更是轰动了整个社会。同年,与痴心于敦煌艺术

的李承仙共结良缘，这为苦难深重的莫高窟增添了一道美丽的风景。

1951年元旦，“敦煌艺术研究所”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4月13日，由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央历史博物馆主办的“敦煌文物展览”在午门城楼上的历史博物馆内开展。这次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展览会，周恩来总理亲临展厅的情景成了常书鸿永难忘的幸福镜头。

1994年，常书鸿逝世，根据他的遗愿，他的骨灰埋放在他的莫高窟。

1949年以后，曾经有过一个短暂的敦煌学高潮期，但可惜好景不长，不正常的中国政治给中国的文化建设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特别是“文革”时期，中国大陆的敦煌学完全停顿，学术带头人有的含冤去世，如陈寅恪、王重民、向达、贺昌群等，有的如季羨林等连正常的生活也不敢奢望。当时，只有以潘重规、饶宗颐为代表的台湾和香港的学者，在敦煌学研究上可以继续代表中国在这个世界上发言。

中国大陆地区的敦煌学，是在“文革”以后的近20年才真正开始了新的研究时代。1980年，敦煌文物研究所进行了整顿，由段文杰任所长。1983年创办了季刊《敦煌研究》。1984年8月，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基础上设立敦煌研究院。仍由段文杰任院长，并在兰州建立院本部和生活基地。扩编以后的敦煌研究院下设石窟保护、石窟考古、石窟美术、敦煌遗书等四个研究所和音乐舞蹈研究室、资料中心、编辑部等机构，目前有研究及各类人员近200人。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以研究敦煌石窟艺术为中心的研究实体，并与国内许多科研机构建立了经常性的联系，在保护石窟、科研活动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文革”结束以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武汉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学院、南京大学、湖北大学等单位相继成立了敦煌研究的所、室或组。兰州大学还创办了《敦煌学辑刊》。武汉大学、杭州大学、厦门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国家文物局文物研究所等单位也都集中了一批专业研究人员，分别有重点地开展

敦煌学课题研究。有十几所高校，相继开设了有关敦煌学的课程，并开始招收研究生，培养对敦煌学进行专门研究的人才。

为了协调、组织国内的敦煌学研究力量，加强国内外的学术交流，在一批著名学者的倡议下，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和支持下，1983年，在兰州成立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由著名学者季羨林教授任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开展国内、国际性学术交流上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国际上，除了日、法、英、俄等国学者以外，匈牙利、荷兰、意大利、德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马来西亚等国，都有多少不等的学者在从事“敦煌学”的研究。1988年，在韩国的汉城成立了“敦煌学会”。新的世纪，由于资讯条件和研究环境越来越好，一个真正的敦煌学的时代正在到来。

(责任编辑 木易)



“包公戏”的出现与流传

□ 张全明

自宋以来，人们把包拯尊称为“包公”。一提起包公，人们就会自然想到戏曲舞台上那个铁面无私、刚正不阿、为民除害的清官形象。在宋元明清以来的戏曲舞台上，不但关于包公的剧很多，而且还专门为他设计了独特的舞台形象：蟒袍、玉带、纱帽、朝靴，同时勾画着日月阴阳脸谱的“包黑头”。因此，包公成为我国宋末元明以来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清官代表。这些艺术作品，流传到国外，又使包公成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人物。像元曲中的部分包公戏就曾先后被译为法、德、日等国文字。这类小说、戏曲和民间传说中的艺术形象，脱胎于历史人物包拯，而且极为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包拯清廉正直、无私无畏的可贵品格。这类包公戏或包公小说，是我国历史上影响最广、民间最为流行的传统反贪文化或清官文化的一部分，反映了广大百姓盼望沐浴清官政治氛围的良好愿望。

包公戏的出现

据研究，“包公戏”来源于包公类小说，而包公类小说又多来源于宋代的话本。史载，宋、元间人罗烨新编的《醉翁谈录》目录公案类中就有《三现身》。有人认为，这应是《警世通言》里《三现身龙图断冤》出现的源头。甚至有人认

为，包拯生前就已经出现了一些有关他的“神话”的流传。譬如，他“知开封府，为人刚严，不可干以私。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吏民畏服，远近称之”（《涑水纪闻》卷十）。所以有人指出，这些说话人所说的故事，可能在包拯生前、至少是在南宋时代就已流传，又都是民间喜闻乐见的，因而流传很广，所起的作用也很大。以后演成戏剧或改成小说，因而其宣传的力量更大，包拯的故事也就完全夸张到神化的程度（钱剑夫：《谈“清官”和“青天”包拯》，《学术月刊》1979年第7期）。据考证，元代无名氏创作的优秀杂剧《陈州粳米》，是最早出现的包公戏，它与《铡包勉》等剧一样，也是最能反映包公清正廉明、铁面无私、不畏权贵的传统清官戏。

《陈州粳米》的内容是陈州大旱，民不聊生，朝廷低价粳米，降恩于民，但赈粮官小衙内和杨金吾贪赃枉法，自恃皇亲国戚，无法无天。他们私自将钦定的赈灾米价五两银一石加倍出售，还掺泥砂糠秕于其中，收银肥私。灾民张撇古为人耿直，买米时与之理论，直陈其贪赃勒索之罪，竟被小衙内用御赐紫金锤当场打死，引起灾民公愤。不久，包公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带着御赐金牌赴陈州查赈，用计依法审判，督斩了小衙内和杨金吾，从而惩戒了贪官，为民除了害。此剧经过多年传演，不断丰富变化，故有同类剧《包公下陈州》等，剧种有京剧、豫

剧、川剧、汉剧、湘剧、滇剧、秦腔、同州梆子、河北梆子等十余种，至今上演不衰。此剧以“正末”扮包公，塑造了一个比较丰满的包公形象。剧中的包公，不仅是一个铁面无私的智慧超群的审判官，而且从一开始就以权贵政要的死对头自任，“和那权豪们结下了山海似冤仇”。作者在剧中提示了刚正不阿、为官清廉的包公勇于同贪官污吏作斗争的真实性格，同时又在一些具体情节上赋予了主人公以浓厚的民众幻想的清官色彩，其包公形象充分地反映了普通百姓的理想和愿望。自宋元以来，淮阳等地一直流传着包公放粮的故事，虽与戏剧不完全一致，但主要人物、情节却大同小异。

可以认为，包公戏与包公形象的塑造，虽高于生活，实际上也源于生活。史载，包拯曾多次给朝廷上奏请求赈济陈州（治今河南淮阳）、河北、江淮等地的饥民。但当时京西转运使等官非常贪酷，千方百计贪赃，想方设法害民，恰遇其辖地陈州受灾，以致引起许多百姓被盘剥勒索而死的惨状。包拯下陈州访闻到这帮家伙是“阎王爷不嫌小鬼瘦”的实情后，气愤填膺，立即上书仁宗，揭露其贪赃枉法之罪，弹劾他们“于灾伤年份二倍诛剥贫民”，折变时花样翻新，变本加厉，“非常暴敛”，要求依法惩贪，重置典刑。（《包孝肃公奏议》卷七《请免陈州添折见钱》）。结果“陈州公（指包公）监臬之处，除奸革弊，民受其惠”，“民赖其活”。因此，这些奏折及其所记载的内容即成了《陈州案米》剧的最原始的根据，反映了包公惩贪肃贪、除暴安良、为民排忧解难的基本史实。

《铡包勉》一剧，是写包公对于犯有贪污受贿罪的侄儿，面对其情深义重的嫂嫂说情，也毫不通融，依法处死的故事。这一戏剧情节虽正史无考，但包拯倡廉戒贪的史实与其所立的《家训》中是包含有其历史的影子的。《宋史·包拯传》载，包拯多次“请重门下封驳之制，及废铜赃吏”，“数论斥权幸大臣”，“又上言天子当明听纳，辨朋党，惜人才”，“请去刻薄，抑侥幸，正刑明禁，戒兴作，禁妖妄。朝廷多施行之”。他在执法过程中对亲朋故旧、宗族同乡也一视同仁。包拯不仅敢于对权贵严格执法，而且对其亲友

犯法者亦依法予以严惩，不徇私情。至和二年（1005年），包拯任庐州知府。庐州是他的家乡，有他的许多亲戚朋友。有的亲友以为有包拯作靠山，便有恃无恐，胡作非为。包拯非常憎恨这种恶劣习气。他的从舅横行霸道，触犯了法律，包拯依法断罪，当堂打了他的从舅一顿。这一来，原来扰乱官府或其它违法的亲友，也都收敛、老实了。这种铁面无私的行为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据《涑水纪闻》记载：“包希仁知庐州，庐州即乡里也。亲旧多乘势扰官府。有从舅犯法，希仁挞之，自是亲旧皆屏息。”他还自立一则《家训》，以表示与贪官赃吏水火不容的决绝态度。《家训》说：“后世子孙仕官，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仰工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昭后世。”从这则《家训》可以看出，他将子孙做官不得贪赃枉法作为一条铁的家法，令其务必遵守；若违反此训，永远不能再回包家，也就是开除了族籍；即使死亡之后也不能入包家的祖坟。并指出，不自奉廉洁而贪赃者，他就不承认他是自己的子孙。后来《铡包勉》和《包公赔情》等戏中依法斩杀犯有贪污罪的侄儿包勉或许即渊源于上述史实。此剧情节并不复杂，但却深刻、丰富地反映了包拯痛恨贪污、铁面无私的性格。自然，此剧从出现以来，一直受到了希望公平、公正执法，喜爱清官戏与包公形象的广大百姓的欢迎。后来，京剧甚至干脆易名为《铁面无私清官谱》。汉剧、豫剧、徽剧、秦腔、吉剧、川剧、粤剧、河北梆子等剧种中至今都有此剧上演，只是有的戏名不尽相同。如粤剧名《包公截侄》，川剧名《铡侄》，吉剧名《包公赔情》等。

包公戏的流传

包公戏的产生和流传，是自宋末元代以来各种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具体而言，主要是当时贪官污吏多如牛毛，贪赃枉法之事不可胜计，处于死亡线上挣扎的广大民众，满腹含冤，无法申诉，于是就把希望寄托在能同贪官污

吏进行斗争、为民请命的清官身上。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和社会条件下,加上由于包公戏的作者也是身处在社会底层受歧视和压迫的普通读书人。在元朝“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元史》卷一百四《刑法志》)的严酷刑律规定下,为避免触犯严密的法网,便采取借古喻今的手法,利用历史题材来反映老百姓的痛苦和愿望,并抒发心中的抑郁愤懑和对贪官污吏的痛恨之情,于是,包公戏便应运而生,继而广泛流传。元曲著名的戏剧作家如关汉卿等,所采取的正是这种艺术手法。其所写的包公戏《鲁斋郎》与《蝴蝶梦》等,可谓包公戏的代表作。剧中同样反映了包公不畏权贵、严惩贪赃枉法之徒的清官艺术形象。

据载,元杂剧中有大量以包公刚正不阿、依法惩贪、为民除害、平反冤狱为故事的戏。明代臧晋叔编的《元曲选》中就选了十种:《包待制陈州粳米》,《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包待制智勘后庭花》,《包龙图智赚合同文字》,《包待制智勘灰阑记》,《王月英元月留鞋记》,《包待制智勘生金阁》,《神奴儿大闹开封府》,《叮叮当当盆儿鬼》。另外,元末钟嗣成编著的《录鬼簿》中还载有《包待制判断烟花鬼》、《包待制双勘丁》、《风雪包待制》等多种包公戏。这些包公戏由于大都反映了元朝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造成的冤狱重重的社会现实,因而受到了群众的喜爱而流传甚广。

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文化、戏剧的传播,清官戏日益深入人心,故包公戏在当时流传更广。不仅如此,自从明代《龙图公案》、即《包公案》等小说出现以后,人们往往把许多离奇古怪案件的故事和传说,统统加在包公身上,使包拯被逐步夸大乃至神化。因此,石玉昆的《三侠五义》、俞樾的《七侠五义》,以致《警世通言》中《三现身龙图断冤》,《初刻拍案惊奇》中《张员外义抚螟蛉子》、《包龙图智赚合同文》等小说及其衍生出的更多的剧目,都是以包公为中心。近代《小说丛考》指出:“包公一生,不独能破前朝之案,且能破清代之案,其‘平反’之功,宜累牍书之不尽矣。”《曲海总目提要》认为:“其事有载于它书者,有传于案牘者,亦有凭空

杜撰、全无根据者。”其实,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历史上和民间有很多这种事情:一个为人们所喜爱的好人,凡是好事总归属于他的名下;一个为人们所痛恨的恶人,凡是坏事也都归属于他的名下。不是人们没有分清甲乙丙丁的能力,而是好恶之情大致如此。故庄子说:“两喜必多溢美之言,两怒必多溢恶之言”(《庄子·人间世》)。大量戏曲中之所以有被神化的包公,甚至在一些穷苦百姓的眼中,包公故事越夸张越好,包公越神化越好,大体皆源于此。而且事实上多有史为凭,并非无端妄说。正如《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中所说:“在旧社会,就人民方面来说,他们喜爱‘包公’这个不避权贵、执法不阿的形象,是寄托一种幻想,希望有人出来为他们申冤。这种幻想,往往曲折地反映了一定的客观实际。”所以,清官包拯的经历与行为等,就附会流传成了许多包公类的小说和戏剧。而且,“在封建社会里,在民间存在期望清官和喜爱清官的心理同时,封建地主阶级从巩固他们的统治出发,也常常提倡官吏的清正”(见《人民日报》1978年7月13日)。因此,包公既有被夸大和神化的社会基础,又有其一定的阶级根源。

包公戏广为流传的原因,除上述之外,更主要的是:包公戏的主人公有许多值得肯定之处,这是包公戏能够出现并广为流传的最根本的原因。有人认为,在封建统治阶级中,确曾有过这样一种人,他们从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出发,执法不阿,铁面无私。从包拯一生来看,这是其最大特点,也是最值得充分肯定的一个方面。如史载,包拯曾六弹国丈张尧佐,七劾贪官王逵,甚至为此“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朱弁:《曲洧旧闻》卷一)。

包公戏的不衰

同时,包拯还经常注意普通民众的疾苦,多次上书“为民请命”,赈灾济民,并以“私访”的形式了解老百姓的冤情,为民申冤除害,从而使一些群众的疾苦得以解除,冤案得以上诉甚至化

解,这也是包拯为官的一大特色,反映出了其清正廉洁、勤政爱民的一贯作风。史载“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旧制,凡诉讼不得径造庭下。拯开正门,使得至前陈曲直,吏不敢欺”(《宋史》卷三百一十六《包拯传》)。或许正因为如此,时人欧阳修就曾赞扬他“清节美行,著自贫贱,说言正论,闻于朝廷”。吴奎为他作的《墓志铭》也道:“峻节高志,凌乎青云。人或曲随,我直其为。人或善容,我抗其辞,自始至终,言行必一。”明朝的胡俨在为包拯奏议新版作的《序》中也说:“公在当时,为人峭直,其忠孝大节,议论风采,著于庙堂,闻于天下,传之后世,载诸史册者,章章矣。”“观其敷奏详明,谏诤剴切,举刺不避乎权势,犯颜不畏乎逆鳞;明当世之务,务引其君于当道,词气森严,确乎不拔,百世之下,使人读之,奋迅其精神,发扬其志节,炳炳琅琅,光前振后,焕乎其不可掩也。”所有这些,都可谓明证。

此外,包拯虽生性刚直,然处事尚平和;虽嫉恶如仇,然存心崇宽厚;虽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然待人推以忠恕。但面对掠财残民以逞的贪官酷吏,则力主依法严惩,不讲情面。这也是包拯为官、为人的一大特点。包拯曾在奏折中就批评当时的官吏对“孤弱无援者,则按以深文;权势豪猾者,则纵而不顾。内则徇一身之利以植其私,外则窃振职之名以图其进。效尤无耻,唯恐不及。至有公清守节之人,或不曲事左右、为众所嫉者,即被加诬,构成其罪。遂使守己之士,或负终身之玷,可不痛惜哉!且治平之世,明盛之君,必务德泽,罕用刑法”。因而,他反对“专用刻薄好进之吏”,以免“民不聊生”,要求转运、提刑等职,“精选廉干中正之人,以充其职;苛细矫激之辈,屏而不用”(《包孝肃公奏议》卷四《请不用苛虐之人充监司》)。不仅如此,包拯还力主对民“慎刑”,对贪官污吏严格“正刑”。慎刑,是为了不冤枉一个好人;正刑,是为了不放过一个坏人。他在《乞不用赃吏》等文中,即较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点。他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今天下郡县至广,

官吏至众。而赃污擿发,无日无之。泊具案来上,或横贷以全其生,或推恩以除其衅。虽有重律,仅同空文。贪猥之徒,殊无畏惮。昔两汉以赃私致罪者,皆禁锢子孙,矧自犯之乎!太宗朝尝有臣僚数人犯罪,并配少府监隶役,及该赦宥,谓近臣曰:‘此辈既犯赃滥,只可放令逐便,不可复以官爵。’其责贪残,慎名器如此。皆先朝令典,固可遵行。欲乞今后应臣僚犯赃抵罪,不从轻贷,并依条施行。纵遇大赦,更不录用。或所犯若轻者,只得授副使上佐。如此,则廉吏知所劝,贪夫知所惧矣。”包拯作为一个封建官吏,能这样全面而辩证地看待和处理问题,的确是难能可贵而应该值得充分肯定的。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包公的清官戏兴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责任编辑 程 度)



居野其漁故撫

包拯像

论资排辈的由来

□ 吴 思

一

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5年），孙丕扬62岁时出任吏部尚书。他的职责是协助皇帝，选拔德才兼备的官员，将他们安排到适当的岗位上。明朝在名义上没有宰相，孙丕扬位居中央六部尚书之首，除了皇帝，他简直就是天下最大的官了。

孙丕扬是个廉洁清正的人。《明史》卷224上说，“丕扬挺劲不挠，百僚无敢以私干者”。意味深长的是，这位陕西籍的倔老头当了吏部尚书之后，创建了“掣签法”，明朝的干部安排方式从此一变，官员们无论贤愚清浊，一概要凭手气抽签上岗了。一个聪明正派的重臣，竟把皇上托付给自己的选贤任能的重大职责，转交给了一堆竹签。

按照现代管理学的说法，不同的职位对人员素质有不同的要求，选择人才时要扬其所长避其所短。这个道理当时的人完全明白。于慎行比孙丕扬年轻十来岁，当过礼部尚书，他在《谷山笔尘》卷五中批评孙丕扬道：人的才能有长有短，各有所宜；资格有高有下，各有所便；地方事务有繁有简，各有所合；上任的路途有远有近，各有所准。而这一切差别都付之竹签，难道遮上了镜子还能照见面貌，折断了秤杆还可以称出分量么？于慎行的这些批评很精当，简直就像是比照着管理学原理说出来的，而且他还考虑到了上任路途远近这个时代特点很强的问题。那时候交通不便，千里赴任，通常要借一大笔债。在工资不高的条件下，还债的压力很容易转化

为贪污的动力。因此，这个距离因素便关系到“德才兼备”中的“德”。赴任的官员到了千里之外，情况不熟，语言不通，办事便要依靠名声很坏的吏胥，领导和监督作用也就无从谈起。这又关系到“德才兼备”中的“才”。可见这个不起眼的距离因素也不容小看。

明朝大学者顾炎武对竹签当政的指责更加尖锐。他说：孔夫子对仲弓说“举尔所知。”如今科举取士，礼部要把名字糊上再取，这是“举其所不知”；吏部靠掣签安排干部，这是“用其所不知”。用这套办法的大臣在知人善任方面很笨拙，在躲避是非方面倒很巧妙。如此选出来的官员赴任之后，人与地不相宜，于是吏治就要变坏，吏治变坏则百姓造反，百姓造反则大动刀兵。

总之，孙丕扬创建的抽签法很危险——甄别使用人才的重任怎么能转交给没头没脑的竹签呢？这位正人君子既违反圣人的教导，又违背职责的规定，他到底出了什么毛病？

二

据《明史》记载，孙丕扬谁都不怕，惟独怕太监。千千万万的文官都不敢找孙丕扬走后门，但是宦官敢。宦官没完没了地托他给亲信安排肥缺，孙丕扬安排又不是，拒绝又不敢，于是就发明了抽签的办法，让那些宦官不要再来走后门，可谓用心良苦。

宦官在名义上当然没有孙丕扬的官大。孙丕扬是正二品的高官，而宦官的头子，也就是担任太监的宦官，不过是个四品官，与孙丕扬差着

四档。而且宦官是不许干预政事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规定,宦官干预政事者斩。同样,明朝也是没有宰相的,开国初期的三个官居一品的宰相似乎都不可靠,朱元璋杀掉他们,然后就废除了宰相制度,并且在《皇明祖训》中写下一句严厉之极的话:后代有敢建议立宰相者,灭九族。如此说来,孙丕扬只需直接向皇上负责,除了皇帝本人之外不必再怕什么人,但是实际情形不然。

朱元璋废除宰相,就等于迫使他的子孙后代亲自出面管理国家。必须由所有者亲自出面管理一个大企业的制度,尚且不能叫好制度,更何况管理一个大国。这是个体户的思路。这个思路容不下专业分工的出现,不承认臣民之中有更善于管理而且乐于管理的专家人才。

这种制度禁止外人插手代理,它自己所提供的皇帝又如何呢?显然,生长在深宫内院的皇太子,对民间实际情况的了解必定是肤浅的,中国的儒家教育又是春秋笔法的隐恶扬善教育,告诉学生的都是理想的模式是什么样子,为什么说这是理想的,等等。教的那一套与实际情形相去甚远。也就是说,一个满脑子教条和理想的书生,就是这种制度所能提供的最好的领导者。这不过是一个有德无能的最高管理者。而更大的可能是碰上一个无德又无能的管理者,一个既缺乏理想又没有头脑的败家子。这两种皇上都缺乏管理国家的能力,很需要一些助手协助他处理六部首脑提出的复杂问题。

在实际情形中,皇上批阅的奏章,譬如孙丕扬的什么奏疏,首先要由内阁大学士——皇上的秘书——看一遍,替皇上草拟一个处理意见,用小纸条贴在奏疏的前面,这叫拟票。现在的官场用语譬如“拟同意”之类,大概就是从这里来的。拟票过的奏章呈到皇上手里,皇上便参考大学士的意见口授旨意,秉笔太监持红笔记录,这叫批红。无论名义上如何规定,呈送奏章的人,总不如阅读奏章并提出处理建议的人权力大;提建议的拟票人,总不如拿着红笔写指示的人权力大——特别是在皇上又懒又好糊弄的条件下。譬如正德皇帝贪玩,太监刘瑾便把奏章拿回家与亲戚和哥们商量着批,首辅李东阳也难以

辨别真假。于是,就在这个并不违背常识和情理的过程中,行政权力的重心悄然转移。

《明史·职官志》总结明朝的行政权归属说:洪武十三年废除宰相制度之后,天下事就由各部尚书负责处理。大学士当顾问,皇帝自己做决定。这时候的大学士很少能参与决策。到了第五代的宣德年间,大学士因为有太子的老师的资格,威望隆盛,地位和作用已经在六部尚书的地位之上了,内阁权力也从此超过了六部。到了第十二代的嘉靖中期,夏言、严嵩用事,其地位已经赫然为真宰相。不过,内阁的拟票权,不得不决于内监的批红权,于是,宰相权实际就到了宦官手里。

不知不觉中,朝廷决策,官员进退,都把持在宦官之手了。不许干政云云,早就成了一纸空文。

(明)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卷八讲了一个宦官对这种权势变化的亲身体会。嘉靖年间的一位宦官说:“我辈在顺门上久,见时事几复矣。昔日张先生(引者注:内阁大学士中的首辅张璁)进朝,我们多要打个躬。后至夏先生(首辅夏言),我们只平着眼看望。今严先生(首辅严嵩)与我们拱拱手,方始进去。”

这套体现在鞠躬拱手上的礼节变迁,实际上标出了明朝行政权力的变迁。名义上权力在皇帝手里,但是皇帝不能干、不肯干,这时候,在没有合法代理制度如宰相制度的条件下,行政大权就悄悄落在皇帝的私人顾问和随从手里了。这是潜在的规矩,却是真正管用的规矩,不懂得这个规矩的人将在官场上碰得头破血流。究竟是公开代理的宰相制度好,还是明朝的悄悄代理好呢?公开代理好歹还有个公开推选宰相的过程,悄悄代理则全凭个人的私下手段,譬如刘瑾那种引导皇上玩鹰玩狗讨皇上欢心的手段。

话扯远了。简单地说,就是明朝必定出现一个灰色的权势集团,一个在典章制度中找不到的权势集团。这个集团有能力让正式制度的维护者给他们让路。孙丕扬不愿意让路,又不敢得罪宦官,不能不让路。双方较量的结果,就是孙丕扬带头放弃自己手里的安排干部的权力,放

弃肥缺的分配权，同时也就取消了灰色权势集团的肥缺索取权，任何人都不能凭自己的标准安排干部，一切由竹签和当事人的手气决定。这个抽签制度建立后，吏部的后门果然堵住不少，当时的人们便盛赞孙丕扬公正无私。在这种盛赞中，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人事安排或者叫肥缺分配方面徇私舞弊的严重程度。

三

顾炎武在《日知录》里考察了论资排辈的由来。论资排辈制度和抽签制度一样，都是舍弃了选贤任能功能的官员选择制度，都是蒙上眼睛碰运气的肥缺分配制度。这两种制度还可以配合使用：首先要够资格，够年头，然后才轮得上你抽签。有意思的是：在论资排辈制度的源头，顾炎武看到了我们在抽签制度的源头看到的景象。

顾炎武说，如今谈到论资排辈制度，都说起源于北魏的崔亮。读读崔亮的本传，才知道他也有不得已的地方。

据《魏书》卷六十六崔亮传记载，崔亮当吏部尚书的时候，正赶上武官得势，太后下令要选拔武官在中央和地方的政府中作官。但是官位少，应选人太多，前任吏部尚书李韶按照老办法提拔人，众人都心怀怨恨。于是崔亮上奏，建议采用新办法，不问贤愚，完全根据年头任用官员。年头不对，即使这个职位需要这个人，也不能任命他。庸才下品，年头够长就先提拔任用。于是久滞官场的人都称赞崔亮能干。

崔亮的外甥，司空谘议刘景安，对舅舅的做法很不满，就写了封信规劝崔亮，大意是说：古往今来，选用官员一直由各级政府推荐，虽然不能尽善尽美，十分人才也收了六七分。而现在朝廷选择官员的方式有很多问题，选择标准片面，途径狭窄，淘汰不精，舅舅现在负责此事，应该改弦更张，怎么反而搞起了论资排辈呢？这样一来，天下之士谁还去修厉名行呢！

崔亮写信回答说：你讲的道理很深，我侥幸当了吏部尚书，经常考虑选贤任能，报答明主的恩情，这是我的本意。而论资排辈，实在有其缘故。今天已经被你责备了，千载之后，谁还知道

我的苦心呢？

崔亮说，过去天下众多的贤人共同选择人才，你还说十收六七。今日所有选拔的任务专归吏部尚书，以一人的镜子照察天下，了解天下人物，这与以管窥天有什么区别呢？如今在战争中立下功勋的人甚多，又有羽林军入选，武夫得势，却不识字，更不会计算，只懂得举着弓弩冲锋，追随踪迹抓人。这样的人怎么能治理好天下？再说武人太多，而官员的名额太少，即使让十人共一官，官职也不够用，更何况每个人都希望得一个官职了，这怎么能不引起怨恨呢！我与上边当面争执，说不宜使武人入选，请求赐给他们爵位，多发他们俸禄。但是上边不接受。所以用了这个权宜之策，用年头限制一下。这就是我的本意，但愿将来的君子能够明白我的心。

顾炎武评论说，北魏失去人才就是从崔亮开始的。不过看他回信的意思，考察当时的形势，羽林之变并不是他姑息的，武人封官也不是他滥给的，崔亮用这个规矩也是不得已。奇怪的是，现在上边没有那些立下功勋的人压着，下边没有鼓噪的叛党逼着，究竟怕的是什么，还用这论资排辈的办法呢？

顾炎武说得很清楚，崔亮的办法是用来安抚上上下下的压力集团的，是被迫的让步。我们也从孙丕扬的故事中看到，顾炎武所说的“现在”——明朝末年，也同样面对着权势集团的压力。抽签等等也是不得已的。孙丕扬和崔亮这两位吏部尚书相隔一千余年，但是选官规则的形成法则相同，形成的情势相近，形成的结果自然也差不多。一个很明白的问题竟然用一千年也解决不了，真所谓“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

四

我们已经看到了三个层次的选任官员的方式。表层是理论上冠冕堂皇的“选贤任能”，中层是论资排辈和抽签，底层是权势集团的私下请托，或者叫走后门。

明朝小说《醒世恒言》卷三十六介绍了一种在吏部走后门当官的规矩，名字叫“飞过海”。明朝沿袭元朝制度，吏员每三年一考，三考合格，

即为考满，考满的吏就可以去吏部候选当官。但是有了资格并不一定能当上官，人多位置少，什么时候能上岗是很难说的。于是就有人发明了一种抢先的办法，这便是“飞过海”。

《醒世恒言》中说：“原来绍兴地方，惯做一项生意，凡有钱能干的，都到京中买个三考吏名色，钻谋好地方，做个佐贰官出来，俗名唤做‘飞过海’。怎么叫做‘飞过海’？大凡吏员考满，依次选去，不知等上几年。若用了钱，挖选在别人前面，指日便得做官，这谓之飞过海。还有独自无力，四五个合做伙计，一人出名做官，其余坐地分赃。到了任上，先备厚礼，结好堂官，叨揽事管。些小事体，经他衙里，少不得要诈一两五钱……所以天下衙官，大半都出绍兴。”

当然这也不能怨绍兴人。绍兴地少人多，生活不下去，总要谋一条出路。（明）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山阴、会稽、余姚，人口繁多，本地的房屋耕地连一半的人口也供养不起，于是聪明敏捷的人，就进京当了都办，从要害部门到闲曹细局，到处都是这一带的人。——全中国的大小衙门里充满了绍兴人，原来是生存环境逼的。而从绍兴人的角度看，“飞过海”不过是激烈的生存竞争的一种手段。民间的生存压力，就是这样转化为官场内部的“请托制”的运行动力。

绍兴人在北京托人走后门花的钱，只是推动请托方式运行的一小部分费用，因为它只涉及到吏员“工转干”这一条途径，不过是明朝选官的数条途径之一，并且还是很小很不重要的途径。至于推动整个“请托制”运行的费用总额有多大，当时没有正式统计，我现在也很难估计。但我们知道，在孙丕扬上任前的嘉靖年间，也就是《醒世恒言》中写到的“飞过海”流行年代，吏部的一个吏员的肥缺就价值上千两银子，相当于当时一个县太爷二十年的名义工资。权贵们收了人家的厚礼，经常点着名安排某个人到某个位置。另外，在孙丕扬生活的万历年间，如果某人从官员的位置上退下来，你想让他推荐你接任，即使你的学历资格年头全够，这笔推荐费也要五六百两银子，大概相当于一户自耕农二十年的收入。上边这两个例子不过是群豹身上的两块斑点，明朝文职官员的“岗”在两万

个以上，吏员超过五万五，武职更超过十万，这两块斑点的大小，可以帮助我们管窥和推测请托费用的整体规模。

这笔官场上的巨额投资，最终自然要从老百姓身上一钱一两地捞本取利，《醒世恒言》已经介绍得很清楚了。

请托盛行，意味着谁有路子谁当官。这又大体相当于谁有银子谁当官，谁会巴结谁当官。谁有银子谁当官的道理还可以再推进一步，因为明朝的官员工资甚低，不应该有很多银子，银子多恐怕也就是灰色收入多，贪赃枉法的嫌疑大。这就意味着溜须拍马高手和贪赃枉法的嫌疑犯最有可能当官。当然也可以像《醒世恒言》中说的那样，大家先凑钱买个官当，按入股的比例分赃——这就意味着贪污准备最充分、贪污压力最大的人最可能当官。这显然是一幅很糟糕的前景：衙门里充满了贪官污吏和结伙打劫强盗，动辄敲诈一二两银子，如此用不了多久，天下就只能看见穷山恶水贪官刁民了。

在上述情景之下，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替孙丕扬想一想，就会发现他胆识过人。

掣签法一出，请托无处容身了，那些权贵，包括孙丕扬的那些花大钱钻营进来的部下，都断了一条财路。没有过人的胆量，或者头上有许多小辫子被人家攥在手里，谁还敢做这种得罪人的事情？自己先断了自己的财路，谁又肯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此外，论资排辈和抽签本身堪称极其高明的流线型设计。如果要发明一种在官场中的阻力最小、压力最轻、各方面都能接受的肥缺分配办法，恐怕那就是论资排辈加抽签。资格和辈分是硬指标，不容易产生争议，这就能够持久。人人都会老的，谁都不会觉得这个办法对自己格外不公平，这就容易接受。已经老的人关系多，经验丰富，常常还是年轻人的师长师兄，年轻人很难公开反对他们，这就让反对者难以成势。至于在相同资格和辈分的条件下抽签抓阄，这是把前程交给天意和命运安排，而天意和命运也是人人尊重，根本就无法反对的。最后还有一条好处，一旦开始了论资排辈，再要废除就不太容易，代价会很高，因为耐心等待多年的编织了坚

实的关系网的人们会群起围攻,说他的坏话,造他的谣言,保护自己即将到手的利益。

事实上权贵们也犯不上去招惹众怒,因为请托的道路并没有被孙丕扬彻底堵死,他只是在自己领导的吏部堵住了这条路,而吏部的考选只是官员升迁的途径之一。另外还有一条途径叫做保举。为了弥补吏部考选的不足,京官五品以上和州县正官以上,都有权保举官员。被保举者的升迁调用不论年头和资格,也不用抽签。崇祯年间的刑科给事中李清在《三垣笔记》中记载,曾有一个求他保举,开口就要送他三千两银子,由此可以想见保举的行情。在保举的道路上,权贵们的乡里亲旧僚属门下络绎不绝,从来就没有断过。这条溢洪道虽然不那么干净,但也起到了稳固大堤的作用——权贵们可以绕开抽签制度,无须推翻它。

到了明朝的最后几年,崇祯皇上觉得抽签选上来的官员实在不好用,又提倡保举。第一批保举出来的人果然不错,但接下来便一塌糊涂了。经皇上的倡导,保举的口子越开越大,请托方式也逐渐取代了抽签方式,溢洪道豁成了主渠道。作为主渠道的吏部也同流合污,挤入捞一把的行列,于是形势大坏。忧国忧民的人又呼吁恢复抽签制度,却发现这东西也成了可望不可及的梦想。李自成破陕西,京都大震,明王朝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这时吏部仍然在选官的过程中大肆收受贿赂。崇祯听到了报告,就把祖宗牌位摆在朝廷上,让官员们在神圣的气氛中抽签定岗。当时许多地方已经成了一片废墟,有的地方危机四伏,险地和肥缺全在一个箱子里装着。崇祯规定,不管是什么地方,一旦抽签抽中了,立刻就要上路,限期到任。有的官员规避不出,就令排在他前边的人替他抽签,不能让他溜了。这就是说,在明朝灭亡前的最后关头,抽签制度再获新生,而主持恢复这个制度的竟是励精图治、与朝廷共命运的崇祯皇帝。皇帝本人也和孙丕扬一样让步了。皇上有权,但是找不准打击或提拔的对象,分不清敌我友,贪官污吏用信息战打败了他。

抽签当然不好,但考虑到这许多复杂情况,《明史》的作者最后还是说了许多体谅孙丕扬的

话。这位史官前辈说得十分到位,我只能老老实实在地转述如下:孙丕扬创建掣签法,虽然不能辨才任官,关键是制止了放任营私的弊病。如果不是他,说不定情况更糟。这也是因地制宜,不可援引古代圣贤的话去责难他。

五

说了半天,官场上的各种关系都摆平了,大家都没牢骚了,老百姓又如何呢?老百姓缴了皇粮国税,养了千千万万的文武官员,自然期望上边派来一个贤能的领导,否则很应该大发牢骚。不过发牢骚也白发,他们的嗓门不够大,掌权者听不见。这个比喻是嘉靖和万历年间著名的清官海瑞说的,原话是:“百姓口小,有公议不能自致于上。”海瑞这句话说得异常简洁精确,后人很难超越。但是这话的背后隐藏了一个可疑的前提:上边知道了老百姓的不满一定会替他们作主么?事实上,大量的官办企业经营不善,面临破产,再明白不过地表明了官员的服务对象对他们的工作不满意。这条信息通道并没有堵塞,但是那些工部和户部的官吏很少因此丢官,除非他们在官场上瞎了眼。海瑞的假定显然不能得到历史经验的证实。老百姓的嗓门确实有问题,但是加害于人或者造福于人的实际能力更成问题。

这就是说,在进行官场谋划,努力摆平各种利害关系的时候,无须考虑老百姓的压力,他们根本就不能构成一个压力集团,甚至连一个舆论集团也不是,不过是一盘散沙。那时候又没有“海选”的手段,难道某粒沙子还能跑到吏部去为你争肥缺或者砸饭碗?如果不能,考虑他们岂不是多余?

作为整个政权的根基,老百姓在理论和原则上非常重要,所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因此才有了“选贤任能”、“为民父母”、“爱民如子”之类的大原则和正式规则,以免洪水泛滥,大家遭殃。如果真能做到这一套,老百姓也会感到十分幸福,当牛作马虽然免不了,皇亲贵族的三宫六院和伺候他们的万千宦官也要好好养活着伺候着,但身边毕竟有了一个好牧人。只要他早出晚归,兢兢业业地替天子放牧,屠宰的季节和数

量掌握得比较有分寸，老百姓也就像鲁迅说的那样暂时作稳了奴隶。

但是在现实的制度运作中，老百姓什么也不是，无论是压力还是牢骚，什么也传不上去，这就难免“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因此就培养出了敲诈勒索，勾引出了官场请托，豺狼饿虎们一个个地混进了牧人的队伍，吃得牛羊们纷纷断子绝孙，这便是最黑的潜规则。按照鲁迅的比喻，这就进入了想作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论资排辈和抽签法可以算作灰色规则，位于白色的正式规则和黑色的潜规则之间。沿着

这条灰色道路上来的放牧者则是个大杂烩，勤狗懒狗好人坏人豺狼虎豹都有，老百姓赶上谁是谁。这条灰色规则能够大体通行，已经很不容易了。在老百姓什么也不是的情况下，孙丕扬等有觉悟有勇气的好干部，运筹帷幄，建立各种同盟，巧妙地动员官场上的各种力量，经过努力才给牛羊们争取到这个政治成果。这个成果的取得，既可以称之为成功，也可以称之为失败，这大概也是各朝代总能够维持二百多年，最后却终于难免灭亡的道理之一。

(责任编辑 程 度)

代 购 代 邮

一个时期以来，函询季羨林、李锐、韦君宜等同志作品的读者日益增多。为方便读者，现就以下订购较多的书籍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 价	邮 费
季羨林人生漫笔	季羨林	21.00	3.00
牛棚杂忆	季羨林	19.50	3.00
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徐 葵 张达南 译	28.00	4.00
百年聚焦	史义军	59.80	6.00
斯大林秘闻—— 原苏联秘密档案最新披露	爱德华·拉津斯基	39.00	4.00
在历史巨人身边—— 师哲回忆录	师 哲	32.00	4.00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	萧克 李锐 龚育之等	28.00	4.00
直面人生	戴 煌	19.80	3.00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戴 煌	21.00	3.00
李锐其人	宋晓梦	28.00	4.00
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	李 锐	29.50	4.00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杨奎松	29.80	4.00
冤假错案是这样平反的	何 戟	15.00	3.00
大转折的日日夜夜	张湛彬	80.00	8.00
毛泽东最后十年	陈长江 赵桂来	17.00	3.00
中华传统美德格言与故事	许启贤	23.00	4.00
石破天惊	张湛彬	29.00	4.00
第一个平反的右派——温济泽的自述	温济泽	22.80	4.00
思忆文丛——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			
原上草	牛汉 邓九平	24.00	4.00
六月雪	牛汉 邓九平	25.00	4.00
荆棘路	牛汉 邓九平	23.00	4.00
(购买全套《思忆文丛》邮费 7.00)			
海 丝	杜明明	28.00	4.00
龙文化与民族精神	鲁淳 王才 冯广裕	20.00	3.00
红墙回忆	纪 学	48.00	5.00

《李锐其人》通过李锐的一生可以看到半个多世纪中国历史风云的翻卷，而从中国以至世界历史的背景来看既是共产党员又是知识分子的李锐，才能更看清他“这一个”最早走出“左”的禁锢，坚持改革开放的共产党人。

《石破天惊》记叙了以下内容：胡耀邦为什么要给“右派”平反；陈云为什么提出康生有问题；为什么只有 290 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华国锋是怎样离开最高权力顶峰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怎样一步步被突破的。

《红墙回忆》红墙内是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红墙内是共和国领袖的住地。这里，有波澜起伏的政治风云，有领袖人物的真实人生，有领袖们的感情生活……

欲购者可直接将书款汇至炎黄春秋杂志社。

社址：北京东城区戏楼胡同 1 号，邮编：100007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发行部

爱国团结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求实存真
秉笔直书今古大事

欢迎订阅 2001 年

炎黄春秋



炎
黄
春
秋

邓小平与华北大演习
杨尚昆苦寻当年小“看守”



中国历史上
第一位皇帝



中国历史上
第一位皇帝

炎黄春秋



是否宣传雷锋
曾有一场争议

蒋介石高参“通共”纪实
一本英雄书 一场生死劫
联参与“丁陈反党集团”事件始末
中缅军队联合攻缅
叶剑英、谭震林、罗瑞卿、徐向前
和朱德在延安的合影



炎黄春秋

炎黄春秋



历史会议前毛泽东
与当时错误的斗争
“文革”中从不做工的
陈汉元冯基平
创建延安抗日根据地
的经过

12

炎黄春秋

YAN HUANG CHUN QIU

中国历史上
第一位皇帝
中国历史上
第一位皇帝
中国历史上
第一位皇帝

2000

《炎黄春秋》自1991年创刊以来，高举爱国大团结的旗帜，秉笔直书今古中外大事。不增美，不益恶，坚持求实存真。

《炎黄春秋》拥有大批高水平作者。有的是老革命家，重大革命事件的亲历者；有的是资深专家学者，对重大事件和人物有深入研究。他们的文章具有权威性和史料价值，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

2001年订价每期仍为4.80元。全国各地邮局(所)均可订阅。在邮局订阅不便者，可向本刊发行部邮购，不另收邮费。

炎黄春秋

YANHUANG CHUNQIU

新兴工业国转型期腐败的启示

辛亥忠烈吴禄贞

刘志丹的悲壮人生

中国载人航天飞船总设计师王永志

一代学人丁文江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581/K 邮发代号: 82-507 定价: 4.80元